

共产主义者

月刊第4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8

时事

全阵线第二次
代表大会

理论

我们对台海
冲突的立场：
主要敌人在内！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谁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时事

I	● 本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05
II	“捞女游戏”舆论风暴背后的歧视和对立——谁是敌？谁是友？	08
III	边检乱象：简评挪威游客声称因手机含万斯梗图被拒绝入境	11
IV	七七事变八十八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是为了什么？	13
V	大学一宿管因高温离世——乱葬的劳苦大众	19
VI	卢女士找表，地方官长脸，环卫工遭罪	23
VII	浙江余杭“粪水”事件——民生信任危机	26
VIII	关于“丁真现象”总分析	29
IX	19岁男孩付错车费自杀，法治的资本主义社会	37

40	如何真正实现女性解放？	X
49	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	XI
67	前资本主义社会	XII
81	托洛茨基主义评析	XIII
91	资本和权力，哪个剥削人？	XIV
95	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主要敌人在内！	XV
104	论所谓“人类共同利益”	XVI
107	群众党的组织存在	XVII
111	中国民粹主义评析	XVIII

理论

共革阵第二次代表大会

继续迈向建党，构筑全国的地下网络！

北京时间 2025 年 7 月 8 日、9 日为期两天，本组织（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正式召开了全组织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经过仔细考察具有经济能力、绝对的安全意识和严肃性的代表同志来到马来西亚，共同商讨组织的未来的计划以及对各地区各种问题的反馈。这是中国左派近几十年第一次在统一纲领的指导之下，以最严肃的、最紧迫的态度共同地去往同一个地点，探讨同一个问题，也是真正意义上被组织起来的第一次。

随着同志们唱着《国际歌》，我们共革阵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随之闭幕。这不仅代表着我们成功召开了二大，也代表着同志们做出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一切都可喜可贺，共革阵的全体成员都值得被表扬。

二大的胜利召开以及闭幕，意味着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和妥善的安排，在这里，我要对我们下一阶段的任务进行概述。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革命的建制来打败反动派的建制，并在打动反动派的过程中不断建立起自己的建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每个同志都踊跃参与到组织工作中。然而在过去，我们的各支部呈现出了一种惰性，支部得不到足够的切实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二大上各同志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总结了完善支部的各项制度的方法，以让支部能够完成分担联络、文章或时评写作等工作。

其次，我们需要的是有内核的革命者，但我们也绝不是在投放一个高质量的材料之后就认为完成对全体成员的教育任务、对外的宣传任务了，也不是说我们仅仅继续重视考察联系人的工作意愿、政治严肃性、安全性、能力水平，然后把他们招进来，联络工作就结束了。我们全体成员都要积极地持续地广泛地自发地参与到宣发和革命工作中，现在我们组织的核心简单地来说就是我们的各个常务机关，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影响力是来源于它们的，我们党的发展（到后期）也绝不能忽视它们的发展，也考虑应该到各支部及其成员的情况参差不齐的现实，而在参照中央党校项目的情况下，

重视与支部自己情况的相适应，从而不断教育组织各成员，为组织培养优秀的革命干部。

一个党不是通过多数（即支持我们的人数多）来达到我们的策略，而是通过我们的策略来达到多数的支持，我们要通过正确的纲领来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我们要注意教育和宣传的方式方法（要因材施教，要注意我们针对的群体，要确保内容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时也得培养每一个同志都成为一杆“红旗”，走到哪里亮到哪里，在同志们身边开展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的工作。这期间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我们不破冰，又何来更进一步的革命成果呢？

从这个方向中，我们可以发现线下工作的开展的必要性，我们在最后必须要在线下扎根，因为线上只是一个方便联系的工具（但是注意，我们线下的工作需要收敛点）。我们应该主动地接触学生、工人组织，对此我们应该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出预备方案。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得注意非法工作、宣传和合法工作、宣传之间的结合。合法平台的生活报的作用始终不能超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调节器的界限，因而它最终目的是导向合法平台政治报，并联系到非法平台政治报。非法平台宣传工作应当积极与联络工作相配合，同时必须作为宣传相对安全的根据地，投放阵线的基本理论和锐意的评论。

我们要真的做群众工作，不可能是原子化的单打独斗，而是搞线下的党支部，建立全国网络，而我们也不能用线上报刊的方式去招募，而是重点通过线下招募，在我们身边的群众搞类似政治结社（但是首先得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比方说，工人党员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起互助会或是其他工人组织；学生党员也是同样的，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起马克思主义学会或是其他学生社团。此外，我们也得认识到，不同

于学生（他们可以耐心读理论），工人们只能是在实践（即通过一般的生活和工作）中认识到自己要团结起来的，在早期，我们则需要先进工人去做这些工人的工作。学生在发展工作时，他们也不仅接触学生，也会接触到工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身边能够被组织起来的同志，但实际上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百人中有一个就很好了，我们必须长时间，用艰苦卓绝的实验去摸索。如果平时没有以这种方式搭建组织，那么革命形势来了，给了你机会，你也什么都干不了。我们的文章理论再好，没有长期的革命工作和宣传，一切都是白搭。

我们在进行工作时，必须注意自身和组织的安全。我们需要有不只是安全的电子产品的硬件和软件，我们也必须要有安全意识。很多时候中共渗透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他们决定对什么进行攻击，我们的手牌很少，也就容易被破防。我们必须审视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危害组织安全，技术上那只是一个指导。安全的思想必须培养。我们要在信息漏洞出现前在自我思想上完备。我们一定要严明纪律，培养自己的党性，记住不能什么都说，不要随便泄密，我们要做好后手准备。我们也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同志，大家也要多多对他们进行提问，了解如何让自己的安全系数更高。

最后祝愿同志们在这新的阶段里蠢事做的比过去少，个人收获得到的比过去多，组织影响力比过去大，组织运行的更有活力，能离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目标更近。对于读到此消息的，但还未被组织起来的同志们，请**组织起来**！

“捞女游戏”舆论风暴背后的歧视和对立——谁是敌？谁是友？

6月19日，《情感反诈模拟器》（原名《捞女游戏》）发布，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该游戏在Steam平台发售后，获得96%好评率，并一度登上全球畅销榜第五名，登顶中国区热销榜。在发售第二天因《捞女游戏》的游戏名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而迅速改为了如今的《情感反诈模拟器》。游戏上线后，游戏制作人胡耀辉和游戏官方的哔哩哔哩账号均被平台封禁，其微博话题因不明原因被屏蔽。

同时，官媒也已经介入舆论场。在6月20日，有官方背景的《极目新闻》猛烈抨击该游戏“恶意煽动性别对立”（后该评论被删除）。然而之后的《北京青年报》则大力赞扬该游戏，认为游戏有助于青年人反诈反诈、收获真爱，此评论而后被新华网、央视网等转载。同时，到6月27日左右，游戏的相关媒体账号已重新恢复。

从发售之日起该游戏及相关人员就一直身处舆论风暴中，最新的6月29日，制作组发出了三封感谢信表达对玩家群体的支持的感谢。其中导演感谢信中的“亲爱的玩家们、兄弟们、义父们、喜欢这游戏的姐妹们，以及各位主播朋友”的发言中因提及“姐妹”而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节奏。截止笔者完稿时的6月30日晚，当天的单日好评已骤降至53%，同时新增差评依然在增加。可以遇见围绕该游戏的舆论风波依然会在往后一段时间里继续。

综看这十天来的相关舆论节奏，不管是游戏名字还是其对“胖猫事件”的藏头诗等等，都注定会引爆当今社会男女对立等敏感情绪。官方的先是抨击再到后续的赞赏乃至于网传的疑似“招安”更是推动了舆论的继续蔓延和爆炸。

那么，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该如何看待其中的争议以及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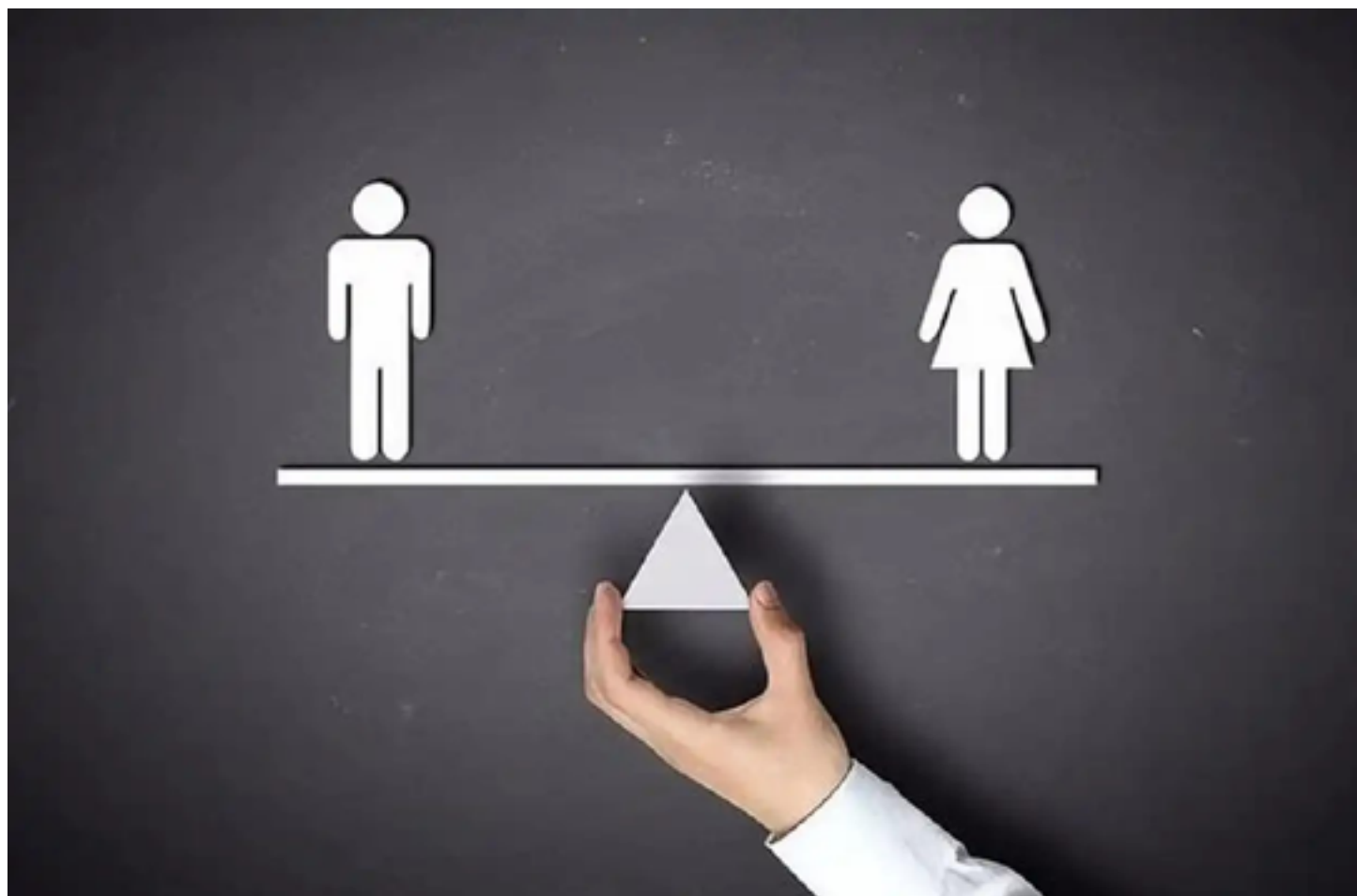
回到这个游戏最初的游戏名《捞女游戏》，其“捞女”作为在情感关系中捞取对方钱财含义的称呼自24年的“胖猫事件”（实际上该游戏的章节名也正是关于胖猫事件

的藏头诗)后就在中文互联网上逐步传播开来,并逐步延伸出诸如“龟男”等对应用语。该游戏能在发售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本身品质问题外也离不开其切中了当今男女对立情绪日益尖锐、感情被商品化,婚姻爱情沦为金钱的附属物的现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一切古老的、温情脉脉的关系都被异化,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表现在了物与物的联系间。不论是情侣、亲子、朋友还是同事等等都被用金钱去衡量大小。远古延续而来的大家庭被拆解,个人变为原子化的孤岛在商品与商品的汪洋大海中淹没。所谓“捞”也不过只是资本主义下人与人关系间比较突出的一个典例。

而对于“捞女”是否是歧视女性的说法,那么很明显这也是一种男女对立的刻板印象。对于为什么选择捞我们已经在上文谈到过他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关系的扭曲异化,而这种异化毫无疑问远不局限于某一种性别甚至某一种社会联系。那么为什么似乎我们印象中往往女性在社会中是那个“捞次”者,而男性往往是“被捞者”?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在当今社会虽然在互联网上似乎女性已经压过男性一头,但现实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女性在社会上依然是毫无疑问的受到种种方面的歧视和不公正。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弱势使得天平不平衡,因而索求与被索求的角色成为了刻板印象。



我们只需要简单看一下现实的资料就能轻易得出**女性现实中与男性相比而言的实际社**

会地位。例如最为重要也是核心的薪资待遇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方面，智联招聘在年初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男女平均薪酬差距为 13%，这一差距多年未改善。同时，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这一性别差距更是数倍的显著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的资料显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55%，远远低于男性的 76%。更低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机会，也就是经济上相较于男性处于劣势。而经济上的劣势自然带来一系列家庭地位乃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为什么这种不平等会出现？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需要一手将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力送进社会生产的大机器，另一手将更多的人赶进家庭中，以避免严重的压迫和剥削让参与到社会生产的人们团结起来斗争，而原子化的孤立家庭作为阶级斗争的监狱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在这里，女性的所有精力被消磨于家庭琐事，社会关系被局限于一隅而脱离社会。家庭作为阶级社会最为稳固和保守的根基可见一斑。

当然，这样一种“捞女”刻板印象的形成更是社会舆论尤其是政府发挥作用的结果。**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样鼓动男女之间的性别对立似乎是不利于统治秩序的巩固的，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稳定。然而，分而治之的古老治理手段我们又一次的在这里看到。通过将男女对立起来，使其互相争斗、割裂、倾轧，破坏了男女联合起来共同把矛头指向他们真正的敌人，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可能。**当然，他在这里也不能玩的过火，以避免争斗撕裂开整个社会。但是统治阶级的矛盾就在这里，他一方面需要人为制造对立和矛盾以分而治之，另一方面割裂的社会会带来不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许就会转化成奔涌的怒火使得统治阶级引火烧身。我们在此事件中看到的官媒和各平台的反复、犹豫、沉默中就能够最清晰的看到统治阶级在这个矛盾上的左右摇摆和虚伪。

回过头来，捞女游戏的巨大争议还体现为“男权女权”的互相对冲，而**这样一种对立完全是被统治阶级一手制造出来。**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在现实中真正剥削和压迫我们的根本不是什么对方性别的远在天边的人，而是我的老板，我的上司，我的领导等等，而**他们是什么性别根本无关紧要。**我们都是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兄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为什么我要和一个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的同性别者认为是战友，而攻击仅仅只是和我不是一个性别，却是真正的同阶级的亲人们呢？

抛弃对性别的滤镜和统治阶级人为制造出来的陷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向我们真正的敌人冲锋！

边检乱像：简评挪威游客 声称因手机含万斯梗图被拒绝入境

在6月11日，挪威游客 Mads Mikkelsen 入境美国时遭到边检查手机，因为持有丑化万斯的梗图导致被遣返。至少他是这样跟媒体说的。此个故事显然符合自由派媒体的“特朗普政府是独裁政府”的叙事，于是被各大媒体不断炒作。美国边检面对舆论压力也发表了辟谣，声称“Mikkelsen 被驱逐出境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本人承认的使用毒品”。

游客本人向媒体透露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一开始。一名海关官员找他说他行李中的一根香肠有问题。官员承诺会“迅速解决”，然后这位游客就被带入审讯室后，接受了长达一小时的询问，涉及运毒、恐怖主义、右翼极端主义。海关威胁他交出手机并解锁以供搜查，否则将面临法律后果。

官员在他的相册中发现一张恶搞的 JD·万斯表情包，并大为恼火。他尝试辩解说这只是梗图，而海关官员却说“这显然是一副危险的极端主义政治宣传画”。他们还在相册中发现一根木制烟斗的图片，因此指控当事人持有“吸毒用具”。据当事人所述，照片中的烟斗是五年前为职业学校的朋友制作的。当事人向海关承认自己吸食过大麻，但一次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次在德国，都是合法吸食。边检官员还翻查当事人行李、对他进行搜身、采集指纹、扫描面部乃至采集血液样本。

与此同时，边检给 Mikkelsen 的官方文书有许多猫腻。文件声称他是移民并持有西班牙护照，但他是挪威人，从未去过西班牙。他入境的理由列为“探亲”，尽管他本意是前往美国与朋友会面。报告称他持有吸毒用具，但 Mikkelsen 否认这一点并认为此处指的是手机图片中的烟斗。

从法律角度来讲，美国边检的确可以搜查手机内容，也可以以吸毒为理由拒绝入境。但综合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边检选择遣返很像是在找茬，乃至“冲业绩”——他们被万斯梗图激怒，然后找理由把当事人遣返。因此 Mikkelsen 坚信毒品只是一个

借口。

这次事件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一次乌龙或者基层公务员对好欺负的外国游客嚣张跋扈。然而，**辩证法让我们不能把事件孤立地看待**。“偶发”事件呈现出的规律性揭示更深刻的趋势。例如，三月份，一位法国学者声称因为手机上被搜到的对川普的个人意见被拒绝入境；六月初，一位澳洲作家声称他因对哥大亲巴示威的报导被遣返。还有很多案例中，尝试入境者被完全无故拘留和遣返，自己都说不所以然。

懂王上任以来的新政的重要一环便是加强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可以说，在外交、贸易、经济、财政等领域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是他的新政中唯一取得显著成效的政策。由于其本人粗暴的机会主义作风加上联邦官僚的素质低下，这些政策的实施**不断爆出丑闻**，乃至这次万斯梗图事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脚注释。在驱逐非法移民过程中，有大量持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也被逮捕，在集中营里被关押数月之久。这些事情在美国国内影响远大于此次乌龙。更近期的加州移民暴动也是将混乱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一开始，懂王要求加强边境和移民管控是受到较为广泛的欢迎的。毕竟日子人都希望改善治安，以及减少边境毒品走私。但显然，川普和联邦政府并不能将这项受到相对广泛支持的政策平稳推行下去，而是使其同样沾上了MAGA的疯狂底色。这又一次说明了**川普没有任何能力使美国的政治形式稳定下来**。确切地说，**他也是不稳定本身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群众的不满不会不会止于川普，它将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继续深化，不断找到新的代言人：16年的桑德斯和初代懂王，24年的懂王2.0，刚就任的纽约市长玛母丹尼……驴象两党都在这一浪潮下被“极化”，而最庸俗的自由派也能意识到，这意味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无可避免地滑向深渊。



七七事变八十八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是为了什么？

88年前，1937年7月7日，宛平城的枪声隆隆，震醒了沉睡的雄狮，震惊了整个世界。在随之而来的全面抗战中，中华民族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面临着的最紧迫的危机而前赴后继、献出生命。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对这个历史事件的阐释似乎被翻出了某种“新意”。请允许我对这种现象进行理性的剖析，也请不要下意识地将对这类事情进行理性分析视为侵犯道德禁区的行为——这恰恰是**最尊重现实的方式**。

一、当下的七七叙事

七七事变的经历，是众所周知的，因而有关它的叙事似乎也是无可亦无须辩驳的。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史料是多样的，综合及解释史料的方式是多元的，从而得出的历史结论也往往会大相径庭。因此，如何理解一段历史，就受到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理解历史的方式反过来也会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构建。

有关七七事变的叙事也是如此。每年的7月7日前后，各路官民媒体总要发布文章、视频，以纪念七七事变；有的网络社区也发布“禁娱”的通告。这一事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极其严肃的。这种纪念本身，作为一种被不断重复的仪式，配合着满屏“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之类的弹幕与评论，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特有景观。建造这个景观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国民道德”，是爱国的体现，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种行为足以表达自己对于“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依附、归属与忠诚。在他们看来，理解、认可、赞同与投入这种行为，显然是“出厂设置”，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的前提。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叙事很完美，可以说是自治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唯一完全胜利的对外战争，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人们才会说，对这段历史，“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因为历史恰恰是一种维系当下的纽带，

而失去对民族的认同，意味着民族的瓦解——其结果就是被分裂、被屠杀、被吞并、被殖民。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这一系列仪式才会如此重要。

但是，**我们依旧要提醒，在这种叙事中，我们还弱化了什么、简化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这种仪式的绝对严肃性提前就规定了哪些人会被它选中：英勇抵抗的士兵、舍小家为大家的民众、凶狠而蛮不讲理的敌人。脸谱化是不会被提出来的问题：提出了就是对这种绝对严肃的猥亵。结果，我们看到了一种特殊的**“国家拟人化”**：似乎在七七事变中，**针锋相对的双方已然是某种“民族精神”本身，而非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

这种简化本身就潜藏着危险的因素。它规定了反思的进路。历史已经被极端地简化为“侵略 - 抵抗”这种纯粹的形式。尽管仅仅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从许多角度考察，但是，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只选择询问：“为何被侵略？怎样才能不被侵略？”答案也是现成的：“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只有强大起来，才能不被侵略。”叙事完成了，它作为纯粹的过去指向了未来。

二、叙事何罪？

然而，这种叙事为何而被笔者称为“危险的”？哪怕是从“侵略 - 抵抗”的范式出发，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洞察这种叙事的实质。

（1）侵略者。这个叙事很少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侵略者为何侵略？答案并非中国弱小，这仅仅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其解释力也远远不足，因为这并不能解释美国为何也遭受了这种侵略——我们还需要从日本的角度考察侵略的原因。或许会有人说：因为日本人侵略成性；因为日本人贪婪；因为日本人残忍。这是人们容易从各种宣传中透露的信息中得出的结论。但是，危险性恰恰在此：它试图将问题归结于某种“国民性”。于是，就好像日本这种国家就是天生的侵略者了；中国人就是天生的爱好和平了。诚然，某个国家的决策确实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非将这种民族精神独立出来并赋予其历史根本动因的理由。这恰恰是一种倒置。就好像在鲁迅的年代，中国积贫积弱，他悲观地将奴性当作中国的国民性；近几年中国的势力在国际上强大起来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不是充话费送的”一类的言论便流行起来——正是社会物质的运动要利用精神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不是相反。

日本侵华的真正原因，恰恰不是“好侵略、贪婪、残忍”这些看似强势的因素，而是因为日本社会陷入了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对日本造成了严重伤害，使得这个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它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将资本输出至殖民地以及供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党羽，也就是说，它的一切向内的统治的手段，都遭遇了挫折，不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与其眼看着自己的统治被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打破，倒不如放手一搏，用掠夺而得的资源为自身续命。从下文可以看到，对这一点

的片面忽视是民族沙文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抵抗者。毫无疑问，为了抗日，中华民族结成了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为何赞同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会与统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相合作呢？显然，根据一个广为人知的判断，在抗战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当时中国人最有代表性的两支政治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不会与日本妥协的，而日本的威胁存在着将这两支力量尽数消灭的危险，解决这个侵略者，是两者面临的共同任务。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存续的原因。

而“侵略 - 抵抗”叙事，就有意地模糊了国共的区别，只是在片面地强调全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所有不同的中国人被统合进了一个极其宽广的范畴，就好像驱使他们做什么的就仅仅是“中国人”这一身份、“爱国精神”这种精神，而不是现实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利益关系。英雄自不必说，他们是可敬的爱国者；汉奸更不必说，他们是叛国者。一切都被一种道德区分了；除此之外再无根本的区分。难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就消失了吗？绝不，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反日又反共。阶级分析法却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亲英美派，代表着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而这就与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阶级存在着不能根本调和的矛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的侵略恰恰也是因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里不过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共产主义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绝非因为他们与民族主义者有同样的目标，绝非因为他们要将某种民族国家当作民族精神的现实实现。共产主义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因为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可以瓦解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秩序，动摇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统治，进而推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只要共产主义者取得民族

解放运动的主导权或是部分主导权，他们就可以设法在取得民族独立后立刻对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进行彻底改造，使得新生的民族国家转化为工人国家，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出贡献。

（3）战争定性。或许是出自“反侵略”叙事，在中共的官方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同盟之间的一场正义战争；尽管它对一战的定性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战争。毕竟有关抗日战争如何定性直接关系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正义”这个词便大胆地出场了。一段时间内，法西斯在中共乃至世界的政治语境中，几乎成了一个口袋，无论某种思想与法西斯有无关系，只要是被定义为“邪恶的”，在它前面就可以冠以法西斯的名讳。这与“反侵略”叙事十分契合：法西斯是绝对邪恶的，那么同他对立的就是正义的。于是，二战之前的所有历史债就神奇地一笔勾销了，法西斯就被从历史中提取了出来，成为了一种独立于时空的绝对混沌。意欲用凡尔赛条约盘剥德国的法国资产阶级不再罪恶；引发大萧条的美国资产阶级不过是犯了一点小失误；保卫殖民地的英法军队蜕化为了仁义之师，哪怕就在战争后不久它们也试图镇压殖民地的人民。既然反法西斯是绝对正义的，那么只要能够掌握对法西斯的定义权，“为了维护和平”“迫不得已”发动战争就具有了合法性。就好像美国用反恐掩盖侵略实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使用了“剿灭纳粹组织亚速营”的借口。

综上，流行的七七叙事通过将历史片面化，再利用二元对立的道德判断构建了历史的障眼法，纷繁复杂的历史在道德仪式中被异化为民族叙事的工具。

三、叙事之后

自从中共彻底背弃工人国家理念、拥抱市场以来，阶级之间的区分使得“人民”作为宽泛的概念彻底失去实际的政治统合功能，中共需要一种比“所有人，包括‘企业家’与‘劳动者’都是人民”更为高级的骗术来操控无产阶级的意识。民族就此被他们选中了，一系列民族主义宣传开展开来。“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包容开放”“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这个根”等等一系列宣传口径在各大平台频繁出现，这些言论或明或暗宣扬某种中华特殊论、中华优越论，利用民族优越感对冲阶级矛盾紧张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对于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来说，这种宣传确实能骗到人。真的有人会认为“我的生活这么差全是因为美西方打压，我们必须让中国强大起来”，却忽略了近在咫尺的敌人——自己的老板。克扣、拖欠他们工资的，让他们无休止加班的，侵吞他们健康与年华的，正是他们的雇佣者，他们的阶级敌人，而非远在海外的某个民族。

近几年更进一步，民族主义宣传逐渐向民族沙文主义的方向转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资本逐渐扩大自己的地盘，中国的外交部越来越“硬气”。“厉害了我的国”，

围绕“国之重器”的宣传更加突出。无论是前三十年的两弹一星，还是近期的歼-20、六代机、航母战斗群、万吨驱逐舰、新式舰艇“下饺子”、军用机器狗，中共越来越有意让被宣传者知晓中国武备的强大。军校待遇的提高、阅兵的造势，中共可能在期望社会尚武风气的复苏。最直观的还是年年攀升的军费，2014年约0.8万亿，2025年已经攀升到1.7万亿。即便如此，仍然有人觉得“军费还不够多”，这直接地反映了中共对强大军事力量的追求。于是一系列宣传自然地将军事的发展合法化了：你看看，我们本来是热爱和平的，奈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前有七七事变为证，为了不被侵略我们必须强大。

但是，中共所发展的军事力量是否真的仅仅是保卫国家，恐怕就两说了。中国除了明面上以台湾、美军为假想敌进行的各种军事演习以外，暗地里也在利用军事与美国争霸。俄乌战场的无人机、印巴冲突中的战斗机、伊以冲突中的导弹防御系统、胡塞武装的导弹等，都可能带有“中国制造”的痕迹，这也表现了中国资本的野心和胃口。可是，民族沙文主义者却为此拍手叫好，全然不顾中国同美国争霸的行为不过是为了中国资本的扩张与维持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如果这种争霸激烈到了需要世界大战的程度，那么无产阶级收获到的只有一个高压的军政府、断崖式下跌的生活水平与尸山血海。

中共“铭记历史”的一系列民族主义宣传，实际上不过是统治危机下的借尸还魂：经济危机，各行业不景气，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更加严重，阶级斗争愈发激烈。中共用这一系列的仪式召唤那个最纯粹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用民族主义的道德律令筑起阶级统治囚笼。但是，人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出厂设置”，出厂设置论预设民族国家的神圣性，把历史构建出来的东西当作永恒，结果把人本身也扁平化了：人首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个复杂的个体。他们的生存首先是由于自己付出的劳动，而非国家的恩赐；毋宁说国家“赐予”的和平环境本身也是资本能够有序地压榨他们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出厂设置”，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悲惨处境充耳不闻。

中共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实验，亦即对日本的仇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经不少人喊着“山川异域，不共戴天”“彻底清算日本”等等口号在各大平台出现。借助对七七事变历史的片面化宣传，中共虽然还假惺惺地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但是一些民族沙文主义者喉舌已经坐不住了，他们主张“血债血偿”，恰恰违反了珍爱和平的原则。中共的珍爱和平看似符合普世价值观，但是其倾向性的描述与实际的行动反而使其目的昭然若揭。他们实际是要为自己的扩张张本，他们口中的和平不过谎言。

四、如何对待日本？

当然，指出中共的反动内核，绝不代表认同日本侵略者与当今日本右翼的行径。日本

侵略者无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掠夺、屠杀、人体实验，这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今日本右翼隐匿真相、篡改教科书、公然撒谎，甚至参拜为战犯而设的靖国神社，其心可诛。但是，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抗战时的复杂性，日本社会当时也存在复杂性。侵略扩张从来都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普遍诉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对运动。由此可见，因为某种“历史的罪恶”便把一个民族全体都当作邪恶之徒是多么愚蠢，这种人正是中了中共反动宣传的诡计。

他们提到历史绝非想要客观地让人们了解历史，而是刻意抓出历史的一部分、掩盖另一部分，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利益。日本也并非与中国有什么血海深仇。至迟在秦汉时期，中日之间就产生了商贸交流；隋唐时期日本学习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这个时期中日关系总体还比较友好。尽管元明时期日本海盗确实对中国沿海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但这一现象同样是日本社会崩溃、中国闭关锁国、南洋贸易兴盛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亦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判。现代，日本的汽车、动漫等强势产品传入中国，双方同处在一个世界经济的整体之中，本身就是相互依靠、相互依存的。如果像2012年发生的打砸日货事件，反倒是违反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渴望自由流动的资本都不会被国界束缚，无产阶级又怎么能以邻为壑、作茧自缚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亲日派。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并非由什么民族矛盾规定，而是由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日本资产阶级目前暂时依附美国资产阶级，因而中共引发的仇日思潮，实际上也是对美国秩序的挑战，但是，无论是中共的秩序，还是美帝的秩序，都是对无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秩序，都不是我们欢迎的秩序。

无产者没有国界。资本主义将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为了增值到处吮吸剩余价值，结果也让几乎整个世界的无产者都受到差不多严重的压迫。日本的垄断资本长期以来利用无产者之间相互竞争获取超额利润，却将无产者逼得普遍采用躺平摆烂的方式做出无声抗议，这一点与中国的新一代无产者处境何其相似，双方几乎就是隔着黄海的镜像。**资本主义让全世界的工人们陷入同样的困境，工人阶级想要反抗，就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戳破民族沙文主义的谎言，用国内革命战争回答国际争霸战争。共产主义者们必须用各种可行的方式破除狭隘的民族观念，让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代替自发抗争，从而完全推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

因此，我们铭记历史，绝非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和平。这种和平绝非中共所谓的和平：因为那种和平不过是一种空虚的和平，其在国外以霸权之间的相互平衡为基础因而是脆弱的，在国内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断剿杀为基础因而是虚伪的。我们要的和平是人类整体的和平：当全球范围内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时，我们才真正有可能迎来和平。

大学一宿管因高温 离世——乱葬的劳苦大众

清晨，他躺在自己曾无数次依靠过的那把椅子上，也许，该起床工作了。可是**好热，好热**啊，热得让人慵懒，让人**痛苦**。他发出震耳的**呐喊**，试图驱散这黎明前的黑暗——可是他再也做不到了——作为一名**大学宿管**，他**死在了**闷热的平房里。

2025年7月6日上午7:30分，**青岛大学浮山校区**，一位宿管人员被发现晕倒在值班室，后经急救人员确认已**不幸离世**。校内外引起广泛**同情与抗议**，迫切要求改善各地普遍的高温问题，教学环境，以及劳动待遇。

同时，**学校与雇方**也表示“深感痛心”。可是，我们不需要**凶手**居高临下的怜悯！只因为这件事的关注度太高，你们才不得不在发布通报，才不得不感到“惋惜”吧！

事故背景

据消息，逝者名为**张某某**，是**青岛大学浮山校区滢园宿舍区**一名58岁的男性**宿管员**。被发现死在6平米的值班室，里面**没有空调**，**窗户对着垃圾站**，**通风很差**。有学生在值班室用温度计测量，其温度为**43.2℃**。

在离世之前，青岛当地的天气**非常炎热**，很多学生宿舍同值班室一样没有空调。就在6日早晨滢园宿舍内就另有一名学生**中暑**被送往医院治疗。而宿管大爷值班室**只有一台风扇**，还是自己出资。他曾向后勤部门提出安装空调的请求，但被**推辞**。

但校方声称往年并不热。他们当然觉得不热，因为行政大楼冷气足得让人打摆子。

不得不提的是，青岛大学曾花**125万**建立智慧宿管系统。同时，令人意料之中的是，留学生宿舍有空调，还有冰箱和厨房。青大是**留学生的天堂**，而本国学生只是“二等”学生。

在事故发生后，校方和物业相互**推诿**：

青岛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称：“学校的宿管都是外包出去的，统一由物业管理，可能一栋楼两三个宿管这样轮流值班，包括宿舍楼里面，卫生打扫也都是物业来管。”



那么大爷离世前的**工作环境**，其要求安装空调的**请求遭拒**，以及**后续的责任赔偿情况**等又是怎样呢？！可是校方**均未回应**。

而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则声明称，离世人员非该公司员工或外包人员，随后该声明**被删除**，无法查询。

同时，其他各方相关人员几乎均**否认责任**。空调准备装上了，但是他却死了（真是“巧”啊，对吧？），其身份与贪款一同成了**悬疑**。这位亲切，随和的陌生人永远睡去了——那千万基层劳动者的缩影。更加令人愤慨的是，被曝出大爷同保洁阿姨**被拖欠 8 个月工资**！那这又是归谁管？又是谁的责任？这件事的核心矛盾，真的只是一部空调的缺失吗？在**领导们**和**资本家们**看来，也许都是劳苦者们的自作自受吧！？够了，不要再玩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了，是你们杀死了他，他是在**官僚资本集团**的联合绞杀下痛苦死去的！

所谓劳动法，所谓伟大复兴的各种“伟大成就”等美丽的大饼在这里消失的无影无踪，只留下无数具骇人的尸骨……他们是谁？是所有在雇佣劳动下**被剥削致死的广大劳苦群众**！而他们艰辛的劳动成果，几乎全部被占有，留下的只有微乎其微的，最终也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一点施舍。

学生与工人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面对此种情形一同发出了他们**震耳的呐喊**，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领导”们，“企业家”们，快快睡醒吧，走出空调房，去敷衍，去蒙骗吧！去掩盖，去镇压吧！

社会反响

事件被曝后迅速传播开来，冲上各大媒体热门。人们纷纷发出抗议，迫切要求改善劳动与教学环境。

青岛大学作为山东省内**顶尖**的大学，按说在基础设施方面该十分到位。可看看学生们曝光的宿舍环境和大爷的值班室图片，网友们均对这所学校产生了质疑与愤慨。校内学生也纷纷叙述宿管大爷的**亲切善良**，以及对校园环境的抗议。并使部分考生删除了青岛大学志愿。于此同时，人们也**自发地开始声援**广大底层劳苦者，多么**可贵**的举措啊！

怎么办

可是仅凭借善良，以及要求极小的改良，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呢？

朋友们，放弃所谓“特色主义”的幻想，**揭穿**统治阶级的蒙骗，重新**拾起**真正科学的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吧！他向我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下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矛盾**，只有**彻底消灭**生产的私有制，代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人民得到**真正解放**，最终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

同学们，你们正处于朝气蓬勃的时候，也是在投入生产前最有时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教会我们如何科学认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它教会我们怎样去打破私有制这个横跨千年的罪恶，教会我们怎样真正地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组织**起来吧，继续与资本主义战斗吧，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真正的使命，也恰恰是官方教科书竭尽所能去掩盖的东西。

劳苦者们，你们直接受到资本主义**最深重**的剥削，是受奴役**最沉重**的人。资本家从你们那里夺走了一切：财富，生命，时间，幸福……他们花天酒地，油光满面地**欺压**着你们，**贫穷**的你们沦为机器的附属物，在持续的剥削下艰难生存……啊，拿起你们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吧！相信自己的力量，一齐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吧，向所有剥削者发起冲锋！

在此，向一切死于压迫的同志们，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卢女士找表，地方官长脸，环卫工遭罪

2024年7月2日，山西省大同市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讨论的“寻物事件”——数位环卫工人，在炎热夏日中，用时四小时，翻找八吨混合废弃物垃圾，只为寻找一块儿童电话手表。乍看之下，这是一桩政府响应市民诉求、民众得偿所愿的正面案例。然而当事件的深层背景逐步浮出水面，这背后却出现了一系列权力运作的黑幕。

这起事件的当事人，是一位在媒体上化名叫“卢女士”的游客。据报道，7月1日，她带着家人从山西太原乘坐高铁前往大同。列车行进途中，她的孩子把自己的手表装入一个纸质垃圾袋中。下车时，一家人匆匆离开，就把那个袋子忘在座位附近。

这只被放入纸袋的电话手表并不便宜。根据媒体上公开图像资料比对，可通过侧方按键位置和大小初步推断该设备为“小天才Z8A”型号的儿童智能手表。该型号手表支持GPS定位、支持双向通话与家长远程监听，其价格通常在人民币1200至1400元之间。

事发第二天，卢女士通过12345市民求助热线投诉渠道发起寻物请求。借助小天才手表自带的GPS定位功能，她迅速获知手表当前所处的位置——位于大同市垃圾处理站。换言之，这块手表在保洁清理车厢的时候随着高铁上的日常清洁垃圾一起，被送入城市垃圾转运系统。

从这开始，事情就开始与正常的寻物产生了差别。垃圾中转站汇集的垃圾为混合型生活垃圾，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极易产生气味、滋生细菌。在这种情况下，大同市城管局协调大同市新城环境公司派出数名环卫工人，对其中一批垃圾展开了全面的人工翻找。

官方与媒体的后续信息显示，当天垃圾站接收到的混合垃圾总重量为约八吨。现场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气温接近33℃，垃圾带来的高温、异味、蚊虫和粉尘极大地增加了作业强度。环卫工人仅凭肉眼观察与手工翻找，在八吨废弃物中一点点寻找那块巴掌大的设备，整个过程耗时四小时左右。最终，那块被孩子无意丢弃的手表终于被找回。

若故事到此为止，这只会是一则关于“中国公共服务效率”与“失物复得”的普通故事，可能连在地方流媒体宣传平台上都不会占太多版面。但是，随着“卢女士”的真实身份被曝光，整个事件背后巨大的权力阴影开始逐渐浮现出来。

“卢女士”的真实姓名为卢欣，女，1981年2月出生，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有法学学士和管理学学士双学历。作为公检法系统出身的她，卢欣现任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宝安区纪委委员，三级调研员。并长期担任领导班子的核心助理角色，分管政治部（含机关党委、督察室）、司法警察大队等部门，工作重点涵盖党建工作、机关管理、组织人事、政务调研等方面。



卢欣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游客”或“一般群众”。**她根本就不是劳动群众的一员**，作为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她在面对这种事情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关系与资源调动能力。这很可能不是单纯的官官相护，而是卢欣作为此前有过多外派经历法院调研员，有很大可能就在其职业生涯中与现任大同市的官员有或多或少的交际。

在卢欣事件发展到7月4日的时候，毫不意外地触发了中国的社会舆情预警，于是卢欣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后续几天内全网注销，截至目前**关于卢欣的所有新闻全部被严重限流以阻断投放**。统治阶级感受到了事件发酵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为人民群众清楚：

“不是每一个12345求助，都能调动八吨垃圾站。”

如果今天丢失的是一位基层劳动者的手表，根本不会有城管局调配垃圾站，也不会有人冒着酷暑在八吨垃圾中翻找四小时。**让人们愤怒的不只是“我能不能”，而是“她为什么能”**。普通人拨打市长热线能得到回复，只有一种情况：问问投诉教育局、举

报学校的学生吧！不过几小时，校领导和警棍就会找上门口。问问控诉资方的工人吧！不过多久，中华总工会的干部就带着队伍来劝降。

有的人说“卢欣是个广东的干部，哪有能力使唤山西的官啊”。但是，即使她没有直接“打电话找人”，她通过12345发起的求助请求本身，就可能**因其身份而被系统自动“高优先级处理”**。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任何在中国几乎只要是和公务系统打交道的人都有可能遇到。而这恰恰就是中国行政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一个非正式却运转高效的权力协同网，一个非正式、不书面、不留痕，但在资源调配与维稳事务中极为高效的灰色机制。**

事件发生后，从“12345 热线”介入，到垃圾处理站人力调度，再到现场翻找行动的**实施**，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出现可供追责的命令链条，但实际运作却近乎完美。在中层行政官员的经验判断中，使自己的晋升仕途更加开阔的自然诉求早已导向了“对体制内上级 / 同级提供必要配合”的潜规则的形成。一旦知晓事件牵涉公检法系统干部，立刻就会默认对接处理。

这套权力协同机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即使没有暴力部门出手，但它却依旧高效、每个人都只“做了本职工作”，但整个系统却齐刷刷地为一位特权者让道。**它无需阴谋和贿赂，因为整个系统的“默认行为逻辑”就是——不为陌生人让步，而为熟人和特权动用资源。**

这准确来说不是腐败，但比腐败更隐匿更难对抗；腐败是非法的权力勾结和特权阶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合法的腐败”**。这就如同一个普通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了**他的劳动所得**，被称为“非法”。而资产阶级每日对工人阶级秘密的剥削，则是合法的，人民企业家们建设祖国的贡献。

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用统治阶级自己定下的条例去束缚、质问他们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于明面上、违法的压迫和剥削，**背地里、合法且受国家机器保护的压迫和剥削，是更恐怖的**。他们不需要贪腐，即可享受特权。这个中国没有“青天”。

浙江余杭“粪水”事件——民生信任危机

2025年7月16日清晨，浙江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仁和街道多个小区的业主发帖称，家中自来水出现疑似粪水的刺鼻异味，呈浑浊的黄色并且有奇怪沉淀物，无法正常使用。部分居民使用自来水后皮肤泛红、瘙痒，甚至腹痛呕吐。事发后，民众拒绝使用污水，周围的瓶桶装水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给居民日常用水造成严重困难。

负责当地水务的杭州余杭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到7月16日晚上21点44分才向民众发布通告，向其致歉，称水质已恢复正常，让户主自行排水，后给予5吨水费（约15元）减免。

但网友反映家中自来水依旧有味。水质并未像通报的那样恢复正常。直到17日深夜，仍有居民小区自来水停供，居民不得不在临时取水点排队取水。7月19日，官方发布通告，认定导致异味的为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物质，具体原因还需等待调查结果，这一通告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此次事件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并在互联网引起热议，人们纷纷抱怨官方的不作为，态度敷衍，补偿少等。

为谋取利润，不为社会福祉

该事件中的“未及时清除藻类”“水源监测失灵”等问题，反映了水务企业的私心：他们为压缩成本，长期削减管网维护、水质监测等必要投入，结果导致了此次事件的发生。这就是资本逐利带来的恶果。公共事业不再为群众服务而是门生意，将利润置于民生保障之上，直接导致了居民健康受损，日常生活困难，水资源抢购等事故发生。

直到污水扩散到整个自来水供给系统并被居民发现后，水务公司才不得已“整改”：延迟发布事故公告，以“水质已恢复正常”进行搪塞，将居民的人身健康漠然置之，每户仅赔付约15元人民币，远不及居民采购水源，户外洗漱等成本，这是资本将危机代价转嫁给民众的典型操作。第二天，公司将问题归咎于“自然因素”，以掩盖自

身管理失职。

同时，官方优先查处“网络谣言”，延迟发布溯源细节，并压制舆论发展，封锁消息等，反映了其维护秩序、压制民众合理诉求的阶级本能。政府虽介入调查，但并未给民众一个确切交代，反而以“自然因素”定性事件，极力回避人为因素，这又显现出政府为财政收入、逃避责任与资本勾结的丑陋勾当。

事件引起了这么恶劣的影响，对涉事企业会有什么惩罚呢？根据《城市供水条例》可知，这类事件罚款上限仅 3 万元，远低于资本违规收益。对于企业，一群底民的卫生健康，相比于利润是更值得牺牲的代价。



市场大背景下无合格的公共服务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居民连水务运营的知情权、参与权都没有，仅有的权利不过是被动的接受“人民公仆”的“服务”，那这算哪门子公有？支配水资源等公共资源的权力早已归属统治集团与上层阶级，所谓“公有”也只是资本家所有罢了。

综上，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公共服务被异化为资本运作工具。从供水公司这种基

层企业到中国的国家机器，无论是政府，法律，都成为了维护资本利益的工具，这也就是“人民企业家”们一次又一次作恶的底气。至于民众怎么样，在保证自身利益损害最小化的前提下，随便糊弄就行了。

本次事件中也呈现出明显的贫富分化：富裕居民可以通过购买瓶装水，异地开钟点房规避风险，而底居民却只能被迫承受健康风险（腹泻，皮肤瘙痒等）和经济损失（净水滤芯更换，就医费用）。至于水务补偿的15元，在他们的实际损失前简直就是个笑话。这类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如今被转嫁在居民自己身上。

可是，民众不是傻子，虽然起初发生了抢购的混乱现象，但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在此次事件中所展现的自发潜力：有人传播消息，有人自发运送水源，有人组织抗议活动……人们对官方虚伪的通告失去了信任，在压迫下自发行动起来。大家很清楚，静坐等待官方“反应过来”无异于等待“渴死”。

资本主义制度下，此类事故将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中央给予多少重视，签署多少法令，规定多少章程，资本的逐利性质必然使它为了利益赴汤蹈火。公共服务在这个体制下就像一个填不满的黑洞，多少资源流入最后都不会实打实提升基层群众的生活质量。相反，维护、开销被一砍再砍，人民的钱被装进负责人的口袋里。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公共资源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让体制致力于提升民生福祉，而不是创收更高利润。

这个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主义。

关于丁真现象总分析

鸿运齐天

2020年，当丁真去他舅舅家吃饭时，碰上了改变了他一生的摄影师胡波，恰巧的入境使他迅速成为了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相关影片展示着他纯真无比的笑容，使有关这个笑容的讨论在热门的短视频平台抖音迅速变得火热朝天。拜互联网的传播力所赐，丁真迅速走红，其原因非常简单粗暴：丁真的笑容所展现的草原生活的淳朴，在日益枯燥乏味又功利导向的现代社会，触动了人们内心的对于回归本真质朴、自然和美的向往。随着关于“丁真”的讨论越来越热火朝天，甚至出现了国际化发展的趋势：韩国的《中央日报》也在随后报道了丁真的笑容，丁真本身的“价值”开始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就像狗闻到屎一样前赴后继地去到四川理塘当地进行追踪报道，顺带着，整个理塘也因为丁真一人的走红开始备受关注。

四川文旅反应非常快，同年11月25号就已经和时差鸟联合出品了由丁真参与拍摄的礼堂旅游宣传片《丁真的世界》，获取广泛关注度，理塘摇身一变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互联网流量给理塘带来了泼天的富贵，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和自媒体，人人都想在这波热潮当中分一杯羹。同年11月29日，中国官方下场表明态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连发三条英文推文向海外网友宣传丁真。2021年2月，丁真首次在卫视春晚登台亮相，并倾情演唱了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从此，丁真身价水涨船高，先后参加了联合国演讲，担任了理塘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国企员工，并成为了在中国互联网上一个代表着流量的标杆人物。

但是，随着丁真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越推越高，相关的批评开始涌现。网民对丁真这种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藏族牧民，仅仅是因为一张纯真的脸庞就能够获取大多数人无法获取的社会资源感到非常不痛快，许多寒窗苦读的人士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获取的国企职位，他只需要一个笑容就可以获取，这显然在嘲笑和戏弄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奋斗和努力，这引发了公众对于丁真这种“走红”的道德合法性的严重质疑。不

过，这种质疑很快被媒体机器筛选灭杀，当批评开始愈发尖锐地指向社会的分配制度时，不知来自何处的神秘力量迅速压制了这种声音，并且它派出了它的先锋喉舌——2020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发表署名杨鑫宇的评论文章《“做题家”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使用网民反映接受过应试教育的自嘲“小镇做题家”，批评攻击者将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投射、宣泄在丁真个人身上。批评的声音遭到媒体机器的绝对暴力镇压下，开始走向了解构主义的道路，批评群体被迫只能拿着无关痛痒的点去进行批评，例如只是对丁真在采访当中说错话、抽烟等进行艺术加工的恶搞，内容上越来越远离了它的初衷——对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和畸形的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不满。

囚徒困境

这一次也是辩证法的胜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小镇做题家”们对丁真的批评，到底是不是源于他们人性当中丑恶的嫉妒、嫉妒丁真那样俊俏的脸庞没有长在“做题家们”的脑袋上、嫉妒丁真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获取到他们获取不到的资源呢。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做题家们”的抱怨到底是不是真的？诚然，无论营销团队和官方如何在丁真“山鸡变凤凰”后“揠苗助长”，都不能短时间提升丁真的知识文化水平，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装出来的，答案无论怎么样做修饰，都不能有一丝的改变——那就是丁真确实没有在学业上付出过和大家对等的努力（在这里可能会有人说这是因为丁真的资源问题，不过这是另一个领域的探讨，下文会回到这个问题来），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系统的文化教育。按理说，中共一手渲染起来的国企岗位的“登天之路”，先不说丁真有没有资格参与，而是丁真本身的能力，公共知识储备，居然任何考核测试都没有通过就获得了岗位，破天荒地违反了大家对于考核竞争的一概印象，且所持有的筹码，仅仅只是一张羡煞众人的俊俏脸庞。这就是摆在大家眼前板上钉钉的事实。那么可不可以说，一张俊俏的脸庞和纯真的笑容，是等值于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和坚持不懈的呢？就算我们不做具体的量化，二者也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答案非常清楚，“做题家们”一点也没说错，所谓的“稀缺资源”，即颜值，就这么潇洒地踩着无数人的汗水登上象牙塔尖，**丁真的成功，讽刺了所有“做题家们”的辛苦付出，原来都比不上别人一个笑容。那么“做题家们”的这种抱怨就不是错误的，甚至这都不是抱怨，而是面对这种不公分配的合理质疑。**

那么官媒是怎么回应这种质疑的呢？像杨鑫宇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文章中公然写道：倘若一个“做题家”的生活基本令人满意，足以回报其求学生涯中付出的努力，他根本就不会去在乎这位康巴小伙是否幸运，以及他又是靠着什么才得到了这种幸运。明里暗里都在批判着大众的质疑，认为大众的质疑本质上是对自己无力改善生活的无能狂怒，只能将这种对自己不满的情绪宣泄到成功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如此傲慢的、姿态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他作为统治阶级的喉舌，作为官方媒体的其中一个代理发言人，先是以一种极度丑陋的姿态回

避了大众最初的核心质疑——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更是反过来倒打一耙，攻击大众是心理不平衡的狂热犬儒，无法接受别人的成功而只能无能狂怒。



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做题家”这个称号，是多么的令人无奈。它的背后是莘莘学子们无法量化的奋斗，在每个挑灯夜读的晚上，无数人绞尽脑汁背诵，解题，为的却是一个十分迷茫而不稳定的将来，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每一位都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极有可能发生的是，即使他们已经拼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应付考试，却依然名落孙山。这真的是因为无能吗？事实绝非如此，那些只占有“自由”的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有责任异化自己，向资本家阶级展示自己创造利润的潜力，向统治阶级展示自己的意识形态服从度，就像把自己变成一个商品一样放到劳动力市场上任人挑选，或者是把自己改造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绝对傀儡，这样他们才能获取劳动机会，从而保障自己的生存。所谓的“做题”，只是无产者被允许拥有的机会，然而他们还是需要互相斗个你死我活，尽管在统治阶级眼里这是合法且正义的，因此那些被排行榜折磨到死的“做题家”，他们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苦心打造的产业后备军，是那些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最需要团结的劳苦大众，是真正掌握着社会运作的劳动阶级。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半路突然杀出来一个丁真，他无需参与任何的考核，无需付出与他人相当的努力，他**只是在镜头前笑了笑，于是就莫名其妙地取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

他迅速跳过了所有的考核步骤，获得了劳动阶级们争得头破血流都争不到的资源。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统治阶级口舌有为此作出解释吗？答案是没有的，他们至今都逃避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它们自己一手建立的严格的晋升考核制度如今可以如此儿戏，如此不严谨而又如此不公平，他竟然还要反过来，攻击提出质疑的人是“嫉妒者”。

紧接着，统治阶级口舌下了一步极为阴险的棋，那就是利用群众的质疑去攻击群众，并分化群众本身。通过攻击群众是无能的嫉妒者，统治阶级成功将问题的焦点从丁真背后可笑的不公制度转移到了丁真本身，并利用丁真来吸引部分群众的同情，从而进行群众的分化瓦解。它首先利用它的国家机器控制群众的质疑声音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并派出它的忠实信徒当所谓的“讲公道话”的“好人”，他们大力鼓吹反对对丁真的网络暴力，并从而误导部分群体对丁真的遭遇产生同情，从而让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丁真的“成就”，打消自己对背后制度不公的“质疑”并合理化自己被剥削的事实，矛盾的焦点转移后，统治阶级正好就可以利用所谓的网络暴力的理由进一步将批评压缩得所剩无几，以至于红线终于划到了劳动群众们退无可退的地方。从而，对丁真现象的质疑开始走向了它的表面——它愈加流于对丁真本身的攻击，批评开始走向解构主义，由于统治阶级的机器暴力，劳动群众无法再直击问题的本质核心，而是开始对丁真本人的特质进行恶搞解构，嘲笑丁真本人的口音、失误、行为等，随着时间的沉淀，丁真也越来越在表面上脱离了“丁真现象”，尽管我们极富创造力的劳动群众，在黑暗中依然发挥了他们最伟大的主观能动创造力，通过填词作曲来隐晦地表达对制度的不满，但是相关的批评作品缺乏系统梳理，信息非常发散，而且为了掩藏真实目的又不能不流于形式和表面，因此不免又导致了部分群众倒向对丁真的同情——至此统治阶级的目的已经达成，群众已经不甚团结，对“丁真现象”——即“灵活无比”、可操作性极高的分配制度的批评，变成了对丁真本身的批评，攻守交换了，群众的质疑变成了统治阶级手里质疑群众的武器。

无产者们进无可进，退无可退！

提线木偶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批评丁真，从来不是因为他抽烟，或者是在直播采访中说出一些惹人发笑的话，而是批评丁真的出现，反映着的是那个被统治阶级粉饰得极好的、所谓“公平”的竞争制度，它表面上大手一摊表明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去争取，失败不是它的责任，但是它却可以高高在上地当这个规则的话事人，随意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操控这个制度，而并不会选择去遵守自己一手建立的制度。一方面，这和资本主义的虚伪面庞异曲同工，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统治阶级总是将所谓的“普世价值”大力宣传开来，脱离实际生产关系地去用各种道德礼教规训人们的行为，但是往往他们自己就从不遵守这些规范，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关于家庭和家庭专制主义》一文中所提到的：

资产阶级十分伟大地表明它以先进的制度打破了封建专制对于家庭的规训，强调个人婚姻恋爱自由，表明自己没有权利干涉个体的婚姻，但是往往资产阶级本身的婚姻是最不自由的，因为它对婚姻所起到的物质继承和再分配的作用比无产阶级要来得更为病态而强烈。另一方面，这无疑是我们展现了无比清晰的一点：那就是一切的带有私有制色彩的统治阶级所设计的竞争制度，无论它如何用言语做修饰，如何在形式上迫切地展现它的公平，它总是本质上作为统治阶级用来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它给予了一个“希望”予广大无产阶级群体，让无产者们为了生存忘乎团结，互相争个头破血流，这样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统治阶级便可高枕无忧，享受无产者内斗的劳动成果，因此，他们最为鼓励竞争，并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每一个无产者个体上，然后故作姿态地表明个体的失败和它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无产者自己能力不行，而且在这个被设计好的制度中胜出的无产者，会非常自然地沾染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多数会反过来攻击他们的阶级兄弟姐妹，而不是同情他们，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产者们便会开始麻木，并丧失对制度不公的怀疑。

而且丁真一事，笔者认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中共统治阶级为什么会突然大发慈悲地帮扶一个四川山里的康巴汉子呢？这个问题的来由就是在丁真之后也不乏有相似的来自草原的一些俊俏男子也尝试复刻他的成功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只有丁真是幸运的宠儿呢？难道说是中共文旅部长看到丁真的纯真笑容后春心荡漾，脑门一拍决定就捧他？还是说中共有风水大师对照了他的时辰八字，发现这人能保中共江山永存？无论怎么想，这都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的走红，莫名其妙的捧红。

中共到底获得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它现在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不会做亏本买卖，至少不会想做。因此捧红丁真，一定有它的利益需求。我们就来看看中共在2020年到底在面对着什么。首先，中共在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已经快要到达临界点了，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了3年，中共内部软弱的官僚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面对帝国主义的突然发狂和歇斯底里只会选择让步和退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统治，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关税加码，它只能选择大幅度压缩出口商品的货币价值，从而打破美帝国主义的贸易壁垒。但是这有一个很明显的代价——那就是成本的扣减一定是从劳动力开始的，商品要变得廉价，那就必须低附加值，因此一定要压缩劳动力成本，但是商品高度流动需要货币的高度流动（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交易掩盖商品交易的假象），因此一定会带来通胀，这就导致了劳动力价值跟不上商品交换价值的增幅，甚至二者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自2018年起，经济明显开始转向下行。同时，新冠疫情的出现带来了两个对于中共来说非常棘手的问题：第一是疫情防控大幅度减缓了商品生产，甚至是导致商品流动停滞；其二是使中共在国际舆论上占据下风，在中美摩擦进入白热化的同时，中共极度需要扩张和改善国际政治影响力。

中共有几个问题需要同时解决：第一，必须抵消贸易持久战带来的冲击；第二，疫情

导致实体商品流通近乎停滞，需要另辟蹊径；第三，需要在国际政治的舆论场上扳回来，而且第一步要在国内稳住舆论阵脚，因此最好的工具是民族主义。



仔细想想，丁真的出现，恰好就撞在了这个枪口上。实体商品流通的停滞，需要大量的消费去刺激它“移土转生”，而恰好还真的有一种转生术——那就是互联网虚拟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在那几年间“直播带货”犹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冒头，同时，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互联网文化的精神生产，也开始被鼓励起来，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刺激到大家掏空手里的钱包去帮助商品流通，打卡成为了一种文化，许多形式主义的消费也被疯狂鼓吹。而丁真，就是其中一员，像丁真这样的互联网流量代表，就是在2020年后迅速野蛮生长，这种精神生产刺激了大众为互联网经济买单——周边，打卡，旅游，联动商品等。这也是为什么，四川文旅和中共对丁真的出现甚为紧张，**不是因为**

他们突然大发慈悲想要帮丁真改善生活，而是他们急需一个又一个的互联网噱头来帮助刺激商品流通和货币的流通。其次，丁真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中共在国际上进行政治性宣传，新冠疫情和美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导致中共急需在国际舆论上找回场子，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而丁真就代表了中国内地独特的一方民族文化，以此来作为宣传，尝试利用丁真的民族特色来作为扩大自己国家机器的文化影响力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作为中共的头号喉舌，会如此积极地连发三条推特进行宣传，目的就是在中共意图利用这种独特的文化产物在国际上争取视线和支持。最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历史深厚而源远流长，中共有责任促进民族的融合，以及展现民族融洽的相处，这不是因为它真的很关心每个民族，只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它的统治而已，而且在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时，民族主义总是最好的团结手段，因此中共也尝试了利用丁真的少数民族的身份，来加强劳动群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从而使他们将视角重心能够放在“宏大的”历史发展和国家人文上，以及门外的美帝国主义者，从而能够更加忍受自己被剥削的处境。

因此，丁真是不是丁真，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被中共利用起来满足他的利益需求，所以在本质上他更像是一个提线木偶

饮鸩止渴

丁真事件里比丁真更值得玩味的，就是丁真背后的四川理塘——理塘背后的反映的中共的地方经济发展策略的“饮鸩止渴”。

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就要问中共一个问题了：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先富带动后富”在哪里？上海如今纸醉金迷，霓虹炫彩，为什么体现不出他的老大优势，帮助四川理塘发展呢？丁真没有文化是丁真的错，还是理塘的错？还是四川的错？还是中共的错？为什么四川理塘的发展可以如此落后，为什么先富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后富当中去？为什么丁真不可以一早就享受到教育的福利？为什么地方的经济结构可以畸形到必须依靠一个人的流量名气才可以撑起？

无数像理塘这样在丁真走红前籍籍无名的中西部乡县城镇，他们为改革开放贡献了他们仅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换来的却是东部城市的贪得无厌和中共政策的偏袒，它们长期处于一种缺乏政策支持、缺乏劳动力、缺乏天然资源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给开放让步，刺激市场经济发展，中共实行地方财政包干，由地方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策略，中央和地方只需要签订税务合同，每年地方只需要上缴固定比例的税款，其余由地方政府作自由支配。我们的自由市场真是“太伟大了”！它直接催生了地方经济壁垒以及土地财政的畸形应用——为了争取税款指标，众多东部城市直接选择了快准狠的方法，那就是让渡土地使用权，利用政策优势带来的虹吸人口效应，迅速导向房地产产业赚取暴利。而中西部城市呢？地方劳动人口流失使农业一夜暴毙，三农

问题开始扼住了农村的咽喉，欠缺优势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使它们又难以发展出完善的工业化产业，地方经济政策的自主权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促使他们在地方的竞争中迅速败下阵来，缺乏资金投入到长期回收的产业上——例如旅游业、农业、畜牧业。因此在 21 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部落后的地区一直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给予了这些地区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创造所谓的互联网精神生产——诸如一切抽象文化，成为亚文化圈的代表，并以这种知名度来吸引人们为此一些相关产品买单，甚至依靠这种互联网带来的红利鼓吹“圣地巡礼”，带动地方的商品流通并从而完成地方原始资本积累，从而发展属于地方的独特产业。不过，像这种依赖观众老爷的心情来吃饭的产业，这口酒一口一口喝的舒爽，但是资本的积累和逐利能否让地方财政去做更为稳固的长期实际生产投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丁真——或者说，还有不知道多少像丁真未走红前这样的可怜的孩子们，此刻还在烈日当中挑山动地，或是在凛冽寒风中搓烂了双掌的皮，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其实只是中南海里面的某张红头文件轻描淡写的一笔。一切都不是丁真错；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努力学习不是他们的错；**被中共统治阶级当提线木偶来获取他们的政治利益也不是丁真的错。错的只是机械唯物主义者里那个天真到惹人发笑的观点——妄图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终究只是饮鸩止渴，自取灭亡。**

19 岁男孩付错车费自杀法治的资本主义社会

或许是为了向更多不明就里而对中国“暖心”的社会公共服务感到自豪的群众进一步揭示自己的真实面目，在两名环卫工在高温下耗时四小时翻找八吨垃圾只为某神通广大的贵妇人找到一只儿童手表的舆情尚未完全平息时，上海的热心的人民警察又给本就忿忿不平的网络舆论添了一把火，恰如一组设计巧妙的对照实验，简练地给一个 19 岁的少年上了一节民间俗称的“社会第一课”，即使后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条正当青春的鲜活生命。

错误地付了 1010 元作为网约车费，是这位 19 岁少年梦魇的开端。对此完全装聋作哑的司机，理所应当成为了网友们口诛笔伐的首要目标。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对贪婪最无情的辱骂，见到老掉牙的国民“劣根性”的嘲讽，却鲜有见到对事情表面的突破而深入背后本质的批判：这份冷酷的贪婪源自何处？事件最后悲剧性的收尾是单单一位司机的责任吗？

谁都无法否认，对一个 19 岁少年的千余元钱的侵吞，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根本无法用一时疏忽搪塞过去的情况下的侵吞，是绝对不能以任何形式容忍的，对当事人反复的主张合法权益的联系请求视若无睹，是这位司机所能使出的最卑劣下流的手段，据说也就是整件黑暗的事件中的一切责任最合适的归处。但是，假如我们不像“抛开天气和民警”一样抛开事件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国家机构在事件中所发挥出的与找表事件截然相反的作用，我们就必须立刻首先注意到，**司机的这份贪婪逐利的行为不是特殊的，甚至不是个别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普遍存在的，即人民群众不是为了实现自我或为他人社会服务而去参加生产劳动或社会公共服务，而是不自觉地接受了被资本的逐利性异化了的劳动即雇佣劳动，而是不自觉地为了资本赋予自己的唯一任务即获利而劳动，而是在被剥夺了劳动的主体性的条件下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即再生产自身而劳动，这意味着起码的光鲜亮丽的“社会共识”即道德在这里被血淋淋的现实扯下，劳动者不是展现出想象中的善良而是展现出现实中的冷酷，劳动者不是采取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互助而是压迫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自保，在这种情况**

下将一切责任归于一人一身，对着固定目标打靶纵然是发泄愤怒、彰显自己悲天悯人情怀的绝好手段，但是对于任何期待着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现象的人来说，不去敏锐地从背后物质地决定人在其中一言一行的社会本质，是难以得出科学有效的深刻阐释的。



神通广大的贵妇人一个电话能调动无数社会资源，号令环卫工人顶着高温在八吨垃圾中翻找数个小时，而真正面临困境的人民群众，却无法恳求“人民警察”去寻找一个具备明确的资金交易流水的人、一辆具备明确的车牌号的车。如此反差，何其荒谬！恰如广大网友所纷纷感慨的那样，遇事报警往往是一个人的“社会第一课”。明面上温情脉脉的人民警察，现实中却是一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酒囊饭袋。能指望国家暴力机器不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是为了被统治阶级服务吗？能指望“他们的国家”为了我们劳动群众服务吗？正如我们组织的同志们在分析找表事件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用统治阶级自己定下的条例去束缚、质问他们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于明面上、违法的压迫和剥削，背地里、合法且受国家机器保护的压迫和剥削，是更恐怖的。他

们不需要贪腐，即可享受特权。这个中国没有‘青天’。”在这种高度区别对待的社会制度运转下，种姓式的社会不公不仅是层出不穷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一个本身就要求着不公、再生产着不公的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自然是一套既适应又庇护其上的权力关系或社会制度。如果不是注意到迷茫的 19 岁少年在国家机器的冷漠中孤独的死去，如果不是跳出事情的表面把握到以不作为的警察和很作为的市民求助热线为代表的社会整体不公，如果不是认识到作为无止境的恐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一切黑暗的罪魁祸首，群众要怎么才能凝聚起改天换地的意识，革命者要怎么才能提出属于共产主义和劳动人民的替代方案呢？

恰如非尼哈一行人告诫基列人的那样：“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那司机的冷酷，人民警察的淡漠中，也不独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停止无谓的批评！停止轻浮的指责！革命的威力不来自别的，恰恰来自科学地考察现实、理智地总结任务、严肃地凝聚力量、紧迫地组织斗争。再不能坐视幼稚的情感宣泄、自由派荒唐的解读和做作的无病呻吟霸占社会舆论场了，在缓慢而坚定的激进化进程中螺旋上升的广大群众的反抗意识所汇聚成的力量，必须被及时而合理有效地把握。否则“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革命者必须仔细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必不能让少年的血泪空流。只有立刻深入被现实反复鞭打的居民的一切阶级，明智地提出自己的斗争纲领和路线并组织起来为之奋斗，才能用如烈火般烧尽一切杂草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劳动群众烧出一片天朗气清。**

如何真正实现女性解放

“被（谁）看见”？

一些女性主义者喜欢说：“女性不被看见”：女性的隐形劳动、遭遇的隐形歧视不被看见；母职惩罚、女性的职业困境不被看见；环卫工清洁工采茶工等体力劳动女性不被看见；女性在生活、工作、婚育等等方面的个个角落里面临的种种困境不被看见。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这些人给出的答案是：发声！既然不被看见，那就发出声音让大家都看见。从言辞藻上，到舆论叙事上，尽可能地发出女性主义的声音，呼吁女性困境“被看见”。

然而，一个必要的追问是：**被谁看见？**

这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追问。众多的经验显示了对此含混不清造成的实践误区。

首先，是向“社会”喊话吗？向什么社会？这些人或许不清楚自己喊话的对象，只是模糊地望向一个“基本盘”、“大环境”。但任何一个意识到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公的反抗者，包括所有意识到当前女性困境来源于这个结构性不公的姐妹，都应该**摒弃这样一种幻想**：我向“大环境”喊话请愿，它会以自我改良回应我的呼声。

在实践中，这些“发声”行动往往得到这样的回响：一方面，它赢得了很多激进化的女性的回应和相互鼓舞打气；另一方面，它收获一些前现代男性的唾弃，一些激进化的、“女性主义”的男性的支持但不能完全共情，和一大部分男性的漠不关心。

一些女性主义者于是说：男性不关心、也害怕谈论女性主义。要实现女性解放，就不能指望男人，而只有靠我们女性自己。

比起空洞的呼喊，这个通过经验的总结激进地**确认了自己是实现女性解放的主体**，在实践的蜿蜒道路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很多到了这一步的女性主义者由此**倒向了厌男和在一个全女的小团体内自嬷**。而这却给真正的革命实践自设了茧房。

阶级团结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并非孤例。激进的性少数群体面对“主流社会”的不理解，选择在小圈子里抱团发声，并用“顺直”等词汇表达对意识不到性少数困境的主流人群的不满；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黑人活动家认为白人在思想上就没有“去殖民化”，无法成为他们的同路人，于是将黑人解放运动同其它的革命运动区分开来……这就是**身份政治**。

一部分人因为身份、生活经历、所处环境的不同，不能对另一部分人的体验感同身受，这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如果一位激进者只是出于摆脱自身遭遇和由此导致的痛苦体验而反抗，却不做更深入的对于遭遇来源的现实溯源、不深究通过革命改变这整个现实的道路，就容易落入**原子化**的抗争里。这时，这个人就容易因为抱团带来个人体验的好转而抱团，因为接触身份不同人群带来负面体验而用身份政治为这个圈子的抗争筑起高墙。

值得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者尤其容易落入这个陷阱。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者，并不真正了解革命运动可以倚仗的社会力量。在自己生活的狭小圈子里，她们**因为个人体验的好坏而直接地、短视地行动**。一旦身边环境好转，比如处在一个女性互助的圈子里，她们就可以不再去管世事扰扰，留下一地鸡毛继续困扰着无产阶级的劳动姐妹。

可见，阶级关系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获取关键资源（如教育、医疗、优质信息、政治影响力）的能力。这种基础性的阶级位置，深刻影响着个体在性别、种族、宗教等其他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可能遭遇的具体困境。**一个底层的工人阶级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其表现形式和解决难度，必然与她所属的阶级紧密相关，并常常被资本力量利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核心（市场、竞争、私有产权、利润驱动）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阶级分化与强化机器**。它系统性地将社会财富、权力和机会向上层阶级集中，并倾向于将经济危机、社会风险的成本转嫁给下层阶级。这种结构性的力量不断巩固着阶级的界限和差距。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矛盾的强化虽然也有其自身逻辑（如文化传统、特定偏见），但其系统性、自发性与阶级矛盾内在的、由经济基础驱动的强化机制相比，往往相对较弱。

再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常常会有意识地利用甚至煽动其他社会

矛盾。这一点在古今阶级社会中都存在，只是方式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情绪、种族仇恨、宗教冲突、性别对立等，都可能被用来转移公众对阶级剥削的注意力，分化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群体，阻止他们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和有效的反抗力量。历史上和现实中大量事例证明，制造或加剧族群、宗教或性别间的对立，是瓦解劳动者团结、压低整体工资水平、维护资本统治的有效策略。因此，其他社会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的激化，常常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可能被阶级统治的策略所吸纳和利用，服务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根本目的。



只要阶级统治存在，利用其他矛盾来分化民众、转移视线、维护统治的动机和手段就

始终存在。即使某些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性别矛盾等）在特定时期有所缓和，一旦阶级矛盾激化或统治需要，它们仍可能被重新激活和利用。附着于特定生产方式的其他不平等形式，其根基也在于阶级结构本身。因此，**阶级矛盾的根本解决，即超越阶级社会本身，构成了其他社会矛盾最终得以彻底解决的前提条件。**在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情况下，其他矛盾的最终消亡难以实现，因为它们赖以存在的深层社会框架（即阶级）依然在持续运转并施加影响。

上述对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情况的描述，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之一。因此，在这样的直接行动中，男女对立当然是不可缓和的，团结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一个目标是**通过革命完全地推翻现有体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行动中，所有被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超越性别、身份地团结起来，而只有这才是铲除结构性不公，真正实现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

走到这一步，一个革命女性不再被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意识（或者自由主义的、或者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的）俘获，而会**宣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在这场整体行动中，革命女性所做的不是步一个“外部的革命运动”的后尘，而是从女性自己的困境经验出发，但又不只是局限于自身经验，而是上升到如何运用女性经验和女性劳动者的主观力量，来推动建立一个真正实现女性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女性的投入会为目标注入更可靠的蓝图、组织起能顶半边天的力量，同革命的姐妹兄弟们一起掀起狂澜巨浪。

同时，共产主义者不能，也不可能指望女性将她们迫在眉睫的要求置之不理，而干等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天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要求女性“为了革命的利益”搁置她们的日常要求，这种思想是愚昧之极的，这将使我们的斗争脱离现实且孤立无援。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革命将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的海市蜃楼。

为了促成不同性别的工人和一切劳苦大众之间的团结，共产主义者不仅应该指出女性的解放只能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被实现，而且还应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为女性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如争取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抚养化、取消就业歧视、男女同工同酬、提升包括社保在内的整体社会福利、打击性骚扰行为、逐步破除所谓“男的就该阳刚”“女的就该阴柔”的性别刻板印象等等）。

如何面对群众中的落后思想

走出这一步的革命女性，会将自己组织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带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非原子化的个人行动。

这时，一些问题会浮上水面。比如：男性工人中，很多对女性解放漠不关心，甚至不少人仍带有前现代保守观念；一些老一辈女工，甚至看起来不像那些女性主义者一样“觉醒”。这为我们革命的群众组织工作制造了困难。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工人作为自发的个人，并不一定是天然具有本阶级的意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无时无刻不在各种媒介上受到来自他们的敌对阶级——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常识”的灌输。

资产阶级灌输给男性工人：你没房没车没钱所以没老婆（占有不了性资源），你是个loser。

资产阶级灌输给（老一辈的）女性工人：女人忙内忙外操劳一辈子就是辛苦命，但能过日子就幸福。

资产阶级灌输给（年轻一辈的）女性工人：你踏踏实实干活就是重复老一辈的辛苦命，但是嫁个好的、傍个大款、捞一捞男的、总之通过投机似乎有阶级上升的幻想。

这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痛斥的，当下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盘”。**具有这些意识的工人不在少数，但他们不是革命女性应该批判的敌人，而恰相反是被我们共同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所造成的。**

从古至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会为了自身阶级的稳固和利益的延续，**将特定生产关系“自然化”为“永恒秩序”**。资产阶级阶级不仅通过控制国家机器直接地生产和向被统治者灌输这样的意识形态、通过教育、法律等机构将“服从”建构为工人的“道德义务”，而且特定的生产关系本身使得特定的生存规则成了这套秩序下人要生存和获得社会归属感的“版本答案”，从而驱赶劳动者如此行动、将其视作常识。劳动者对生存需求的服从（如多数没有创业能力的工人不服从资本家就找不到工作而被饿死），正是资产阶级如此制造的“常识”的结果，而非主观选择。如果以死亡为代价进行“反抗”，恰恰会取消自由意志的物质载体（即生命），那这算什么“自由”呢？当资本主义将基本生存条件异化为必须通过雇佣劳动换取的商品时，“服从或死亡”的“选择”实质是暴力下的形式自由。因此，工人们明知剥削存在，并嘲笑所谓“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鸡汤，但仍将工厂制度视为“自然的空气”，即便识破意识形态谎言，仍不得不“假装相信”。有人可能异想天开：为什么不能脱离现代社会，去原始丛林里生活？

然而，由于人总是有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需要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忍受骤然失去现代便利（电力、医疗、稳定食物供给）导致的生活质量剧降和完全脱离社会带来的社会关系上的死亡，即便有人这样做了也只会被视作特例。

可见，无论是旧社会的父权制的执行者（如宗族长老、夫权维护者）、法西斯国家的士兵与秘密警察、殖民统治的帮凶（如土著税吏、雇佣兵）、或是血汗工厂的基层监工，他们**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深陷于特定的生产关系的迫力之中**。他们的行为（甚



至压迫行为）往往是被塑造、被驱使的结果，是系统维持自身运转的“齿轮”，同样不存在脱离具体历史与社会结构的抽象“自由意志”。

要转变这些“基本盘”落后观念，**不能仅停留在观念的批判上**（当然这种在精神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将工人中最进步的力量吸纳进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通过进步的工人党员，用灵活（比如通过女同志组织女工）但是牢靠的方式将工人（尽管很多在观念上或许不够“进步”和“纯洁”）**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铲除中国资本主义这个为了尽一切可能抽干男性和女性工人身上价值而欣然助长前现代的性别分工、为落后性别观念招魂的毒瘤！

中国资本主义如何为父权制招魂

在中国重建资本主义的道路中，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曾一度让资产阶级赚的盆满钵满。涸泽而渔的资产阶级极力压低工人薪资，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于制造

业和外贸，仅能提供非常少量的集中在科技产业的高薪岗位，迫使中国家庭在“内卷”中承担了沉重的劳动力再生产（即生养和教育下一代）成本，当工人薪资不能负担起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一代人陷入了生育率低迷，威胁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延续。

中国，**曾经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改造中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进程**，但由于工业化进程局限于部分城市和地区、社会主义时代持续时间有限因而改造不彻底，在农村和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很多前现代观念的残余。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一切性别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而暂不操心再生产问题，这时尽管改造进程中断，但性别矛盾并不凸显。

但是，到了今天，一面是紧缩的经济，一面是因为生产过剩而已经严重饱和的劳动力市场，一面是威胁中国资本主义的低生育率，**资本主义重新急迫地将父权制和前现代的性别分工招魂回来**。重新强调家庭观念、推行“妈妈岗”以“方便”女性工人回归家庭等等，就是例证。这时，现代的资本主义和前现代的父权制“和谐”地结合了起来，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维系对工人阶级的持续压榨和维稳阶级矛盾上达成了“默契的合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资本主义将女性的子宫看作是急待分配的资源、急待耕种的肥田。表现在观念上，女性作为性资源被物化，而男性则不会有这样的境遇。于是，中国资本主义一面在男性工人中制造着“没有经济地位所以占有不了性资源”的性压抑，而另一面在女性中则压根没有“性压抑”的说法——因为女性本身被视作性资源而非性的主体。这一情况在近年来加速地撕裂着中国社会，比如当中国女性同外国男性交往时，社会观念上表现出强烈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识、对于性资源自己“送人”而哗然，等等。

如何实现真正女性解放

一些女同志站在革命队伍旁犹豫：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俄国的和中国的革命，尽管都在妇女解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并非完美。女性工人在承担生产任务的同时，也需要额外地多生孩子和照顾家庭。社会主义社会要通过理性的经济计划来统筹社会需要，是不是也要计划女性的生育，从而让上述的物化女性身体的意识形态再次被生产出来呢？

必须破除的一点误区是：共产主义 = 计划，而资本主义 = 无计划。新自由主义钻了这个空子，去极力地向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是要控制你们，而我们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则给你们自由！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包含大量的计划**：每一个企业都在出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做

着生产计划。但恰恰资本主义的计划是局部的、短视的。只要稍作整体和系统性的分析就能看到，涸泽而渔的中国资本主义会造成今天工人面临沉重的再生产负担因而被迫“绝育”的处境，但是短视的资产阶级仍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驾着资本主义的马车一头撞向南墙。在这个结构性必然造成的“实际上女性身体不自由”面前，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呼喊的“女性身体自由”口号空洞又软弱。

马克思曾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到：在古代的等级制社会，“例如，贵族总是贵族，roturier〔平民〕总是roturier，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市场机制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很难利用他们所认识的必然性（光是想想一般的中小企业的寿命就明白了），而自由恰恰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被物化，人们的生产和交往活动被商品和货币这些物所支配，导致人的异化。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让商品和资本成为主导力量，而人反而被这些物所控制。而如果生产是预先决定的（即在社会层面上存在经济计划），那么人就不再是被物所控制，而是恢复了人对物的控制。

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会通过整体的、系统的和理性的经济计划，恢复人对物的全面控制，同时让每个人仅需少量劳动（比如以今天的生产力来预估，每天四小时工作）就能满足各行业生产所需。它**把人当作是目的而非手段，在（比如通过四小时工作制）维持社会必要生产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上的自由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一项对生育意愿和家庭内部分工平等程度的相关研究表明，当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意愿会降低，但当家庭内部分工趋于平等，女性的生育意愿会提升到接近使人类得以稳定延续的生育率水平（卿，王．“家务分工平等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青年研究 5（2024））。这说明当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盲目经济扩张带给工人阶级的沉重枷锁，当共产主义社会用大量的空闲时间和充足的物质经济真正给每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再结构性地强加职业和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时，人类社会反而并不需要额外通过计划来操心自身的种群延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真正的性解放和性自由才得以实现，女性的解放作为普遍的每个人的解放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才得以成功。**

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因为考虑资本利得而放弃研发和推广能将女性从生养活动中解放出来的技术或服务。比如“工业党”常常幻想社会化抚养、育儿假等等社会福利，这在逐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

里才有可行基础。在前者中，尽管劳动生产是社会化的，但资产阶级为了降低成本、最大化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将抚养和教育下一代的经济和劳动责任完全地推给个人。不仅是养育下一代，而且对如养老这些并不释放直接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但是在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服务，资产阶级都恨不得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除了服务于它们自身阶级之外）。从“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养老不能靠政府”就是这个逻辑的体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以满足人的普遍生命需要为目标，社会化的抚养、医疗、养老等福利都会作为社会的必需环节被纳入整体的、系统的计划中，而不会因为不能够直接产出利润就被砍掉、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当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政治和经济生产方式——这个生产社会意识的物质土壤——会在工人阶级的专政下快速地变革，而观念上的更新则可能滞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长大、度过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代人，可能在革命后仍然保有难以革除的旧思想和旧习气，但共产主义社会会用它新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养育新的一代人。**我们将捍卫我们的革命果实，让这个长期的持久的改造进行下去，直到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消亡。**

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

说到苏联的经济体系，相信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腐化堕落成为资本主义卫道士们攻击计划经济的绝佳由头，他们将其称为“通往奴役之路”。但是，作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不能为了反对那些卫道士的话语就无脑维护苏联；更重要的是客观地研究与分析苏联的经济体系本身，从而为我们的实践作出指导。

1. “苏修”的计划经济体制

总得来说，“苏修”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协调全国的生产。生产的计划定额、资源与人员的调配等等经济活动，都依靠国家调配。但仅仅是国家调配还不足以合适地解释它的种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在“苏修”的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完全是国有的，从而经济计划的施行则是指令性的，是从上而下逐级传递的，事实上，“苏修”的工人们事实上对生产计划几乎没有发言权。经济民主的缺失导致了不少问题。

在“苏修”，依赖大量补贴的“亏损”企业在生产资源上普遍有着优先配置权。而这些生产资源是被有系统地从“利润较高的”企业或部门转移来的。在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和分配并不完全由需求决定，而是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如国家计划委员会）调配。许多低效的企业得到了政府的持续资助，结果缺乏有效的淘汰与激励机制。“苏修”的纺织、鞋类、家用电器生产企业常常存在质量问题，尽管其产量较高。在质量问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政府仍选择为这些企业提供补贴，确保它们能够继续生产并向社会供应大量消费品。同理，“苏修”的电视机和冰箱生产虽然规模庞大，但常常在技术和设计上落后于西方，在世界市场上无法与西方的家电产品竞争。

因“苏修”大部分的企业归国家所有，工业企业的技术信息、生产工艺等通常也不属于公司，而是属于国家。由于国有制计划经济的特点，许多“商业秘密”实际上是政府控制的、涉及国防或战略利益的机密信息。“苏修”政府并不鼓励市场竞争，知识

产权的保护制度相对薄弱。

另外，“苏修”的宪法规定全民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但服务质量低下（《苏联社会史》，希拉·菲茨帕特里克，中文版第287-289页）；“苏修”的城市住房租金长期低于维护成本（1985年平均租金仅覆盖实际支出的30%），公共交通票价极低（莫斯科地铁票价为0.05卢布，1947-1991年未涨价）（《苏联日常生活》，大卫·霍夫曼，中文版第132-134页）。而且，“苏修”官方宣称“苏修”的失业率低于1%，但隐性失业严重（1985年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40%）；1987年《国有企业法》第17条允许裁员，因社会抵制未能全面落实。

可见，“苏修”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工人阶级的基本权益，并且曾经创造过奇迹，但也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创新不足、入不敷出等问题。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权力结构异化的产物——当经济管理权脱离直接生产者，计划就退化为封闭的行政命令体系，其自我纠错能力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而持续弱化。

2. “苏修”的经济改革历程概览

1957年赫鲁晓夫废除中央工业部委，将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由地方委员会管理企业，试图减少中央官僚干预。同时政府允许集体农庄保留部分农产品自由销售，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企业仍需完成国家下达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等核心指标，但是地方委员会仅负责协调，无权修改计划目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决议》，1957年5月10日，载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5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68年，第298-308页）。关键物资（如钢铁、能源）仍由中央计划部门（Gosplan）统一调配，地方委员会也“必须执行国家计划任务”且无法自主获取生产资料（同上，第301页）。

1965年后，“苏修”政府实行“柯西金改革”，即以利润和销售额作为企业考核指标，减少中央计划指标数量，同时允许企业保留部分利润用于奖金、福利和有限投资。但是，企业产品价格仍由国家定价委员会（Goskomtsen）固定，且原材料需通过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Gossnab）分配，企业无法自主决定投入产出（《苏联经济改革文件（1965-1970）》，1971年，第44-47页）。企业留存利润的用途（如投资方向、奖金比例）仍需由上级批准。例如1966年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ZIL）曾试点了利润指标，但因国家控制价格和物资供应，实际利润无法反映真实效率。进一步，在1970年代，因石油收入增长掩盖了低效问题，官僚集团开始抵制进一步放权，改革名存实亡。

“苏修”随后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市场化尝试。其从1985开始的市场化尝试包括：1.《国有企业法》（1987年）：允许企业自主制定生产计划、保留利润并与供应商直接签约；

2. 合作社合法化（1988年）：允许私人成立小型企业，从事服务业和轻工业生产；3. 价格自由化计划（1991年）：拟取消国家定价，但因政治动荡未实施。

但是截至1991年，价格自由化仅覆盖70%消费品，能源、粮食等战略物资仍执行固定价格。企业虽可“自由采购”部分物资，但关键资源（如石油、钢材）仍由国家计划分配。此外，苏联共产党通过企业党委保留了人事任免权，使得厂长需同时向国家计划部门和党委负责（参见《苏联宪法》第六条，1977年）。例如，1989年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尝试转型生产消费品，但因能源供应和外汇配额由国家控制，最终只得依赖政府补贴维持运转。

可见，“苏修”下放企业经营权一定程度上是对苏联模式经济体制造成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不能依据其所谓的“修正主义”就简单粗暴地认为这些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措施，因为这些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引入了价格与利润的机制，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僚专制的社会性质，经济大权依旧掌握在官僚手中。

3. “苏修”经济体制的总体逻辑

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当**决策权力集中于脱离生产实践的官僚机构**时，必然产生**计划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官僚集团作为独立于生产者的特殊阶层，其决策过程受制于科层制的信息传递层级，导致经济信号在纵向传递中产生严重滞后与失真。由于缺乏来自生产单位与消费领域的即时反馈，中央计划无法动态反映社会真实需求与资源分布，最终形成计划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偏差。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引发双重矛盾：一方面，计划制定者试图通过行政指令消除市场波动，却因信息盲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为维系自身管理合法性，被迫引入利润、成本核算等异质于计划逻辑的评价标准。

因为官僚集团无法真正使计划能够逐渐完全代替价值规律对经济的影响，所以只能**求助于资本主义下的利润指标来完善经济**（而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往资本主义倒退）。“苏修”在经济上被两个互相矛盾的逻辑所统治：计划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前者根据国家机构订下的优先性分配经济资源，而后者的资源分配则基于各项客观的市场规律）。这两套规律显然对应着两个阶级的、互有对抗的两类利益：前一个逻辑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后一个则扎根于利润和私人企业之上，契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同时，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受到客观的内在性约束，即受整个经济在特定条件下的、可供配置的、有限的物质资源的制约。帝国主义军事威胁迫使资源向国防倾斜，挤压民生投资空间。由于计划凌驾于市场之上，官僚集团当然可以不断地要求让重工业、军工、航天工业、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等部门得到优先发展，像是重工业、军工等关键行业的官僚机构会通过游说中央以获取更多资源，例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军费

占比存在波动（1975 年峰值 18.4%，1988 年降至 12.1%），且含隐蔽支出（如航天技术民用化投资），但是官僚集团不可能不服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任何一次偏向某一部门的、不合乎比例的资源分配，都会造成整个经济在更大范围上的失调，最终使优先发展部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也受到影响。比方说，“苏修”的一部分经济资源不得不用来进口食品，而不能用于发展机器和现代技术。

由于“苏修”这一工人国家被一个无法被群众制约的官僚集团所**掌控**，从而导致这种工人国家从体制上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基于群众的生产消费信息核算机制。这导致“苏修”经常出现一些人为造成的消费品短缺，因此地下黑市便有了存在的意义以及持续的生命力。尽管法律禁止了这种程度的市场复苏，地下经济活动（如黑市、影子工厂）仍于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在“苏修”蔓延。像是格鲁吉亚的“地下纺织厂”就通过贿赂地方官员来获得原料供应。不过这类网络的规模有限，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原料供应仍然由国家提供，地下产业无法自主获取）。不仅如此，即使是非市场部门，也到处渗透着商品 - 货币关系，这是官僚集团用恐怖和专制主义的手段也改变不了的。

就是说，工人国家必然要进行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不仅为获取外汇、技术，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与资本竞争压力构成外部强制力**，迫使工人国家必须调整生产结构以换取外汇和技术，此过程必然强化**商品货币关系对国内经济的渗透**。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压力的制约，因

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有较为统一的、受价值规律支配的价格体系。“苏修”的对外贸易（即使是经互会内部的贸易）归根结底也是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

4. “苏修”官僚集团向资产阶级演化的必然趋势

在“苏修”，我们可以看到**官僚集团的一部分正在开始转变为一个资产阶级**（而非已经是了）。“苏修”之所以仍处在该过程的开端是因为其要求实现的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使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要完成这一过程，就必须摧毁生产资料国有制、充分就业的制度保障、中央计划的支配地位和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还必须使“苏修”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地位受到历史性的打击，而这一打击在1993年才最终显现。**正如《经济学人》所报道的那样：“在俄罗斯，失业仍然是一种深深的耻辱。直到1991年，它才不再是一种犯罪。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来说，绝对的贫困是有威胁的。失业救济金与每月14620卢布的最低工资挂钩，这是官方最低维持生活水平标准的三分之一，约为平均工资的七分之一。失业者的处境往往比这些数字所暗示的还要糟糕，因为大多数基本社会服务——如医疗、学校和交通，都是由公司而不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只有在职人员才能享受到这些服务”（《经济学人》，1993年12月11日）。

不过有件有趣的事情值得注意：“苏修”官僚集团的特权与资本主义国家上层阶级的垄断资本家或大型黑帮的头目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在“苏修”这里是百万富翁，在西欧或大洋彼岸那里则是亿万富翁。但是在心理意义上，即使存在这种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结构上和权力上的差别，也并不能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因被背叛而起的愤慨有些微的减轻。正如安杰莉卡·巴拉巴诺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自诩过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资本家过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活，这是一回事；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在更严重的赤贫中间，享受奢侈生活，无论其程度大小，则是另外一回事。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苏修”的确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尽管遭受着极端的官僚化，它毕竟仍是工人国家。至于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对一部分剩余产品的占有、它在国际上的保守作用，则都是极端反动的。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应当认清“苏修”真实而完整的面目，戳破资产阶级卫道士的谎言、唤醒教条主义者的迷梦，还历史一个清白，将它改造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武器。**

当然，“苏修”并不是探寻工人阶级专政的唯一例证，几乎在同一时期发展并走向崩溃的南斯拉夫政权同样具有巨大的分析价值。

5. 南斯拉夫的经济体系与问题

相对来说，南斯拉夫的历史可谓冷门，它的经济情况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相较于“苏修”和人们印象中的社会主义运行方式，南斯拉夫的经济体系，即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区别于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独特之处，存在研究的价值。

1) 南斯拉夫的经济运行逻辑

南斯拉夫的企业管理是企业工人委员会的责任，而不是国家部长的责任。生产详细计划转为投资基本计划。工资水平由中央设定，但会根据个别企业的奖金上涨，这将追求更高的工资与更多的利润挂钩。然而，带有自治性的委员会仍是由接近国家部长和官僚的企业经理控制，使这些委员会严格服从党和工会的控制。管理人员通常是根据对部长等官僚个体的政治忠诚度来任命的，当然他们的工资也高于他们所指挥的工人的工资。这代表工人只能在形式上控制他们的工作场所。在自我管理政策下，工人理应经营工厂，并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生产和营销决策。但是，实际上经济和工人自治企业仍然由国家控制着，因为国家有权任命厂长并为每个企业拨款。企业理论上可自主选择原料和扩大再生产，但国家可以通过信贷、外汇管制、价格调控等手段干预（《南斯拉夫实验：1948-1974》，丹尼斯·拉什科维奇，中文版第78-82页）而且在南斯拉夫，关键原材料（如钢铁、石油）由国家计划分配，消费品生产原料（如塑料、粮食）需通过“社会计划”协调，企业需向地方行政机构备案采购计划（《巴尔干的社会主义》，第153-157页）。尽管生产确实达到了繁荣的程度，但国家对投资的控制导致了由国家资助的低效企业得以继续生存，尤其是那些在政治上受到国家官僚机构青睐的企业。（《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兴衰》中文版第189-192页有提到：银行系统（如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向亏损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地方政府则通过“团结基金”救助低效企业）。因此，南斯拉夫虽然有“自治”、“民主”之名，实质上却仍然是官僚专制。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南斯拉夫的企业仍然具有着一定的自主性，特别是在轻工业和消费品领域。不过，南斯拉夫虽推行企业“自治”，但知识产权管理仍受国家法律约束，例如1981年《专利法》和《联合劳动法》均要求企业登记技术成果。工人委员会和企业管理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哪些信息需要保密，哪些可以共享。并非偶然的是，南斯拉夫并没有像西方那样详细的专利法和商业秘密保护法。另一个要记住的概念是，这些公司会被国家以征税的方式间接收取资金（而不是将收入直接转移到国家），而国家会将所征收的税款用于新投资和创建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的新企业。可见，这些公司的利润没有由国家重新分配而是留在了公司内部。

2) 南斯拉夫经济体制产生的问题

在南斯拉夫，政府为产品质量较差的消费品生产企业提供补贴，以确保后者能够继续生产并向社会供应大量消费品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例如，南斯拉夫的鞋类生产企业尽管生产数量较大，但市场竞争力差，虽价格低廉却质量不稳定，部分企业甚至需依靠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生产。南斯拉夫的一些大型企业在家电领域有一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但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不高，许多小型家电企业也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生存，并依赖政府的财政援助。这一体系的问题在从 1980 年代后期始尤其明显，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这些企业仍然保持低效的生产模式，缺乏技术创新和更新。许多较小的家电厂由于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和支持。

南斯拉夫部分工业企业因效率低下长期依赖财政援助，例如钢铁、化工等领域的“政治工厂”，这些企业为平衡地区发展而设立，但忽视其经济效益，就如塞尔维亚学者所述：“铁托的做法是每个共和国都建同类工厂，导致低效产能遍地开花”。此外，南斯拉夫为缩小地区差距，向科索沃、马其顿等经济落后共和国提供定向补贴，但资金常被用于维持低效企业，反而加剧地方财政负担。正如苏珊·伍德沃德在《巴尔干的社会主义》中指出，中央通过“社会计划”协调资源分配，但发达共和国（如斯洛文尼亚）抵制补贴落后地区，认为它们“拖累整体效率”。南斯拉夫的集体农场和合作社也是如此，这些单位由于生产方式陈旧、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机制不灵活的原因导致了效益的低下，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和物资短缺时期。政府通常会通过价格支持、购买保障或贷款来维持其运作。

通过详细的分析可见，南斯拉夫也是一个被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工人国家。虽然它的经济明显存在非资本主义因素（即计划）凌驾于市场之上，但是和“苏修”一样，**官僚们希望通过寻找一种“社会主义的自动程序”（类似于资本主义下市场的运作方式）来进一步完善经济。**就如前面所说的，**如果目标是为了利润而生产，那么工人往往会越来越依赖专家和经理来赚取利润，从而降低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力。这就使得“工人自治”在本质上是虚有其表的东西。**只要价值规律能够强迫工厂关闭，工人在经济范畴上就不会有真正的决策权。另一方面，只要工人能够有效地防止就业波动，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

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免费基础医疗和义务教育（《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1974 年版，第 51、56 条），此外城市公共交通票价低于成本价（如贝尔格莱德电车票价为运营成本的 40%）（《巴尔干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文版第 67 页），而且还有 1976 年的《联合劳动法》规定企业不得随意裁员，使 1970 年代失业率维持在 5% 以下（世界银行 1980 年报告）。但 1980 年代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持续攀升，1985 年达 14%，1989 年升至 17%（世界银行 1991 年报告），而这便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末路。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是工人阶级专政实践中非常好的经验。南斯拉夫的工人经常自豪

地说，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理不能解雇工人，但工人可以解雇经理的国家。虽然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甚至不完全地是工人民主。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它成功证明了工人不但有管理企业的能力，而且也有管理企业的意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全盘认可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它依然有着官僚主义的深厚弊病，并且由此导致了它的最终覆灭。我们所肯定的是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那部分实践。真正的工人民主不能仅仅局限于工厂之内，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让工人组织成一个依靠普遍、完全、彻底的民主团结起来，从而高度统一的阶级，使得工人阶级能够真正实施专政，而非被脱离他们的利益共同体掌握。



6. 工人国家计划经济体系的运作逻辑

之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会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资本逐利的特性促使它不断地剥削，从而造成社会财富的不断集中。虽然这种集中是社会生产得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但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支付能力总是相对

减小，从而使得商品流通的过程遭到了破坏。因此，对一个工人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被完全改变，才能让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

1) 注重效用而非利润

根据“苏修”和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专政体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般来讲，在实现了工人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不再是商品，任何投资和生产决策也会依照产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即使“亏本”的部门也会收到资金投入。**同时，吸纳投资的行业不会竭尽，所以该社会也不会产生“产业衰退”的情形，只会有“资金不足”的情形。也就是说，当某个产业部门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趋向终结时，资源会转入另一个需要资金的部门，并不会触发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式萧条期。这个时候，国家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利润率的问题地直接下达生产指标（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社会中任何单一地区都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与自给自足，其必须依靠和外界的交互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

只要任何一个社会符合上述条件，那么我们就表示这个社会是一个实现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算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为了叙述方便，下文所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都代指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即工人阶级专政时期）。在这种社会，存在的国家就是工人国家，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类国家与前资本主义的专制国家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这种过渡性的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为基础的，即多数生产资料都为国家所有。很显然，**这个时候的产品将不再追求利润，而追求效用。**

这里之所以说是“工人国家”，也说是实现的是“工人阶级专政”，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形式从未有整合社会化生产的机制（即指令性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占有打破私有制桎梏，在国家层面有机整合资源、劳动力和技术，克服资本主义的信息割裂与无序竞争，使社会生产体系服从整体规划，这显然是为劳动者的共同协作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与制度基础。此外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3卷，第140页）这证明指令性计划作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并浸渍并模糊其他生产关系的特殊性时，是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表现。

2) 追求效用的优势

对效用的追求本身就意味着对消费者（主要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保障，因为这可以说是对群众的需求的直接满足而非通过迂回的方式满足。假如我

们想生产一款手机，那我们首先将找到最佳的设计方案，确定其尺寸、性能和定位。其次，我们将考虑这款手机将搭载哪些硬件和软件，这不仅要专注于这款手机本身，还要考虑到兼容性与生态。只有在此之后，我们才能制作一部符合要求的手机。由此可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手机的功能和效用放在了第一位，而非仅评估该产品的利润能否让老板赚的盆满钵满。产出这类有着优越功能的产品，是一种注重效用而非利润的经济的必然结果。

为了保障一切生产确实可以注重效用，任何一种工人国家都会拥有直接配置资源最终走向的决定权，同时**商业秘密普遍被国家所掌控**（没有对商业秘密的普遍掌控，国家就无从行使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如果再次回顾先前对工人国家的分析，我们会反复看见工人国家中需要大量补贴的“亏损”企业普遍都可以得到优先配置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是被有系统地从“利润较高的”企业或部门转移来的。**在资本主义下，国家层面的利润分配决策是不可想象的；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而非价值规律将最终决定社会产品中有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消费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对低效企业的补贴，但其本质是危机管理手段，这类救助总是附带裁员、资产重组等条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资本体系的整体稳定而非保护具体企业。例如，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政府对银行的注资，最终通过合并重组形成了三大金融集团，本质上仍是市场出清过程的国家干预版本。这种“计划”终以不触动私有产权为前提，因而和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逻辑本质上没有共同之处。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任何一种工人国家的国有制计划经济都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基本上唾手可得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学校、交通等），同时工人国家也会尽可能保障就业。因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比起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种工人国家中都能生活得更有保障。这种保障也意味着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因素的压制，“商品和货币的统治”导致的身份地位的不稳定也因此被减弱。对于工人群众来说，这显然是在经济层面比资本主义下更自由了，即使在“苏修”等国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低。可见，就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说，他们必然是支持国有制计划经济的（这并不排除“个人”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反对）。

3) 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资本主义因素

后资本主义社会有时候存在基于小企业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甚至有时还有商业资本、小型私有企业的存在。但因为原料主要由国家供应，因此私有企业虽然有自主采购原材料和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其也无法摆脱国家的控制（哪怕是地下的非法的私营企业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可以靠经济手段（如改变投资方向、贿赂官员等）影响经济甚至政治决策的大型私人垄断企业（或是独立财阀）是不可能在一个工人国家中找到的。例如在“苏修”，虽然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利用内务部职权收受贿赂，干预轻工业投资，但此类行为属于个人腐败，而非资本主义下财阀对经济的

系统性操控。



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崩溃与工人阶级专政的建立仅创造了建设工人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而该建设进程并不会自动地完成。那在上述社会经济情况下，工人阶级该如何推动一个工人国家至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和方向。

首先要做的就是剖析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双重权力”问题。假设一个有着发达生产力的社会，其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过渡到了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那种通过价值规律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经济资源的方式便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即通过参照平均利润率来调动资本或经济资源介入生产）。此后，通过计划理性地分配经济资源将成为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特点。但另一方面，交换价值不能一下子完全被压制，这代表着商品——货币关系存在。因为在分配生产者的消费份额方面，一个普遍的等价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会使消费品保留商品的形式，并反过来影响生

产关系。这就回到了先前所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同时受到了计划和市场两类逻辑的影响。**

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关系，是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与仍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结合。此结合是过渡时期社会所特有的，因此不能将其平面化为一种由价值规律支配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或一种在商品经济已经消亡后，由集体化的生产者支配的经济模式（共产主义）。这个结合标志了从前一个到后一个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过渡，即工人阶级专政在共产主义未能充分成熟之前对资本主义的压制。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要么是工人阶级推动着计划原则走向共产主义，要么是生产力不足、普遍性短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着价值规律的复苏，使工人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关于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在工人国家中，一般的民用消费品行业即使存在长期亏损，也有不断有国家配给资源以维持其存在的情况；生产活动注重于效用而非利润；国家控制经济资源的最后走向与商业秘密；工人国家将为工人阶级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与经济上的自由；多数企业的原材料主要由国家提供，其若要扩大再生产也得经过国家同意（即便是私有企业）；不存在能够影响经济甚至政治决策的大型的私有化垄断企业。

4) 工人国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措施

为了走向共产主义，工人阶级专政需要在计划经济的原则下妥善地管制价值规律的运作。不可避免的是，价值规律在很多领域仍将继续存在。例如，若是国民生产总值中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部分越大，价值规律对于国家主导的“计划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越大，这会使计划经济的调节范围（即对重要物质资源实行中央配置的范围）受到价值规律的明确限制。同时，尽管价值规律不再是全面或自动地存在于经济之中，但仍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简单商品生产中存在着，并继续影响着国营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换，即便它已不再起控制作用。

面对这一问题，过渡政权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准确性。在南斯拉夫等国家，政府制定的统一价格与价值规律的碰撞导致了销售价格并非“真实价格”。这导致了一系列价格失真现象的出现，它虽然被各种新经济形式所限制或削弱，但却不能被消除。这种现象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现实丧失了它的透明性，使得经济计划中难以统计并计算出真正的生产费用。要克服这种困难，**首先有必要全面采用双重簿记制度，将真正的生产费用与带有浮动性的消费价格在计算中完成区分。**这是使中央决策部门，更重要的是使企业集体，能够做出自觉且准确的决策之先决条件。双重簿记制度可以向他们公开必须掌握的基础信息，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提供的。

其次，工人国家需要确保商品生产的非普遍化和局部化。在基于计划原则的过渡性经济中，农业合作社和国有企业之间交换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是商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产品也是商品。此外，价值规律还影响指向“末端消费者”（即消费品的直接使用者）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但是大部分大规模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对它们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才“充分利用”了价值规律（更准确地说是市场机制），以便使消费品的供应更快而且准确地适应需求，同时还不失计划原则的主导地位。

在明确了经济建设的方向后，**工人国家将有意识地排挤资本主义因素（即市场），并逐步让共产主义因素（即计划）完全代替它。**要完成此种代替的一大举措就是对货币的移除。在工人国家中取消货币流通的过程大体上如此：首先在国有企业内部产品交换领域里取消货币；然后在国家同工人国家的职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人之间的结算领域里取消货币；接下来是在国家与小资产阶级和小企业进行交易时取消货币，而代之以商品交换；再往后是在私人经济内部的商品交换中取消货币；最后**货币将与阶级和私有制经济同归于尽。**

通过对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掌控和移除，工人阶级专政将在经济上达成从私有化到国有化（该阶段经济的主要形态）再到公有化（即该过渡性专政阶段的结束）的转变。

最后在此之上，一般的工人国家还会采取以下措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1. 将所有银行合并为中央银行，并将其国有化；2. 把所有的资本家大型垄断组织（军工、能源、电子、运输等行业）收归国有；3. 取消商业秘密；4. 强迫掌握工业的资本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5. 使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并对此实行监督。6. 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7. 国有制还是公有制：“后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

为什么说工人国家实现的是“国有制”，而不是“公有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指出，只有在产品是以彼此相互独立的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时候，产品才成为商品。从劳动失去其私人性质的那一刻起，劳动立即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它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割便不再由个人、生产单位或企业的自发决策所决定，而是取决于社会整体的事前决定，商品生产因而也就不复存在了。马克思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

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规律，并具有“自然规律”的效力，但是马克思在说明这个问题时立即补充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说得更加明白：“因此，时间的解决，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对劳动量实行有意识、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决定着经济计划，这一观点绝不意味着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仍然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商品和价值是劳动量“在生产者背后”以盲目的、无政府的方式进行配置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价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经排除了生产者决定他们自己的需要，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可能性。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因此后资本

主义社会实现的不可能是“公有制”，而是作为向公有制过渡的国有制。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国有制就不会变成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也就还没有实现。

8. 为何一国不能建成共产主义

当然，若是要走向共产主义，工人阶级专政同时还得肩负起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清楚地说明了，消灭一个社会的“现存状况”需要做如下工作：1. 消灭商品生产以及货币的逐步消亡（“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2. 至少在公社范围内，取消消费品的交换；3. 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对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条件，包括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控制；4. 使构成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方式”受自己支配，以此罢黜了与社会相分离的压迫机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苏联还是南斯拉夫，还不存在一个已经消灭了“现存状况”的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地方都还未存在过。要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标准，就**必须全世界都建立起工人国家才有可能实现。**

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基于获得原材料、压榨廉价劳动力和输出商品等原因已经将全球连成了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达到完全的自给自足，所有地区必须与其他地区交换产品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如果选择退回自给自足的状态，那么这个地区不仅生产力会下降并导致人口缩减，而且不一会儿帝国主义就会过来用“文明的方法”输出资本，重新把这个“孤岛”带回“文明社会”。对于一个工人国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只要国外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工人国家的经济就会因为与国外贸易而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即工人国家必须因此进行商品生产），从而无法把劳动彻底社会化。只有全世界的国家都成为工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才是可能的。

有人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倾评论家”故意拔高社会主义的标准，以表明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现实达不到理想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规范主义的乌托邦”和“道德主义”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可以作如下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正在于，所有科学范畴（以及“理想”）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来自“错误思维”或者邪恶的“反共主义”。在苏联以及与之类似的社会，商品、价值和货币等范畴能够继续存在，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即生产社会化尚未充分发展、劳动在本质上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生产者还没有相互自由联合、还不能够直接支配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因此，在那些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私人劳动和私人财产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它们是实际存在的、复杂的现实世界，而非一个供左翼幻想的乌托邦。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来没有存在过。把社会主义建设等同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

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革命完成后才有可能到来。

9. 论工人国家的农业集体化

如何看待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是透视历史上存在过的工人国家的种种现象的重要视角，也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之一。要分析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立场出发，而要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出发。

1) 历史上主要工人国家的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关系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争论：“在农业领域是先机械化好还是集体化好？”对于这个问题，苏联、古巴、越南、中国和蒙古的经验表明，机械化水平与集体化进程的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苏联的集体化运动（1929-1933）因机械化滞后而遭遇严重挫折。尽管1928年苏联仅有2.7万台拖拉机，却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1932-1933年粮食产量从预计的9070万吨降至不足6000万吨，实际降幅超30%（据苏联解密档案，1932年计划收获9070万吨，实际仅5500-6000万吨；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引苏共中央报告）。苏共中央1933年内部报告承认，60%的集体农庄因缺乏机械不得不恢复畜力耕作。此外，苏联学者研究指出，1932-1933年因“富农罪”被捕者中实际从事破坏活动的不足5%，多数为抵制征粮的普通农民（据吴于廑《世界史·现代史编》）。此外，苏联在1930年代初甚至拒绝接受西方贷款，以避免“资本主义渗透”，因而在实际上苏联集体化时期外债压力极小，说苏联是为了“还清外债”而被迫进行集体化完全没有依据。

越南太原省通过机械化实现了小农经济的质变。整地机械化率达92%，水稻收割机械化率达80%，喷灌系统覆盖95%的茶园，推动茶叶采摘次数从每年6次增至8次，单价提升56%。茶农河氏定引入喷灌后，亩产工时从1小时缩短至“一键启动”，收入显著增长。此案例证明，机械化是集体协作的前提——它消解了分散劳动的效率瓶颈，使合作社得以聚焦技术升级而非人力内耗。若归咎“富农破坏”，实为无视机械化缺失导致的高成本困境。

蒙古草原的“芒来模式”进一步印证此逻辑。牧民将27.8万亩草场与牲畜折价入股合作社，拆除96公里围栏实施轮牧机械化。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解放50%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社员最高年分红达49万元。牧民嘎日迪夫妇年收入从14万元增至22万元，源于机械化放牧对劳动力的替代。此外，草场承载力提升和存栏数增长（2024年达10648头），恰恰说明机械化驱动的集体化能突破资源天花板，彻底否定了所谓“计划性减产论”。

古巴的困境则从反面警示，机械化缺位的集体化容易带来问题。尽管与越南合作推广千公顷水稻项目，但因燃料短缺、设备陈旧，机械化率低下导致生产受阻。该国陷入“丰收灾”——国内生产萎缩与进口依赖并存，主食短缺常态化。此危机本质是机械化滞后削弱了集体效能，而非所谓“托派破坏”。古巴政府尝试三种合作模式（机械租赁、混合生产、直销），但机械保障不足使模式创新徒具其表。

中国的实践更能证明先机械化的重要性。中国东北地区试点显示：1955年拖拉机保有量达1.2万台时组建的集体化，1956年粮食单产提高13%。但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国机耕面积占比仅4.4%，却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化，导致1959年粮食产量较1957年下降15%。

毛泽东1959年庐山会议讲话提出“反革命破坏论”时，中央监委统计显示当年全国“破坏农业”案件仅占总案件的1.7%。1974年国务院业务组报告指出：“晋南减产主因是机械化未达要求时扩大大跃进规模”。中国的实践证明，脱离机械化水平的集体化改造必然引发生产波动，这既非“计划经济优越性”体现，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反革命破坏。1961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也承认：“豫皖等地减产主因是大跃进与生产力脱节，不能归罪于反革命”。

1962年调整政策后，中共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要求“机械化投资占比不低于工业总投入18%”。此外，中国政府在1962年推行了“三自一包”政策，才使1965年单产恢复至1957年107%。这证实当机械化基础稳固时，集体化能促进生产。但1970年《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显示，晋陕等地在每百公顷仅0.8台拖拉机条件下强行“扩社并队”，导致1971年冬小麦亩产比1969年下降9%。

有些人会提出“计划性减产”来说明先集体化并不必然导致减产。但是，中国的经济计划恰恰要求农业增产。在中国，1975年农机总动力达1亿马力的长三角地区，集体化水稻亩产达283公斤，比个体经营高37%。而同期西南山区因农机保有量不足，强制集体化使1976年玉米产量比1974年下降12%。这些数据直接反驳“集体化是经济计划要求”的说法——1970年国家计委文件明确规定“四五期间粮食年均增长4%”，但实际仅完成2.3%。

这个5个工人国家的经验共同表明，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取决于物质技术基础的准备程度。机械化与集体化的时序关系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的具体体现，任何超越发展阶段强行变革生产关系的尝试，终将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历史档案揭示的真相，既非神秘化的“阶级斗争”，也非虚无化的“计划性减产”，而是脚踏实地的发展逻辑。

2) 为何机械化应当先于集体化？

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明白，在未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力结构包含三重客观矛盾：（1）分散的手工劳动与集中管理的矛盾。个体农户依赖畜力和简单农具进行耕作，其劳动效率仅能维持 3-5 公顷土地的精细管理。强行将数百农户土地合并后，劳动工具无法覆盖数十倍扩大的耕作面积，导致田间管理出现真空地带；（2）传统生产要素与规模效应的矛盾。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配置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每套生产工具的服务半径不超过 2 公里。集体化后生产单元扩大十倍，但耕牛数量并未同步增长，造成生产资料严重短缺；（3）自然经济惯性与计划性生产的矛盾。个体农户的生产周期完全依附于自然节气，而集体化要求统一耕作时序。在没有机械助力的情况下，数万农户难以同步完成播种、灌溉、收割等作业，必然引发农时延误。一般来说，只有当机械化率达到 **60%** 以上，每台拖拉机覆盖 **150-200** 公顷土地时，规模化经营才能突破人力畜力的物理限制，使生产关系变革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当然这些数字也不是“教条”，任何事情都得因地制宜）因此，农业机械化为集体化创造了物质前提，颠倒了这个次序必然导致生产力系统的紊乱。

3) 完成机械化前，工人国家应当做什么？

在尚未具备集体化条件时，工人国家需通过经济结构改造与制度设计遏制阶级分化。首先工人国家必须实施彻底的土地革命，以法律形式规定每户耕地持有上限（如 5-10 公顷），超出部分由国家征收并分配给无地雇农，从根源上消除土地兼并的物质基础。其次建立国家粮食垄断体系，成立国营采购站直接对接农户，切断富农通过控制粮食流通环节获取超额利润的渠道。第三推行累进农业税，对超出人均产量 200% 的农户征收 50% 以上所得税，抑制资本积累速度。第四发展农业信贷合作社，由国家银行主导农村金融，向贫农提供免息生产贷款，消除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同时通过颁布农村劳动法禁止土地租赁和雇工经营，规定家庭农场劳动力不得超过 3 人，将生产方式锁定在简单再生产范畴。这些措施通过重构产权关系、流通渠道、分配机制三维度，使农业生产要素无法向少数人集中，从而在技术条件成熟前的过渡期维持小农经济的相对均质化状态。

前资本主义社会

1. 原始社会

约 2500 万年前，非洲热带雨林中出现了早期灵长类动物。根据最新古气候模型，中新世（2300 万 - 533 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形成导致森林减少与草原扩张，迫使部分古猿下地生活。2025 年对埃塞俄比亚地层的研究证实，约 700 万年前的地质运动加速了草原生态系统形成，促使南方古猿选择直立行走以扩大视野、节省能量消耗（直立行走能耗仅为四肢行走的 25%），这种适应性改变并非基因突变的结果，而是群体行为通过数万代重复劳动形成的生物力学优化。

700 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标志着其与猿类的分化，也是人类进化的开始。2025 年最新的基因研究表明，古人类脑容量的显著增长发生在距今约 200 万至 30 万年间，与旧石器时代工具的复杂化进程高度同步。劳动对智力的塑造具有双向性：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石器工具显示，早期人类（如能人）已有意识制造工具，这种重复性劳动促使前额叶皮层发育，强化了计划能力和抽象思维。东非大裂谷出土的古人猿骨骼力学分析显示，手部骨骼构造的精细化早于脑容量爆发性增长约 50 万年，这证实了“劳动先行”的假说——即工具使用需求推动神经系统演化，而非相反。在认知层面，集体协作的狩猎行为催生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萌芽。对欧洲尼安德特人喉部结构的重建表明，其发声器官已具备初步语言能力，而南非布隆波斯洞穴发现的 7.3 万年前的几何刻痕符号，则揭示了抽象符号思维的出现。这些能力使得人类能够传递复杂经验，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协作网络，为氏族社会的诞生奠定基础。

旧石器时代（约 250 万 - 1 万年前）的采集 - 狩猎经济是全球原始社会的共同起点。非洲的桑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洲的克洛维斯文化均展现出相似特征：以氏族为单位的游群结构，平均分配食物，石器工具以打制为主。但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技术路径分化，例如在欧亚大陆草原带，猛犸象狩猎催生了投掷武器的精细化。在东南亚岛屿，竹器的广泛使用替代了石器的部分功能。而非洲热带雨林居民则发展出利用植物毒素

的狩猎技术。这种技术多样性表明，早期人类认知能力本质是环境压力与社会协作共同塑造的适应性产物，个人技能完全依赖氏族代际传递的教育体系，北京田园洞人的石器制造技术需数十年学习周期即是明证。

新石器时代（约 **1.2** 万年前）标志着新的开端。西亚的“新月沃地”最早完成野生小麦与大麦的驯化，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中美洲的玉米栽培出现。农业的兴起不仅带来定居生活，更引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显示，早期农业聚落已出现仓储设施和宗教建筑，剩余产品的积累催生了专职祭司阶层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人因地理隔离未能发展出农业，其社会结构长期停滞在小型游群阶段，这印证了环境对技术传播的关键影响。此时的上层建筑仍以原始宗教和习俗为主，中国半坡遗址墓葬随葬品差异极小，证明存在尚未形成制度化的阶级分化。

所谓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原始社会基本单位，成员通常具有共同的祖先，通过母系或父系世系联结，其核心特征是血缘共同体；所谓部落，是由两个或多个血缘相近的氏族或胞族联合而成的更大社会组织，是氏族制度的高级形态。其核心特征是文化共同体，强调地域、语言和习俗的统一。6

有意思的是，氏族制度作为原始社会的普遍组织形式，在各大洲呈现出惊人相似性。西伯利亚的鄂温克族、北美易洛魁联盟和非洲班图人部落均实行氏族议事会制度，重要决策由全体成年成员共同商议。中国半坡遗址的墓葬考古显示，氏族成员随葬品差异极小，印证了“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产关系特征。同时，良渚文化的玉器生产和两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均需数百人协作，个体劳动完全嵌入集体分工 p 体系。这种“共同劳动 - 平均分配”机制（如秘鲁 Caral 遗址的金字塔建造）表明，个人的劳动价值始终由社会关系定义，而非单纯的抽象的“自我实现”。这种平等主义并非出于道德自觉，而是环境压力与低水平生产力的必然选择：在平均寿命不足 30 岁、婴儿死亡率超 60% 的生存压力下，集体协作是维持种群存续的唯一途径，个体离开集体无法获取足够生存资源。而且，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如制陶、用火技术）通过代际传递完成。考古发现显示，北京田园洞人的石器制造技术需数十年学习周期，个体的技能完全依赖氏族教育体系。这种技能再生产机制证明，个人的认知能力本质上是社会经验的具象化。

此外，现代研究表明，所谓“母权社会”更多是特定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选择，而非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母系氏族社会作为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阶段，其核心特征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构建社会组织，世系与财产沿母系继承，但这一制度并不等同于“母权制”。后者特指女性全面垄断政治、经济及宗教权力的性别等级结构，而考古证据显示母系社会多呈现平等共生性质。例如，2025 年《自然》期刊发表的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研究，通过古 DNA 分析证实了距今 4750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存在典型的母系氏族结构：遗址南北墓区分别对应两个独立母系氏族，所有个体均呈现单一母系

线粒体遗传（北区与南区线粒体类型截然不同），而父系 **Y 染色体** 却高度多样化，表明男性通婚后离开原生氏族，女性则终身留居本族并主导血缘传承。然而，该遗址的随葬品数量均衡、无奢华器物，且同位素分析显示社群依赖平等分配的粟作农业，均指向资源共有、无显著阶层分化的社会形态，而非女性专制统治的“母权制”。类似的平等性亦见于人类学记录的纳西族“阿注婚”母系社群（女性掌握家庭经济但无父权式集权）及欧洲铁器时代的母系遗传线索，印证母系组织可脱离性别压迫框架存在。

金属工具的出现（约公元前 6000 年）根本改变了生产效能。青铜器的使用使欧亚大陆的农业产出激增，而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土著居民则独立发展出铜器冶炼技术。生产力的提升导致两性分工固化：男性主导农耕与战争，女性转向纺织与制陶。这种分工差异源于生理特征与社会建构的双重作用——男性肌肉量平均高出女性 40%，适于高强度劳动，但 2025 年跨文化研究证实，南非桑人等采集部落中女性贡献 70% 食物供给，证明“性别优势”是否能被“利用”非常依赖具体的自然、社会环境；父权制的真正形成源于剩余产品积累引发的继承权需求，而非生理决定论。

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个体劳动取代集体劳动，私有制由此萌芽。在其中，社会分工的深化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关键因素：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游牧部落的牲畜最早成为私有财产；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氏族首领在部落交换中逐步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加速了私有化进程。剩余产品的出现进一步为剥削创造了条件，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是沦为奴隶；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日益加剧，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对立由此逐步形成。私有制最终形成的标准包括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个体劳动普遍化、社会分工深化导致私有财产制度化、剩余产品积累引发占有关系变革。

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表明，专业工匠阶层已从农业中分离，手工业的专业化加速了剩余产品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积累必然引发占有关系的变革。在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时期（公元前 4000 年），楔形文字记录显示神庙开始征收农产品作为“神圣贡赋”，这实质是私有制的早期形态。中国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随葬猪下颌骨数量出现数十倍差异，标志着氏族成员间贫富分化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尼日尔河畔的杰内 - 杰诺遗址显示，铁器时代（公元前 500 年）的社区已出现围墙建筑，这种防御需求折射出资源争夺的加剧。也就是这个时候，阶级社会在逐步形成。阶级最终形成的标准体现为剥削制度化、贫富分化加剧导致阶级对立固定化、阶级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随着阶级矛盾激化，国家作为暴力统治机器也就产生了。原本服务于氏族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被贵族掌控，转变为镇压奴隶反抗、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恩格斯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非社会协调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游牧社会与原始社会晚期的根本差异在于其生产方式：游牧民族依赖流动性畜牧经济，牲畜的私有

化更早且更彻底，这使其社会结构更易形成军事贵族主导的等级制，而非定居社会基于土地公有的氏族共同体。



奴隶制社会的形成：战争的规模化是阶级社会诞生的催化剂。苏美尔城邦间的资源争夺催生了职业军队，战俘成为最早的奴隶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制并非线性发展的必然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花环战争”虽捕获大量战俘，但主要用于宗教献祭而非生产劳动，这表明奴隶制的形成需要特定经济基础。同时，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诞生伴随着法律与暴力的制度化。汉谟拉比法典第15-20条明确规定奴隶买卖规则，而殷墟出土的带枷陶俑则证实了刑具的普遍使用。地中海地区的城邦国家通过公民权制度将奴隶排斥在法律关系之外，这种“人格否定”的法律建构，使奴隶制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

邦统主义社会的形成：在邦统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东亚，奴隶制并未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中，庶民以集体劳作形式依附于贵族土地，这种“众人”身份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邦统制社会的核心特征包括：土地国有制下的农村公社、专制君主对剩余产品的集中掠夺、以及臣民作为“普遍奴隶”的身份。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首陀罗阶层同样具有半奴隶性质，其形成与雅利安人征服原住民的

历史密切相关。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也呈现出了这样特殊的发展路径。马里帝国的奴隶主要被用于投入王室卫队与手工业，而未被大规模投入农业生产；斯瓦希里城邦的奴隶贸易更多服务于印度洋贸易网络，这种外向型经济延缓了本地奴隶制的深化。这些差异表明，奴隶制的具体形态深受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与外部交往的影响。（邦统主义的问题会在其他文章论述，本文暂不深入）

封建制社会的形成：北欧日耳曼、东斯拉夫（俄罗斯）、日本、朝鲜、越南、吐蕃、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爱尔兰等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文明。

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制社会的可能性源于特定环境与技术条件下集约化农业对劳动力的高效组织需求超越奴隶制的大规模控制成本。当气候暖湿化扩展宜耕区域时，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形成正循环，但寒冷期导致的农作物减产迫使自由农依附领主，加速土地兼并。特殊的地理条件也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例如北欧日耳曼部落面临冻土带开发难题，通过扈从制向采邑制转化，将公社自主地转化为领主封土，避免奴隶制低效；东斯拉夫基辅罗斯的森林草原环境限制大庄园经济，因而维尔夫公社可以经索贡巡行直接演变为世袭领地制，奴隶（霍洛普）仅占人口5%且从事家务；日本火山岛导致耕地碎片化，“部民制”的奴婢难以支撑农业主体，班田崩溃后的庄园制形成武士-本百姓的封建依附。这种转型本质是环境压力下原始公社解体与军事贵族权威结合的产物，如埃塞俄比亚高原干旱促使农耕公社接受“古尔特”分封，而吐蕃高寒区通过“庸”制将牧民固着于寺院庄园，从而直接实现封建社会。

2. 奴隶制社会

“在奴隶制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特殊的所有者，是这些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奴隶）人身，形成“工具化”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奴隶制中“劳动者本身作为生产工具被纳入生产资料范畴”（《资本论》），奴隶的劳动力再生产仅以满足最低生存需求为目标。这种绝对支配性使得其他经济形态（如自由手工业）仅能在奴隶主特许的缝隙中存在，例如古罗马的“特许奴隶工匠”制度，其剩余产品最终仍被奴隶主用于购买更多奴隶或奢侈品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坦言：“我们不需要机械装置，因为奴隶就是最完美的工具”。像是希腊科林斯遗址出土的公元1世纪水力磨坊，因奴隶主抵制而废弃。

伊庇鲁斯战争后，罗马将整片地区人口贩为奴隶，恩格斯称其为“系统化的人肉掠夺”。这种掠夺规模在公元前2世纪达到顶峰，仅德尔菲神庙碑文便记载单次奴隶交易超3万人。奴隶生产极其浪费，它需要不断提供新的奴隶来替代受伤或死亡的奴隶才能存

续。由于奴隶的生活环境恶劣，他们的自然繁殖非常缓慢，因此唯一真正的补充奴隶数量的方法是征服其他地区。

在奴隶制社会中，土地私有化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萌芽会被暴力扼杀。马克思指出，奴隶制经济要求“将劳动者本身作为可移动的财产”（《资本论》第一卷），这直接否定封建制所需的土地与农奴的固定依附关系。同时，奴隶制“用锁链而非契约维持劳动，这使得任何向封建依附关系的过渡都被视为对奴隶主特权的威胁。”（《反杜林论》）例如，古罗马共和国后期出现的“隶农制”（Colonatus）虽带有封建色彩，但奴隶主阶级通过法律强制将隶农重新贬为奴隶——西塞罗在《为凯基纳辩护》中宣称：“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彻底否定了隶农的人身权利。此外，奴隶主通过垄断市场（如罗马的“国家工场”制度）迫使自由工匠沦为债务奴隶，公元1世纪罗马政府颁布《佩特罗尼乌斯法》，禁止释放技术奴隶从事独立手工业，迫使自由工匠与奴隶竞争。

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1790年至1863年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与古典奴隶制存在结构性差异。前者深度嵌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以种植园为核心生产单位，通过奴隶劳动大规模生产棉花等商品作物，其产品直接供应英国及北方工业区的原料需求，本质上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奴隶主将利润投入土地扩张和奴隶再生产，形成以商品输出为导向的积累循环，这与古典奴隶制“消费优先”的掠夺模式不同。尽管同样依赖暴力强制，但南方奴隶制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本积累，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工业化进程，其经济逻辑已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尽管南方种植园为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原料，但奴隶主将奴隶视为固定资产（如工具、牲畜），其“再生产”通过购买而非生育实现。马克思指出这是“资本主义表皮下的古代奴隶制僵尸”（《1857-1858经济学手稿》）。美国共产党理论家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揭露：北方资本通过贷款给奴隶主获取双重利润——既收取种植园贷款利息，又剥削棉纺织工人。这种“奴隶制-金融资本”共生体才是美国工业化的真正引擎。相比之下，奴隶制经济的本质是“消费导向型掠夺”，其生产规模扩张依赖战争俘获新奴隶，而非改进技术。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制度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特权政治分配。以雅典伯里克利时代为例，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官职向男性公民开放，公职人员通过抽签或选举产生，国家还为参政者发放津贴。然而这种民主仅限于约**4.2**万公民（占雅典**40**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完全排除在外。

奴隶制社会也存在一种特殊的统治模式：凯撒主义（Caesarism）。所谓凯撒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化、个人独裁的统治形式的奴隶制国家。它源于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尤利乌斯·凯撒通过军事权威和政治手段颠覆共和制、建立个人独裁的历史实践，其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矛盾激化与社会转型困境的产物。凯撒主义的兴起，根植于古罗马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危机：土地兼并导致自由民阶层破产，同时奴隶与奴隶主

矛盾激化，而传统奴隶主共和制下的贵族寡头统治（元老院）无法调和阶级冲突。这时，凯撒通过军事独裁与改革政策（如分配土地、扩大公民权），表面上以“超阶级”姿态调和矛盾，实则通过暴力机器（军队）和官僚体系重构国家机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除了西欧以外，在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只有在非洲西部的索科托哈里发国（**1804-1903**）存在过严格定义的奴隶制社会。索科托哈里发国由奥斯曼·丹·福迪奥通过“圣战”建立，全盛时期人口超 1000 万，奴隶人口达 100 万 - 250 万。

索科托哈里发国的经济依赖奴隶种植园，奴隶通过战争俘获的非穆斯林构成（该国法律禁止穆斯林为奴，但是奴隶可以通过劳作换取皈依伊斯兰教的资格而成为自由民，甚至还有这种作为前奴隶的穆斯林进入政府高层的情况存在），奴隶们在军事堡垒（里巴特）周围的庄园生产棉花、槐蓝、可乐果、乳油木、谷物、大米、烟草和洋葱等作物，支撑国家税收、军事扩张和对外贸易。

到了 1853 年后，索科托的经济实际上依附英国。英国通过军事威慑迫使索科托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其开放市场并降低英国商品关税，同时索科托出口的棉花、谷物等原材料需以低价优先供应英国商人。英国殖民当局直接掌控索科托的海关和关税权，

将关税收入用于支付英国贷款利息，导致索科托财政自主权丧失。因此，索科托原有的“吉哈德经济”循环被英国资本打断：奴隶生产的剩余产品不再用于军事扩张或奴隶再生产，而是被英国低价收购，转化为英国工业原料，从而为英国的资本增值服务；同时英国工业品倾销摧毁了索科托本土手工业，迫使自由民沦为英国商品的消费者。至此，尽管其奴隶制形式保留，但生产目的已从维持军事 - 奴隶制闭环转向为英国市场提供廉价原料。1903年索科托被英国军事征服后，其领土被并入英属北尼日利亚保护国。英国殖民当局强制推行“开放经济”政策，利用廉价工业品倾销摧毁当地手工业体系，使尼日利亚沦为英国原材料供应地，阻断其工业化路径。同时，殖民政府垄断对外贸易渠道，1954年尼日利亚70%的出口输往英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英镑结存”被英国冻结，剥夺其自主发展资金。

最后，我们列举一些奴隶制社会的一些主要阶级：

（1）奴隶主。奴隶主是奴隶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其阶级本质在于对生产资料（土地、工具）和劳动者（奴隶）人身的双重占有。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奴隶主将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其剥削方式是通过暴力强制直接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产品。奴隶制的剥削不依赖市场交换，而是通过法律（如《十二铜表法》规定奴隶不得拥有财产）、暴力（监工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斯巴达将希洛人视为“天生奴隶”）维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奴隶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将同类物化为生产资料”。例如，古罗马的种植园主（latifundia owners）通过战争俘获奴隶，将其投入庄园劳动，奴隶的衣食住行完全由主人支配。

（2）奴隶。奴隶是奴隶制社会的最低阶层，其阶级特征在于人身权利被彻底剥夺，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被排除在法律人格之外，无法拥有家庭、财产或自由意志。雅典奴隶市场的铭文显示，奴隶的价格根据体力与技能明码标价。奴隶的劳动成果全部归奴隶主，其自身生存仅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为限。例如，加图在《农业志》中建议奴隶主“给病弱奴隶断食”，因其丧失劳动价值。奴隶起义（如斯巴达克起义）虽可以动摇奴隶制，但未能建立新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奴隶缺乏阶级意识，“他们的反抗是绝望的反抗，而非新社会的助产士”（《哲学的贫困》）。

（3）自由民。自由民基本上是奴隶主、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和商人）和无产者（这里指没有土地或生产资料，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如打短工）或领取城邦救济（如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为生的群体，而非资本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描述封建社会时有描述，因此这里不重复。

3. 封建社会

“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

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产品才拿去出卖，才拿去交换；商品生产尚在初生状态。”（《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经济在3世纪后陷入危机。奴隶主庄园（latifundium）的扩张导致小农破产，奴隶因对外扩张停滞导致来源萎缩，劳动力短缺加剧了大庄园经济的困境。日耳曼人在匈人西迁与气候寒冷化的双重压力下南迁，加速了西罗马的崩溃。公元481年到843年，日尔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在西欧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马特推行采邑制，将土地连同劳动者分封给军事贵族以换取骑兵服役，形成领主-附庸关系。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分析，这种“以土地服役为纽带的等级制”取代了罗马的中央集权体制。自由农民因战乱和赋税压迫，被迫将土地献给领主换取庇护，逐渐沦为农奴。8世纪《萨利克法典》规定杀害半自由民的赔偿金远低于自由民，体现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法律固化。

加洛林王朝建立后，其封君封臣制度完善了封建结构。查理曼颁布《庄园敕令》，规定领主对庄园内农奴的司法权和劳役要求。农奴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更稳定的生产环境：农奴获得份地的世袭耕作权，可保留部分剩余产品，刺激了农业技术改进，但需承担劳役及继承税，领主可随时收回土地；三圃制轮耕与重犁推广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生产力复苏。这与奴隶制下破坏性地使用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封建主通过土地垄断和超经济强制（如农奴人身依附）实现剩余价值榨取。马克思以西欧庄园经济为例，指出“封建主将土地分割给农奴耕种，以劳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形式占有剩余产品”（《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模式下，即便出现早期工商业（如中世纪行会），其生产仍受制于封建地租逻辑。例如14世纪佛罗伦萨毛纺织业中，尽管出现包买商制度，但佛罗伦萨毛纺织业的利润多用于高利贷资本输出（如向英王爱德华三世放贷），而非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纺织业的再生产。这反映出封建生产关系对其他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扭曲”。

在14-15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经济的封闭性与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商品经济发展。此时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城市工商业打破了自然经济结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远程贸易积累起货币资本，形成早期资产阶级雏形。

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使16世纪欧洲白银存量增长五倍（《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价格革命导致西欧实际工资下降40%，加速了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转化。18世纪英国议会通过系列《圈地法案》，至1800年约半数耕地被圈占为牧场，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的“羊吃人”现象，正是马克思强调的“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编年史”的原始积累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同时，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使棉纱日产量提升近百倍，彻底变革纺织业。1835年英国铁路里程达471公里，形成全国性市场。这种“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

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物质技术基础。



此外，随着海外殖民扩张和国内市场整合，区域性方言逐渐演变为标准民族语言，印刷术的普及强化了文化认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促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地区结合为具有统一政府、统一法律的民族”。荷兰联省共和国通过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将商业资本积累与民族意识觉醒相结合，建立了首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与此同时，绝对君主制的建立成为这一转型的政治枢纽。16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王权通过“朕即国家”的集权政策，瓦解封建领主的军事特权，建立常备军和官僚体系。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中表示绝对君主制是“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它统一度量衡、废除内部关税、对商业航行的保护等，使全国性的市场得以形成。另外，如英国都铎王朝通过宗教改革没收教会地产进行拍卖的行为，加速了土地资本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君主制是欧洲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央集权政体，其本质是封建贵族和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平衡上（这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使绝对君主制具有内在脆弱性），对过去封建割据的逐步瓦解。例如，法国路易十四通过《南特敕令》废除贵族军权、建立常备军，并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扩大税基。在过去的典型封建制度下，贵族通过等级会议（如法国三级会议、英国议会）享有分权制衡的协商

机制，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的有限民主，而绝对君主制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虽在短期内强化了国家机器，却因剥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权而激化了矛盾。当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壮大后，必然要求自己掌握政治权力，从而容易导致政权更迭，而法国大革命便是明证。同时，君主为维持集权与战争（如路易十四时期国债达30亿锂），加剧了财政危机和阶级对立。这种集权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像是英国都铎王朝《航海条例》即为保护商业资本。

除了西欧的“典型封建模式”外，日本的封建制度也提供了与西欧并行的典型案例。中世纪日本的社会基础同样是细碎的小生产单位，德川幕府时期约70%的土地被大名领主占有，25%为幕府将军直辖，天皇与神社仅保留不足1.2%的土地，农民则被束缚在平均不足5反（约7市亩）的份地上，以实物形式缴纳高达60-80%收成的年贡。这种剥削模式与西欧庄园劳役地租本质相通：剩余产品首先满足领主消费，仅有少量进入交换与流通。日本庄园制的发展始于奈良时代对唐代邦统制下的均田制的模仿失败，天皇政府在743年《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垦荒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类似西欧的封建领地。但日本庄园通过“寄进”形成了独特的等级结构：在乡领主将土地进献给权贵（领家），领家再进献给皇室或摄关家（本家），构成“预所-领家-本家”的垂直依附链，维系这一体系的是年贡的层层分割。

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推行“检地政策”，确立“二公一民”税制（农民保留1/3收成），使小农获得较稳定的生产预期，刺激了肥料使用与水利建设。这与加洛林庄园农奴份地世袭化的作用类似，但日本的地主-佃农制也有和西欧封建制不同的地方：新兴地主虽掌握全国1/3土地，法律上仍从属封建领主，其剥削所得常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而非生产投资。德川幕府为维护封建基础，1643年颁布《禁止土地买卖令》，并多次强制外出务工农民返乡，阻碍了劳动力的商品化。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日本存在“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其领主世袭特权与西欧庄园制本质相通。日本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权力格局，天皇作为宗教象征缺乏实权，幕府将军虽掌控国家机器却无法完全压制地方势力，而大名则在其藩领内拥有独立的军事、司法和财政权，甚至能世袭领地并豢养效忠于私门的武士集团。这种分权催生了日本贵族等级内部的协商机制，例如江户幕府的重大决策需通过“老中会议”协调亲藩、谱代、外样三类大名的利益，而藩政改革时期长州藩的“村田清风体制”更允许中下级武士参与藩政讨论。同时，权力分散使统治者难以独断专行：1701年赤穗藩主被幕府处死后，其家臣为履行对藩主的忠诚义务，不惜违抗将军法令刺杀幕府重臣，此事也凸显武士的效忠对象分散于多重领主，这种法律与伦理的“冲突”本质上也源于封建社会权力结构的碎片化。

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出现在锁国末期（19世纪初）。畿内地区因棉纺织业扩张导致粮食短缺，农民普遍“购米售棉”：大坂平原农村从北陆、九州购入大米，

同时向江户输出棉布，形成跨区域贸易网络。濑户内海地区人口在19世纪增长1.4-1.9倍，长州藩等地的中下层农民也卷入商品生产。手工业方面，足利棉织工场已拥有30-200台织机，桐生丝织业带动人口百年内增长三倍，全国雇佣10人以上的工场从1854年的300所增至1867年的400余所。这种工场手工业虽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却受封建价值体系扭曲：商人利润多用于购买武士身份或土地权利，而非扩大再生产。正如大坂商人贷款给大名的年利息相当300万石大米，远超工商业积累规模。

到了近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危机因内外压力加剧。1837年大盐平八郎起义号召“平均世道”，四万人参与的近江暴动摧毁土地清册，显示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同时，西南强藩通过“藩政改革”局部突破旧制度：长州藩1838年减免租税、采用洋枪并奖励西学；萨摩藩发展琉球贸易与蔗糖专卖，建立西式海军。这些改革虽以“富国强兵”为名，实则推动地方经济自主化，为倒幕运动奠定基础。当美国佩里舰队1853年叩关时，建筑在年贡剥削上的幕藩财政早已崩溃。19世纪40年代幕府年均赤字70万两金，萨摩藩负债达500万两，封建制度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被瓦解。

最后，我们列举一些封建社会的一些主要阶级：

（1）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通常拥有或部分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如自耕农），或租种他人土地（如古代的雇农）。农民阶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生产，经济形态以自给自足为主，很少参与市场交换。

农民从来都没有过充当一个独立的革命阶级的作用。农民，就其客观利益来说，是社会革命的力量，但政治上是分散的和软弱无力的，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农民的劳动方法相同，但是他们的劳动方法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农民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农民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纯粹的农民起义的结果都是被镇压而失败或是用新的前资本主义王朝来重建过去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农民才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农民内部分不同的阶层（关于邦统制村社成员和邦统国家佃农，我们已经在论述邦统制社会时论述过了），如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雇农在古代是农民阶级中的无产

者阶层，近现代是工人阶级，贫农则是半无产阶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半无产阶级包含贫农、小手工业者、小贩等，其特点是有极小生产工具但需出卖部分劳动力。”），中农、富农则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近现代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贫农很容易堕落到雇农的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富农有成为地主或是资产阶级的潜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他们容易支持资产阶级。中农则是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

在封建社会中，主要的生产者是农奴，其阶级地位体现为对领主的人身依附与半自由状态。农奴可拥有工具、家庭和份地使用权，但不得离开领地。英国《末日审判书》（1086年）记载，农奴需缴纳“继承税”才能延续份地耕作权。农奴需无偿为领主耕种直领地（demesne），并缴纳各种杂税（如磨坊使用费）；领主法庭可对农奴处以体罚（如砍手）、罚款或监禁。13世纪法国博韦地方法规规定，农奴未经许可结婚需缴纳“婚姻税”。另外，农奴逃亡（如德国“空气使人自由”法谚）和起义（如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也可以推动封建制瓦解。恩格斯指出，农奴制被破坏后，“进入历史的第一个资本家阶级是由被解放的农奴组成的”（《反杜林论》）。

（2）封建主阶级。在封建制度下，领主通过采邑分封获得世袭领地和司法特权，其权力并非完全源于君主的授予，而是基于封建契约形成的双向义务关系。例如，领主需向君主提供骑士武装和赋税，而君主则承认领主在封地内的自治权，这种关系使封建领主能够与君主形成某种制衡，从而出现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权力分层结构。因此，封建制下的权力结构是网状分权的，君主、领主、教会共同构成了制度上的多元平衡。

封建领主与教士阶层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双重支柱，其权力根基在于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赋予。封建领主通过采邑制将土地分封为世袭领地，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以劳役地租（如每周三日为领主耕地）、实物地租（收成的三分之一）和货币地租（如英国“盾牌钱”）等形式被剥削剩余劳动。领主不仅掌握经济权力，还通过庄园法庭行使司法特权（如初夜权、遗产税），形成“司法权与土地权的合一”（马克思《资本论》）。作为封建主阶级的神权代表和大地主，教士阶层本身即拥有并管理着大量教会土地并征收什一税，将神权与地权紧密结合；他们运用宗教教义与仪式，系统地论证封建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将其塑造为“上帝意志”的体现，从而为整个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提供关键的精神支柱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保障，并通过垄断教育、婚姻与丧葬仪式实施精神控制。同样作为封建主阶级武装力量核心的骑士阶层，本质上是领主土地分封制度下的军事附庸，其基础在于领主的土地授予和农奴劳动供养，职责是提供武力保护并维持封建秩序。领主与教士的联盟在十字军东征中达到顶峰：骑士阶层作为封建主阶级的军事延伸，以宗教战争名义进行领土扩张，教会则借机攫取东方财富。但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瓦解了这一体系。货币地租的普及使农奴得以赎买自由，城市行会的兴起挑战了领主的司法垄断，宗教改革则打破

教会的精神独裁，最终催生了“脱下袈裟的资产阶级”（恩格斯语）。

（3）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手工业者（例如行会师傅）、小店主、自由职业者、上述的资本主义中的中农和富农、小工业家、小商人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包括小生产者、小业主，其经济地位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此外，列宁还说：“小资产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种双重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动摇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封建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其具体组织形式是封建行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职业组织），其内部关系以等级制（师傅、帮工、学徒）为核心，而非基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关系。行会师傅拥有作坊、工具和原材料，同时以家庭劳动为主，可能雇佣少量帮工或学徒，但剥削程度有限（学徒以学习技能为目的，而非纯粹剩余价值剥削）。如马克思所说：“行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而是一种宗法关系……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工资，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师傅。”（《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另外，行会师傅受封建行会束缚（如产量限制、价格管制），缺乏资本积累的条件。

托洛茨基主义评析

为什么要评析托洛茨基主义？

有些人一看到这个标题就会感到疑惑。你们不是一个“托派组织”吗？你们不应当当然地奉行托洛茨基主义吗？既然你们信奉托洛茨基如同信奉真主（就和我们信奉我们的主子一样），你哪来的胆量去“评析”？不应该是赞扬吗？

对于此类宗派主义者，他们做不出任何事情，我们也不想多花时间去批判。这些曾经往我们头上扣帽子“托派”的同志，缺乏对我们的政治路线、对历史事件的评析、对组织建设的思考的基础了解。我们自始至终宣传自己“反对某人之派”被断章取义为所谓“大帐篷主义”和“折中主义”（包括但不限于“为了‘团结’而拿自己的理论原则做交易”“为了‘团结’‘客观’而对自己的理论实质遮遮掩掩”）。

山头大王们当然理解不了这之间的区别。他们反对所谓安托西修，却对四个字其中任何一个都缺乏了解：立场先行，根据自己派别的教义去打共产主义队伍内的“圣战”。在酋长看来，国王只是大一点的酋邦的酋长，王国和酋邦的本质区别他们是不知道的。反宗派主义的意义他们理解不了，只能理解是另一个宗派——因为自己只能局限于宗派的思维。

所以本文并不是为这些人而写，我们对于转化最为顽固的宗派主义者不抱有幻想。他们满足虚荣心、保持在一个网络小群中的地位所依靠的，就是共产主义队伍一盘散沙、不严肃、无组织的状态。我们最温和的写作也会触及巨婴们的底线。本文的目的，是让同志们完整了解托洛茨基个人的主张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共产主义还是教条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者首先着眼于世界的物质性存在，以及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具体关

系。理论并非凭空诞生，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洞见，正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行开始的。他们分析商品、劳动、剩余价值，并非为了构建某种抽象体系，而是为了揭示现实压迫的根源，并从中寻找解放的道路。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实践唯物主义者，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并介入真实的历史进程，而非在书斋里争论理论标签的归属。**

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们，如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他们的理论生命力恰恰在于对现实斗争的深刻回应。**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机械照搬马克思关于西欧的论述，而是深入剖析了俄国的具体社会形态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矛盾，才领导了十月革命。同时，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与先锋党的自为性的辩证结合、工会官僚化、资本积累规律的敏锐观察，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精神生产资料）、文化霸权的精辟分析，都是他们身处特定历史环境，为解决当时当地紧迫的革命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创造。**他们的贡献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工具箱，而非创立一个与整体革命传统割裂的、排他性的“派别”。**

如果我们执着于“派别”标签，就往往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因为**这可能将理论视为一堆凝固的、不容置疑的教条，而非指导实践的分析方法。**实践唯物主义者清楚，任何理论的真理性和真理性都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本人就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恩格斯晚年也严厉批评过把理论当作“现成公式”来裁剪历史的做法。纠结于“某人之派”，很可能就会导致将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策略性结论或理论侧重，甚至是对“某人”的一切实践都视为“原则的体现”，把这些内容抬高到超越实践检验的地位。这就可能违背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精髓。我们要明白，**革命的理论永远是开放的、发展的，其价值在于能否有效解释和推动现实运动，而非是抽象的“正确”。**

同样地，**实践唯物主义并非对任何自称“左翼”或“批判”的思潮都予以抽象认可，它必然基于对现实阶级斗争的分析，明确反对那些偏离革命实践核心的理论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否定阶级斗争需要工人阶级组织化政治力量夺取政权的核心任务，因为这种否定脱离了对国家机器阶级本质的唯物主义分析；实践唯物主义反对布朗基主义将革命政党官僚化并压制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背离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原则；实践唯物主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改良并最终与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放弃了彻底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目标；实践唯物主义也反对那种脱离群众斗争实践、日益学院化和哲学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削弱了理论指导现实运动的实践功能。

实践唯物主义者关注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实际可能性。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等革命家的思想遗产，是为了汲取他们分析社会矛盾的方法论武器，学习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展现的洞察力与策略灵活性。**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革命思想宝库。这个宝库不是由相互排斥的宗派领地拼凑而成，而是一个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相互激荡的整体。我们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精力，应当放在如何运用这些思想资源，结合当前具体的社会条件、阶级力量对比和人民斗争经验，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朝着更进步的方向发展。实践的难题是复杂的，有效的行动方案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锻造，它不可能简单地从某位思想家的著作中直接“摘录”，而必然是综合运用整个革命传统智慧的结果。因此，贴上一个派别的标签，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并无实质助益，反而可能限制思考的视野和行动的灵活性。

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天然要求超越派别的狭隘性。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他们的目标是改变这个世界。理论是照亮实践道路的火炬，而非划分门户的高墙。**真正继承前人精神的人，不会沉迷于门户之见，只会专注于如何运用他们共同锻造的思想武器，去分析新的矛盾，迎接新的挑战，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前进。**

作为科学而非“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即科学），它区别于任何固定的理论体系或思想派别。它不是提供一套现成的结论让人们去背诵和遵守，而是提供**一套如何分析现实、如何介入现实并最终改变现实的思考与行动原则**。它的核心在于坚持物质一元论，承认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并且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在连接物质与意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践唯物主义认为，**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去抽象地谈论真理或谬误，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它要求我们所有的认识、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去理解其有效性的边界。这种对理论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定，是防止思想僵化、避免教条主义的关键。

可见，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性质意味着它本身不预先设定任何不可质疑的“终极真理”。任何理论，无论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范围内被证明多么有效，**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的**。社会现实是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昨天有效的分析框架或解决方案，在今天变化了的条件下可能变得部分失效甚至完全错误。因此，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必然要求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理论，时刻注意理论是否会脱离实际，变成束缚思想的教条。实践唯物主义也反对将任何在一个具体情况下形成的理论神圣化、绝对化，它表明，**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的能力**。可见，实践唯物主义不追求建立一个封闭的、排他的理论王国，而是致力于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真理。

这种方法论决定了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时，必须坚持具体的历史分析原则。我们支持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并非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毫无瑕疵的理论偶像群体，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支持他们，是基于**

对其理论贡献和实践活动的整体性、历史性分析，判断他们在推动人类解放、反对剥削压迫、促进社会进步的宏大历史进程中，整体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性的作用。他们的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为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他们的实践直接投身于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洪流，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帝国主义时代提出了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符合俄国国情的革命策略，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并在理论与实践上探索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形式；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和工人民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用的强调具有深远意义；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同时让大家可以注意到在精神上层建筑的斗争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虽有差异甚至分歧，但共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对社会主义进行不懈探索的宝贵思想财富。



同样，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革命家及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阶级斗争

状况、科学认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在 1912 年，托洛茨基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深刻的原则分歧，推动形成了“八月联盟”。这一行动在理论上模糊了工人阶级政党应有的鲜明阶级立场和组织原则，客观上为革命力量的分裂和混淆提供了基础。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指出这种调和主义在革命的关键问题上必然导致向机会主义让步。后来，托洛茨基了解了之前的错误，并彻底地承认了列宁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当时是犯下了错误，但他的错误不外乎是诚实的，从革命的利益上出发的。因此列宁也毫不意外地认识到调和主义是“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而这些前提既有革命性的，也有机会主义性的。列宁自己有时也高估了与孟什维克统一的可能性而“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09 年他邀请了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支持党的”孟什维克成立联盟。卢那察尔斯基也表示，直至 1917 年，列宁仍然“想像着一个与马尔托夫共同成立的联盟将会是多么的有价值”。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错误。

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针对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上，曾持有一种过于抽象和教条化的立场。她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经济集中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对民族主义运动可能被资产阶级利用的担忧，倾向于低估乃至否定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决的革命意义和潜在进步性。这种观点未能充分理解民族压迫在沙皇俄国作为“各民族监狱”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激发的巨大革命能量，未能认识到**支持民族自决权（哪怕其形式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瓦解反动帝国、争取被压迫民族下层群众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策略**，这在客观上脱离了东欧和俄国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现实土壤，显示出卢森堡的分析框架在特定问题上的局限性。

承认这些局限性，不是否定他们的伟大贡献，而是遵循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将其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避免将其教条化地搬用于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

反过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为我们分析为什么反对某些人物或思潮提供了清晰的尺度**。例如，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其历史积极性在于首次明确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纲领，并领导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然而其局限性根源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领导的革命未能真正实现土地革命，也未提出彻底反帝纲领以消除列强在华特权。同时，孙中山政府在革命后迅速与旧势力妥协，将政权让渡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导致革命成果被篡夺。这证明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完成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妥协性使革命止步于政权形式更迭，未能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因而我们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孙中山。

法国共产党人路易·阿尔都塞试图通过“理论实践”的概念和“多元决定论”来克服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存在的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简单人道主义倾向，

同时，他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类似精神生产资料的结构）在维持统治中的复杂作用，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运作方法，甚至如何理解生产关系本身有很大的启发。然而，阿尔都塞理论的局限性在于他混淆了精神生产资料和国家，把精神生产资料视为“国家的衍生部门”，还过分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无主体”决定作用，相对贬低了具体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实践和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核心地位（虽然他口头承认这些内容）。他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论述，虽然揭示了统治的隐蔽性，但在解释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时显得不足，客观上可能导致对革命实践可能性及其必要性的悲观或消极理解，未能充分阐明被压迫阶级如何在实践中打破这些结构性的束缚。所以，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阿尔都塞。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实现工业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工人国家的基础**。然而其实践日益脱离工人民主原则，通过官僚专制体制压制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用行政命令取代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实践过程。其发展模式形成脱离群众的特权官僚阶层，让行政权无限膨胀，将计划经济异化为官僚专制的工具，最终让苏维埃民主矮化为其缩影。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扭曲了工人阶级专政本质（虽然斯大林的政府仍然建立在一个工人政府体制基础之上），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制度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所以，实践唯物主义者反对斯大林。

可见，实践唯物主义的“反对”，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基于对其社会实践后果、阶级基础、历史作用是否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客观分析。

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理解革命过程本身时，也展现出独特的洞察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社会变革都是一个连续的、充满探索和反复的复杂过程**。最初的革命行动，往往带有强烈的探索性质。它可能源于对旧制度无法容忍的愤怒，其直接目标可能是推翻旧政权的政治统治。这种最初的革命，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如阶级力量的对比、群众的觉悟程度、革命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等），其纲领和实践常常是不彻底的，可能主要解决政治权力转移的问题，而未能或无法立即彻底解决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然而，**实践唯物主义认为，这种“不彻底”并非毫无意义的失败，更不是应该被唾弃的“背叛”**。相反，它为后续更彻底、更深入的社会革命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它扫除了旧制度最直接的政治压迫机器，打破了束缚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桎梏，极大地教育了群众，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重组了社会力量格局。没有这个必要的探索和准备阶段，那些触及社会根基的深层变革就缺乏基础和突破口。后续更彻底的革命，正是在前期行动所开辟的空间、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前期不彻底性的克服、深化和完成。**这是一个连续链条上的环节，是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递进。试图跳过这个必要的探索和准备阶段，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最彻底的社会革命，往往因为脱离现实条件而陷入空想，或者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根据实践反馈调整策略，深化认识，推动革命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而非僵化地固守某个预设的“完美”蓝图。

因此，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力量不在于提供包罗万象的答案，而在于**提供分析问题、指导行动的“活的灵魂”**。它要求我们始终立足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以发展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理论和现实。它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的根本原则，又要充分发挥革命主体的能动性；既要珍视历史经验，又要勇于



突破陈规；既要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敏锐洞察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后者为了维护自身理论的“纯洁性”和派别的“正确性”，常常陷入“为否定而否定”的悖论，脱离现实斗争的需要，最终丧失改造世界的能力。实践唯物主义支持的，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整体上推动社会进步、启迪人民觉悟、促进人类解放的思想和实践。判断支持与否的标准，不是抽象的道德或标签，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效果及其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契合度。它要求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认识，永葆思想的开放性与革命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非“教义的汇编”的本真精神，也是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赋予我们的最强大武器。

写给“托派”同志：要超越派别

“托洛茨基主义”源于对二十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尤其强调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动性。托洛茨基本人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落后国家可能率先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但其巩固必须依赖发达国家革命的支持，否则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必然面临内部文化水平、生产力水平与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国际分工与消除商品生产的矛盾，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扑。这一理

论在十月革命后的动荡时期具有现实紧迫性，托洛茨基参与领导革命武装、建立红军等实践，证明其理论并非空想，而是试图回应俄国社会两极分化和国际资本压迫的严峻现实。托派早期在德国、西班牙等地的工人运动中亦发挥过革命作用，其反对阶级妥协、主张激进斗争、斗争策略灵活的态度，确曾激励部分工人阶级对抗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这是其革命性一面的体现。

虽说 1917-1923 年欧洲革命浪潮证明世界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然成熟，但是新生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理论上与组织上的薄弱性，导致其未能引导西欧工人阶级抓住革命时机。群众因历史经验不足仍寄望于改良主义组织，而缺乏革命经验的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无力突破这一困境，致使资本主义获得暂时稳定。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的反扑加剧了苏联孤立，为工人官僚阶层篡权创造条件，而斯大林派便是官僚阶层的代表。斯大林派 1924 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将共产国际异化为苏联外交工具（对托派持批判态度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也这样认为），直接导致 1925 年英国总罢工与 1927 年中国革命的策略性叛卖。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却被斯大林集团污名化为“托洛茨基主义”，而这种政治诬陷本质是官僚阶层镇压党内民主的理论遮羞布。

斯大林集团在 1928 年后以“第三时期”的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将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机械等同，分裂工人阶级阵线，最终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1933 年德国工人阶级的灾难性失败，宣告共产国际已彻底沦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附庸。在这种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共同背叛革命的时刻，马克思主义传统必须通过新建一个工人国际来继承，而这就是托派的第四国际的成立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必须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为当时即将爆发的重大事件做好准备。因此，托洛茨基于 1938 年预测，在接下来十年之内，旧的叛徒组织将全军覆没，第四国际将成为地表上决定性的革命力量。这个分析基本上并没有错，但**每个预测都是有条件的**。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多种因素总能带来与预期不同的发展。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写作三十多年后，革命势力的弱小仍是世界政治发展的长期特征。不幸的是，**执掌第四国际的“大员们”却将托洛茨基的预测看成是不可推翻的箴言**。

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变逐渐暴露其理论困境，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衰落是这种理论僵化的典型案例。黄其洪教授的研究指出，美国托派长期拘泥于托洛茨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论述，将“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战略”等概念视为不可调整的教条，拒绝结合美国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种族矛盾复杂化以及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如白领劳工阶层扩张）等现实条件更新策略。其组织内部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差异而持续分裂，陷入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例如对苏联性质或殖民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争论消耗了大量实践能量。这种宗派性使其无法建立持久的群众基础，更未能提出适应美国政治生态的具体斗争方案，如工会运动改良、反战动员或社会福利诉求的整合，最终沦为脱离工人实际需求的小圈子辩论。这种脱离实践的抽象激进主义，印证了英

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泰德·格兰特的以下判断：“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接二连三地犯错。从一个错误的政策走到其同样错的反面，然后再回到更高层次的错误。这是小资产阶级趋势彻头彻尾的标志。至于这个集团，至少在其最高领导层，这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有机本身。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已经被 25 年来所犯的错误所塑造，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和工作习惯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就连称这个趋势为‘中派’都算是一种恭维。”

此外，第四国际的部分支派也将托洛茨基文本简化为教条，将“不断革命论”机械套用于前殖民地国家，忽视农民作为同盟军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其实践日益陷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镜像陷阱**：当苏联官僚集团以“现实政治”名义背叛革命原则时，某些托派组织却为凸显自身“纯洁性”而拒绝参与群众斗争，甚至将其他左翼力量视为主要敌人。这种宗派主义实质是以对抗姿态替代具体阶级分析，背离了托洛茨基与早期第四国际所制定的《过渡纲领》的精髓，**即根据工人实际阶级力量和觉悟水平提出渐进斗争要求**。墨西哥的工人自治实验证明，当托派扎根现实运动时能激发强大创造力：1940 年代托洛茨基协助建立的工人委员会成功恢复生产并实现民主管理，成为拉丁美洲劳工运动的典范；反之，**当运动沦为对斯大林主义暴行的道德控诉（甚至是把一切问题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非建设性替代方案时，其革命性便迅速枯竭**。

综上所述，**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求我们以具体历史分析的态度看待托洛茨基及其思想遗产**。首先必须明确，“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主要是斯大林派别在政治斗争中建构出来的标签，目的是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从布尔什维克传统中切割出去并污名化。因此，我们无需也不应完全接受斯大林主义设定的讨论框架来评价托洛茨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活动。托洛茨基本人，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共产国际早期活动中，是列宁最紧密的战友之一，其理论阐述和实践行动深刻地融入了那个时期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体发展脉络，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革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关于不断革命论、对苏联官僚化趋势的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持，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深刻的现实洞察力和革命指导意义，**这些分析本身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探索，而非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空谈**。

然而，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促使我们注意到托洛茨基思想遗产在后世传承中出现的复杂演变。特别是在托洛茨基遇害后，以第四国际为代表的托派运动，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其理论和实践在某些方面逐渐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这种倾向并非源于托洛茨基理论的内在矛盾，而在于其追随者有时将“反对斯大林主义”本身置于了核心地位，以至于部分理论和实践策略可能演变为对斯大林模式的简单镜像式否定，或在某些情境下未能充分依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行灵活调整**。这种固化倾向，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革命原则，但在客观上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脱节，削弱了其作为改造现实的有效方法论的力量，使其在特定情况下更接近于一个立场鲜明但策略相对僵化的思想派别。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理解以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

论支持这样一种立场，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创立或依附于“某某主义”的派别名号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本质，在于其对社会现实深刻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能力和指导实践改造的能力。拒绝“托洛茨基主义”或其他类似标签，并非否定托洛茨基个人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而是强调**回归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核心原则和方法，以及对活生生的现实的分析**。这是一种积极的策略选择，旨在避免陷入宗派主义的陷阱，超越围绕特定领袖或派别标签的争论，**将焦点始终凝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矛盾、推动革命实践这一根本任务上**。托洛茨基本人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其价值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工具进行的深刻分析和英勇斗争，而非一个被后世附加的、可能被教条化的“主义”标签。实践唯物主义倡导继承的是托洛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革命探索的精神实质，而非将其理论凝固化、标签化。

资本和权力 哪个剥削人？

我们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资本不剥削人，权力剥削人”的观点近期流传甚广，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契合现实，然而马克思对此早有深刻剖析，其洞见远超表象，揭示了更为本质和危险的内涵。

马克思在1847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明确指出，**这种观点看似揭示了现实压迫，实则掩盖了更深层的本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拥有财产（或拥有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也明确将资本定义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因此，社会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所有者的权力，如作为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等阶级对财产的掌握而形成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国家的权力）。像是在奴隶制下，奴隶主对奴隶人身的完全占有权是其财产权力的体现；在封建制下，领主对土地的垄断权及附着于土地所有权之上的司法、征税等权力，也是其财产权力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承认在特定历史阶段，例如他当时观察到的封建残余浓厚的德国，存在“权力统治财产”的现象。在那里，软弱的资产阶级尚未掌握国家机器，其财产权常受封建王权或官僚特权任意侵犯，如横征暴敛、没收财产等，这便构成了“权力剥削”的表象。

然而，马克思犀利地指出，这种哀叹“权力剥削”的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对自己未能掌握政治统治权的不满和诉求。**它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根本目标：夺取政权。一旦资产阶级成功地将国家权力据为己有，如后来在英、法、美或统一后的德国所发生的那样，“权力统治财产”的抱怨便销声匿迹。原因在于，此时**政治权力已与财产权力融为一体**。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职能，正如马克思强调的，是“维持”和“保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法律、军队、警察、官僚系统，这些国家权力的核心构件，其首要任务就是保障资本积累的秩序，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镇压对其构成威胁的力量。此时，所谓“权力剥削人”，其内核正是**资本通过其掌控的国家权力系统化地实施剥削与统治。**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奴隶制国家通过法律（如罗马法）和暴力机器将奴隶定义为“财产”，直接服务于奴隶主基于人身占有的财产权力；封建制国家则通过等级制度和法律（如庄园法、特权）将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征税、司法、军事征召）紧密结合，确保领主基于土地垄断的财产权力得以行使。表面上的“权力剥削”（如领主对农奴的司法审判权），实质是奴隶主和封建主的财产权力得以实现的必要政治形式。虽说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中，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直接同时掌握财产权力和国家权力，剥削也是通过公开的暴力强制实现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剥削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非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得以常态化的维持者 / 守护者。



因此，剥离表象，抽象的谈论“权力剥削”的深层逻辑是唯心史观的体现，它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彻底批驳了“分配决定生产”或“权力决定一切”的错误观念。他指出，**任何权力（包括劫掠的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方式，都依赖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基础**。奴隶主能奴役他人，前提是存在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征服者能横扫欧亚，离不开其军事组织赖以生存的后勤生产体系。权力的形态与力量，**最终由其所依托的生产关系决定**。

资本剥削人的核心机制，在于其作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厂房、机器、原料、技术、数据）的垄断性占有，迫使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存。在雇佣劳动制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远超过其工资（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便是剥削的实质**。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驱使其不断扩张、竞争，必然导致剥削程度的加深、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剥削不是偶然的恶行，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和

核心动力。

现代波拿巴主义政权（指那些以强大行政权力、个人魅力或民族主义包装，在阶级间维持某种平衡，但实质服务于大资本利益的政权）的出现，并未改变这一本质，反而以更复杂的形式强化了资本与权力的共生关系。这类政权往往宣称超越阶级、代表全民，其权力看似“独立”于具体的资本家之上，甚至偶尔会限制个别资本家的过分为行为或进行有限的再分配以平息社会矛盾。然而，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确保资本积累的总体环境。它们通过国家干预（如补贴关键产业、压制劳工运动）、法律框架（保障合同与产权）、基础设施投入（服务于资本流通）乃至对外政策（开拓市场、争夺资源），全方位地为资本的扩张和剥削创造有利条件。现代波拿巴主义政权是资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即阶级力量僵持、资本主义危机深重时）选择的一种更高效、更具欺骗性的统治形式，**它非但没有消除资本剥削，反而运用国家机器的庞大力量将其系统化、合法化，并用民族主义或“发展主义”的叙事掩盖其阶级本质。**

可见，如果资产阶级仅仅从政治上，即利用单纯的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是不可能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仅仅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的所有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简单来说，如果当时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不成熟，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也好，还是工人阶级也好，革命都不会成功，即使短暂的成功，也会被推翻。总之，**想建立政治权威，来维护自己的财产，首先得看当时的经济条件。**像是德国其实很早就开始了资产阶级进程，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宗教改革，就是从德国开始的，可是比其他英法大国，德国到了1870年统一后，才开始逐步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德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德国的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比如地理条件，社会条件等等都不具备；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一世、波旁王朝、路易·波拿巴等人的政权不断反复更迭，到了1870年普鲁士打败了拿破仑二世，法国建立君主帝国的梦想才彻底破灭。而法国的工业发展，恰恰是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才有进展。不过这很快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了。

可见，一个阶级的统治，不可能只建立在上层建筑（政治国家和精神生产资料）上，它必须深入到经济基础，即使得自己的所有制形式成为主导的所有制形式，阶级统治才能长久的维持。

因此，资本剥削人的规律，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关系的，是系统性的、必然的。任何宣称“资本不剥削人”的论调，无论其包装如何，都是对现实的粉饰。政治权力的形态（无论是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还是现代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可以变化，但其服务于资本积累、维护剥削关系的核心功能不会改变。

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主要敌人在内！

军演、动员、舆论战……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台湾海峡上空。帝国主义者博弈的这块棋盘，随时都有被掀翻的风险。

大陆政权和台湾政权现在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文明遭到毁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大片墓地，帝国主义者用血淋淋的剑屠杀无产者；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两岸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投放到天平上。

共产主义者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提出政治口号，发表对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政治任务和利益的明确解释。革命党要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均要承担政治领导。我们的策略不可以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我们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党的策略，就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

在本文中，我组织（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会解释台海冲突的现状，其根本性质以及对两岸人民的利害所在。我们会给出不同于帝国主义冲突死局的第三条道路：一个属于两岸劳动者而非统治阶级的方案，一个解放而非奴役的方案。

考虑到中华民国统治地区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共产主义者极少数的窘境，我们在这里也请求身处台湾的同志们用一切方法尝试在身边扩散此文章以发展共产主义小组。

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分治中国的历史背景

台湾问题的历史根源不始于冷战，更不始于近年来的军事演习与地缘摩擦和所谓历次台海危机，更不始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暂时落幕，更绝对不始于所谓的“旧金山条约”，它是一颗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分割与掠夺之时就埋下的一颗种子——台湾的斗士们曾勇敢地反抗从日帝国主义者到美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一切压迫势力，付出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鲜血的代价。今日台湾作为中华民国残余政权的控制区域，其存在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与中国革命未竟事业的历史残余。

1895年，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台湾、澎湖等岛屿被由清政府割让予日本。反抗被血腥镇压后，台湾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原住民与汉人拿着“下等人”的身份直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条件投降。随后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了台湾，蒋介石亲派陈仪等国民党高官在台湾建立起了总督府统治。然而，究其根本，**蒋介石的政权，诞生于1927年四月十二日屠杀工人的军队的枪杆里，根植于最为落后的土地制度上，经济和政治对外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强权，内部稳定依靠的则是白色恐怖和对旧势力的妥协与媾和，腐败的官员唯一在意的是如何塞满自己的腰包。**“国民”政府在此时已经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任何动力，只等着一场革命将其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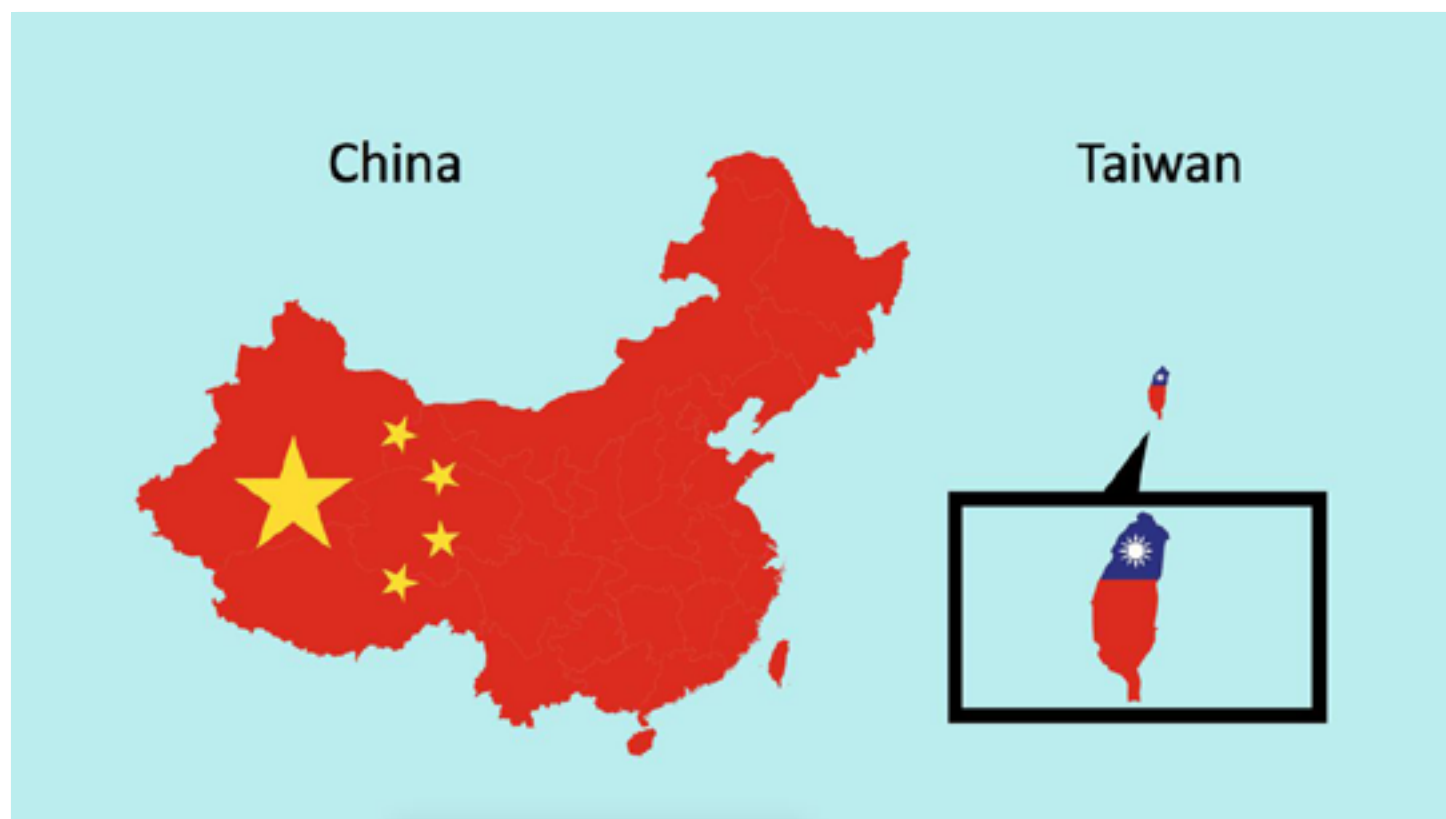
尽管拥有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人力、资源和军备上碾压般的优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国民党完全不是共产党的对手——随着解放战争中土地改革的推进和几次重要围歼战的胜利，国军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不受控制的货币超发导致中华民国经济全盘崩溃，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阶层对政权最后信任的丧失，就连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无法闭合的鸿沟。丢失掉中国大陆的实际统治权后，得益于军事上的天然壁垒与海军力量的悬殊、政治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割裂和无组织性，国民政府溃逃至台湾以求“反攻”。**窜逃的国民政府将原先大陆的官僚体系强加给了台湾人民，**以《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和“消灭万恶共匪”“杀绝朱毛匪帮”和“枪毙共产党”的口号大肆搜捕屠杀左派异见人士，14万人遭到迫害，于一系列反革命后于当地建立了独裁政权。

台湾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化和大陆政权的资本主义化

迫于一方面来自美国，一方面来自海峡对岸共产主义革命的压力，国民政府在土地以及经济政策上做出了诸多改革以断臂自保，但在政治上仍然通过戒严令延续着白色恐怖。但是你不可能永远用镇压维持稳定——如果可以的话，那列宁也绝不会说“资产阶级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政治最为理想的形式”——**体制内、形式而非实质的“民主”**

可以为人民宣传一种身为奴隶却仍然认为自己在当家做主的幻想。长期的独裁统治只会导致社会矛盾没有发泄口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不仅是推翻当前政府，甚至能威胁全体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可以撼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

台湾统治阶级要是想捍卫资本主义，就必须做出改革。台湾的对外政治发生了动荡，中华民国政权被踢出了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转而成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官方代表，随后美国也宣布和台湾断交；美帝国主义出于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遏制苏联的考虑，在外交上逐步抛弃台湾，而台湾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就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



和保护续命。对内，台湾的群众运动和非法组织日益发展，并不断构成威胁。于是在蒋介石死后的 80 年代，台湾统治阶级有意识开始了初步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进程，他们埋怨着，不得不向群众做出诸多政治权利上的让利。这个进程在九十年代得到了完善，台湾统治阶级如同“光荣革命”一样为了遏制激进化运动发展选择了自上而下将一个波拿巴式的资本主义独裁政权改造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自从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由于中国整体的物质基础的落后以及解放战争夺取政权后国民经济体系薄弱，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生产力、技术还是文化水平上都缺乏建立健康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尤其是在政治上，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建立健康工人国家的思想和理论：镇压广州革命的李济深还可以作为政党彼此妥协的结果成为国家领导人，很明显这种情况下不仅延续了资产阶级政府国家机器高于社会之上的属性，真正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工人民主也没有被确立。因此这客观上无法避免特权官僚阶层的形成以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断腐化。各种尝试通过内部改组、洗牌的手段去除官僚层的落后分子

的运动，就好比让人打蟑螂光喷虫药，但吃饭还往地上撒渣一样，这种**体制内的批斗、撤换无法有效阻碍新一批特权官僚的诞生和更多公职人员的腐化。**

自上而下的一切改革尝试最终都没有动摇整个官僚阶层对工人政权的依附的事实，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反而造成了整体工人阶级疲惫、失落的心态，工人阶级也缺乏统一有效的革命领导与基层的组织。从而或陷入对“鞍钢精神”的绝望捧读，或就自由派的“工联主义”盲目跟从，在社会主义祖国最危急的时刻，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却因各种混乱思想的渗透与互相作用陷入了内乱、盲目与停滞。

一个计划经济系统如果长期被极少数官僚所管辖并控制而工人没有负责权或者只有部分的“建议权”，在经济极端落后时也许仍然可以带来可观的发展，但随着经济逐步复杂化后就会沦为可笑、行政式的指令，脱离实际生产，经济管理会变成虚报业绩一般的升迁手段。中国的计划经济就是在70年代左右走到了这个极限，官僚对工人政权的蚕食已经严重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官僚不会主动放弃特权，就和资产阶级不会主动让出地位一样。**官僚阶层于是有意识地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开始引入市场以及恢复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不自觉地一开始还是“社会主义官僚”，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官僚。**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后逐渐地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和中国的国家性质：从一个依附于工人国家的特权官僚层，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替代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国家机器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倒退回了一个资本主义政权。**从这一刻起，中国大陆政权和台湾政权这**两头脱下皮囊并无区别的野兽**之间的冲突再没有任何“解放”性质。

两岸关系武统 - 和统 - 武统的转变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在无数次军事冒险的挫败后打了水漂，两岸逐渐结束了武装对峙的局面。随着大陆的资本主义化，潜在的革命威胁也被化解，处于自身利益考虑大陆和台湾的统治集团开始靠拢。两岸的合作从一开始的经济协议逐渐推进成为了政治解冻。为了保持自身独立性、确保在未来的谈判中有更多筹码，双方仍然在一些关键分歧上保持对立拖延统一进程。两岸政权都很清楚，**统一为的不是民族情感，而是台湾岛还是大陆单独的资源 and 体量，都不如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政治实体能带来的利润大。**

但随着台海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困与不公现象加剧，国民党不断在外交和政治上亲近中共以推进两岸资产阶级统一奴役两岸的劳动者的行为在群众眼中得到了鄙视。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国民党在党争中失去了台湾岛的统治权。

人本能会去反对压迫者所执行的政策，去支持其相反面，从执政党国民党“统”的立场中，台湾人民就开始对“独”产生了支持的趋势。民进党这么一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就因此开始急速的扩张了自己的影响力，**用蛊惑性的手段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并把问题都转移到了“对岸的阿共”身上。**这和特朗普政府的MAGA支持团体有诸多相似之处，**明明是反抗、激进的，却被完全执行反动政策的一个政党利用来转移矛盾。**这就是太阳花运动以及后续民进党执政的根本推动力。



大陆政权也意识到，操控台湾政治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民进党这样一个民粹主义的团体不会给与它任何方便的机会，还对自己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献媚，协助其遏制自己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从和平统一的宣传转为了武统，协议变成了军演。两岸关系因此从武统走到和统后，又重新回到“武统”。这个本质实际上是两岸统治阶级从敌对走向试图和解后，又重新陷入分裂。

当下台海冲突的根本性质是帝国主义博弈

资本主义政权由着其趋利的本能，自十八世纪起便热衷于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边界的同时通过或战争、或阴谋的方法破坏其他资本主义政权的民族国家边界的统一。

对于资本主义政权和资产阶级而言，一个统一在类似语言、认同和文化边界内的民族必然激发出强大的凝聚力、政治认同感，进而促进其国内市场的活力与生产力，最终创造出更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供养统治集团的一切基础来源于此。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史，更是一部为追求扩大自身利益基础而不断铤而走险、步入疯狂，进而引发一场又一场战争的统治阶级之间矛盾不断升级的内斗史。破坏敌人的民族国家边界、壮大自身政权主体民族辖属的国家边界与市场力量，这是资本主义食利者阶级追求利益最底层的逻辑，它写入了一切剥削者的行为纲领。

从这一冲突出现伊始，**台海冲突就从不是什么所谓“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等帝国主义政权所发明出来粉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文明”冲突**，它更不是两种民族或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而是**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构建、加固或破坏国家边界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最好的外化体现**——这一逻辑至今存在于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棋盘”上。

共产主义者该支持“独”还是“统”

台湾是统是独？对共产主义者而言，**我们根本就不该让自己陷入帝国主义者二选一的逻辑、玩他们的游戏**。绝不能以“民族自决”、“地方自治”之名认同这种被历史、被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分裂状态，而去迎合台湾政权所建构的狭隘民族主义论述。大陆政权宣扬的民族统一也只是此逻辑一枚硬币的另一面。

我们要问的是，工人阶级是被统治还是统治，社会主义革命是发生还是不发生，任何对于资本主义政权之间的外交和战争都必须**坚定地贯彻阶级立场**。在资本主义的腐朽时期，任何民族独立的诉求还是所谓民族复兴统一的诉求既不能撼动帝国主义的根基，也阻碍了阶级意识的形成。

我们既不为中华民国的所谓“民主自由”唱赞歌，也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鸣锣开道。两岸的资产阶级在争夺政权合法性与区域主导权时，始终试图裹挟本地的无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将工人群众变为炮灰，而真正的革命派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清晰的阶级立场：拒绝所有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拒绝一切形式的军国主义动员，拒绝被动员进任何国家间的战争机器之中。

我们看到沙文主义者宣传民族解放任务有自己的正当性，无视了当下中国大陆政权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我们的世界所处的国际局势；机会主义者鼓吹，台湾独立运动因为存在大量年轻人支持，便具有其“进步性”，不过是上面领导层几个人思想有问题而已，我们必须“批判性支持”，反应的是和沙文主义者看似对立实则一致的思维方式。他

他们没有魄力跳出统治阶级为自己设下的局，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路线是“不现实的”。实用主义的思维在这里缺乏高瞻远瞩，只会寻求阻力最小的那条路前进——最终发现自己无路可走。

只有摆脱了类似于西方政治中机会主义者追寻“小恶”，即所谓“lesserevil”的这种机械方法，我们才能不只是在统治阶级给出的两个糟糕选项中找那个勉强能接受的，而是**寻找对无产阶级独立、有利的，那条阶级斗争的出路。**

需要采取“失败主义”立场吗？

很多今天的共产主义者曲解、信赖了后人所伪造出的一种列宁在一战中“革命的失败主义”的神话，简单认为，只要本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就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所以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反战”，而是要“支持战败”。**不管是战败还是战胜，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动员和政治工作，结局都只会打击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大陆共产主义者的工作坚决不能是把自己塑造为宣传外国政府比本国政府更先进、宣传战败万岁的殖人，也不能尾随中共之后“批判性”支持沙文主义的宣传，而是要揭穿整个战争背后的阶级利益和反动性。中华民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理，**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以“主要敌人在国内”的口号落实反站的社会主义立场。**

而且我们高于小资产阶级反战主义者的是，**我们不只是单纯反对一场战争，而是反对会不断制造战争的这个腐朽的制度。**只要资产阶级在还不受争议地行使它们的阶级权力，帝国主义和战争就不能消除，不能杜绝。和平的唯一保证和唯一支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政治行动能力。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必须首先集中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来说同时也是争取国内政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性解放斗争中是两个不可分离的生存准则。

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和在战争时期都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否则就是自杀。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战争时期，都必须致力于铲除帝国主义和阻止战争，把这当作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的全部活动必须从属于这个目的：使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最激烈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随时随地突出二者之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对立，并同时把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置于首要地位并加以实现。

我们对此应该采取和这与先前所讨论的“是统是独”相同的态度：我们不会选择说支持其他政权击败本国政府，把革命的希望押在军事失败造成的动荡中。我们更不会希

望本国政府击败其他政权。**我们希望，无产阶级击败资产阶级。**

必须团结、统一两岸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两岸政权的政治叙述总忽视着无产阶级处境的艰难并分裂两岸着人民的统一利益。列宁在1914年5月写的《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中提到，“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愈疯狂地企图镇压或分裂它”。诚然，在2020年后，**资本主义制度之脆弱性的一再显现，两岸政权调和阶级矛盾的能力一再减弱使得两岸工人阶级的运动愈发高涨**：在大陆，2022年11月的郑州富士康工人集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并与警察进行了对峙；在台湾，2022年5月1日的铁路工会以不上工为方式抵抗铁路私有化进程。而资产阶级专政使用的策略便是“在最漂亮和最好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挑动无产阶级实行分裂，即用“祖国统一”“伟大复兴”和“台湾独立”等精致编织的口号来分化两岸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面对统治阶级的宣传，两岸人民时常抱有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有些人甘愿为中共的帝国主义侵略开绿灯，期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在打破“第一岛链”后改善几分自己的生活。然而在大陆的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帝国主义后，大资本的垄断性质就会愈发强烈，吞并台湾岛上新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许能在资产阶级风卷残云式的分赃后获得一些好处，但中共帝国主义的发展必然加深政治经济上的垄断态势，且“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此外，英国殖民者西塞尔·罗兹曾经就揭露过帝国主义的一大目的：“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可见，跟随帝国主义前进并不能真实地拥抱什么美好生活，只能拥护统治阶级并实现其抑制国内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目的。

台湾的无产阶级也同样遭受过类似的期许幻景中，即为了争取权益需要保证岛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在2024年的台湾大选时期，民进党的造势者就曾经提出过因为“要民主”所以选择“挺台湾”并搁置左右派冲突的论调。但实际上，资产阶级民主、立法院和立法委员无法撼动资产阶级社会和私有制。所谓应当保全资产阶级民主，因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是彻底的“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坚守一个立法委员没有调查权、国会改革无法推进、腐败弊案和黑金政治横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并非工人阶级的义务，捍卫“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也绝非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台湾工人阶级和大陆工人阶级在政治体制上有着统一的诉求，那就是通过革命建立“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大陆和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自己的特性。其将发生在全球帝国主义碰撞的前线，

前有在亚太地区进行了数十年部署的美帝国主义，后有酝酿着扩张的、国家资本强盛的、新兴的中共的帝国主义。两岸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有着共性。外交政治上的热点地区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最发达的最核心，如 1871 年普法战争下的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匈牙利苏维埃、苏维埃俄国、英法工人大罢工和当今的海峡两岸。上述所有曾经发生的和仍未爆发的运动的共性是号召地区范围外的世界无产阶级加入革命，因为国家或地区之间“联合的行动”一贯“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大陆和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基于一个统一的、革命的、有着发达联络网的共产党。大陆作为目前全球工业能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存有着以亿为单位计算的无产阶级，无疑将成为未来 30 年内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台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相比大陆中共的高压监察体制有着共产主义者筹备革命的客观优势，就像革命党建立党支部、公开进行工作的桥头堡。1980 年至 2000 年，台湾无产阶级建立了数个仍在运营的劳动者组织，而民间工会、工联的持续活动也为党对工人的组织工作提供了更可及的土壤。但若两岸无产阶级的行动不一致且不由一个统一的革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运动就又将陷入前 30 年反复出现的绝望情景：大陆的工人运动因缺乏支援而星散，中共监察系统的运作下革命组织建设屡屡受挫；台湾的工人运动因体量不足，无法造成对阶级社会的实质突破，只得如大部分欧美系工会运动在 60 年代受挫后的情况一般，退守至成效甚微且过程缓慢的经济斗争。

同志们，我们革命的命运是一体的。**没有双方的协调行动统一组织，两岸的解放都将是空想。**

真正的革命之路，只有一条：两岸无产者的联合斗争，共同推翻两边的压迫统治，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样的团结不靠炮火，不靠民族对立，而是依靠一种求取自仇恨的团结——那是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横亘于我们头顶蓝天的压迫者的仇恨。

台海战争如果爆发，将是一次重大考验，是对革命者政治路线、组织纪律和群众动员能力的集中检验。我们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对抗国家主义、分裂主义与改良主义的三重干扰，不因战争爆发而投向任何资产阶级阵营，也不因军事压力而动摇对两岸统一革命的战略信心。我们必须正面应对这场危机，**将灾难变为革命的催化剂**，将统治阶级的自相残杀转化为工人群众的总动员。在战争来临之际，我们要建立的是统一的革命指挥部和统一的组织动员。在战争中，最坚定的革命派将会挺身而出，拒绝一切妥协、唤起沉睡的群众，推动工人阶级不再为任何“国家”流血，而是为自己真正的解放而战。

到爆发之时再组织，就已经来不及了。**在此我们呼吁海峡两岸的有志之士，一同投身于建设这个革命组织的工作中去！**

论所谓人类共同利益

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利益上自然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着某种“共同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关系的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与被占有、剥削与反剥削。但马克思也并没有忽略阶级社会内部为了维持整体秩序、促进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合作。只不过，这种“合作”和“共同利益”，从根本上说，是被统治阶级在被迫、被引导、被诱使的前提下的配合。

在面对可能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巨大灾害时，比如说大规模自然灾害、全球瘟疫、灭绝性技术风险等，阶级内部的矛盾在表面上往往会暂时让位于一种更广泛的、以“人类”为名义的团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必须共同面对危机。那种本来用于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就成了组织全社会抵抗风险的工具。此时，即便在形式上双方拥有了某种“共同人类利益”，比如生命安全、生存环境等，但这样的“共同利益”并不足以消除阶级矛盾的根本性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统治阶级也必须满足被统治阶级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否则整个社会将无法继续运转，连统治也无法为继。**同样的，在危机下，如果统治阶级彻底无视普通民众的利益，不仅其统治合法性会快速丧失，社会稳定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即便在危机时刻各阶级能够“团结”，也是因为现实压力和历史教训逼迫出的一种临时联盟，而非阶级冲突的根本解决。**等到危机过去，阶级关系必然会恢复常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会和以前一样不断发生。

因此，统治阶级即便是不情愿，也要在某些时候对被统治阶级作出让步，或者至少表现出某种“回应”和“关心”。但这种回应通常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带有策略性。葛兰西曾提出一种所谓的“被动革命”，正是指统治阶级主动或被动地对下层诉求有限接纳，以防止更激烈的变革。

不仅如此，这种临时的“团结”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在此时的消解。**事实上，在危机之下，阶级矛盾常常表现得更加激烈和复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共同灾害的回应需要，但在具体的利益分配、资源投入、“灾后重建”等问题上，

阶级本性往往很快浮现。在灾难面前，本应以全社会利益优先的原则，经常被统治阶级垄断资源、优先保护自身利益的操作所替代。比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遇到大规模灾害，最先获得资源、保护和信息的一定是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被统治者则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疏忽、牺牲的命运。甚至在“人类利益”的名义下，统治阶级还会利用危机机会掠夺公共财产、攫取额外利益。比如“投机者”趁乱大发灾难财、官僚阶层敷衍塞责、贪污腐败等现象，在这种危机时刻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在表面应对危机的同时，实际上也依然在追求本阶级利益最大化，靠妥协和让步换取稳定，却不会真正放弃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

更重要的是，危机不仅在现实层面激发阶级斗争，还会在舆论、文化、道德等领域推进被统治阶级的激进化。每一次灾难，对统治阶级的公信力、统治方式、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检验都更为激烈，也会加速底层社会的反思和自觉，推动新思想的传播。因此，尽管在表面上危机带来所谓“人类共同利益”，这种共性也很快就会变成各阶级利益再分配的战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必然以更隐蔽甚至更暴力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东汉末年，瘟疫与饥荒并发，朝廷以“同心救灾”诏书动员各地乡绅出粮、佃户出力，但灾后乡绅们立刻趁机兼并土地，将赈灾债务转成高利贷，荆州饥民被迫“以身为质”，因此才会有黄巾军的创立，其“苍天已死”之口号也流传甚广，灾后人相食的记录也成为了农民揭竿而起的“动员令”。

在黑死病席卷 14 世纪西欧时，封建领主与农奴突然面对同一种无差别攻击人类的鼠疫杆菌，这场生物层面的共同威胁迫使双方暂时进入“防疫共同体”：领主同意减少

地租以便农奴留在庄园耕作，农奴也接受领主调配去焚烧尸体、堵塞鼠洞，表面看来阶级关系被灾难软化，然而瘟疫一过，领主立即利用人口锐减的“买方市场”优势收回土地、提高租金，甚至把幸存农奴已耕熟的份地圈作牧场，农奴则以逃亡、怠工、焚烧庄园账册的方式回击，阶级矛盾在灾后以更赤裸的掠夺与反抗爆发出来。

19世纪末的印度饥荒被英国殖民当局宣称为“帝国臣民的共同灾难”，伦敦调运粮食、修筑铁路赈灾，然而在运输途中大量小麦被转口到欧洲市场换取英镑，印度饥民只能以掺土的面粉糊度日，灾后粮价飞涨，殖民政府却以“财政纪律”为由加征土地税，饥荒幸存者被迫卖身为债役劳工，民族主义者提拉克、甘地便把“救灾”话语改写为“殖民掠夺”话语，推动反英群众运动走向高潮。

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国民政府与列强共同呼吁“救灾第一”，上海银行团以“救济”名义向灾民放贷，地主却以工代赈逼农民修堤换口粮；在洪水稍退时，国民政府又立刻加征“水利捐”偿债，地主们也收回了被淹田地并将租额提高三成，这直接导致了鄂豫皖边区农民在“均粮”口号下涌入红军，水灾刚过农民们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六安县苏维埃。

2020年欧洲新冠疫情初期，欧盟委员会高呼“全欧健康共同体”，德国、荷兰政府开放重症呼吸机给意大利，然而疫后复苏基金以紧缩为条件，南欧诸国削减公共医疗与工资，布鲁塞尔街头的“为生计而游行”与巴黎郊区的“反疫苗通行证暴动”在口罩尚未摘下时便把各阶级“共患难”的叙事撕碎，民调显示最强烈反对紧缩的正是曾被视为“欧洲团结”象征的医护和物流工人。

综上所述，阶级社会中确实存在某些特殊时刻，各阶级必须维护“人类社会的延续”这一共同利益，统治阶级确实需要调用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与服从才能保存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于是出现“全人类利益”的修辞与暂时协作；**然而灾后恢复总是以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更集中占有、对被统治阶级剩余劳动的更深度榨取为结局，被统治阶级在“共同抗灾”中获得的微薄让步旋即被收回，甚至成为新一轮剥夺的起点，阶级矛盾因此不是被灾难消弭，而是在“同舟共济”的短暂幻象之后以更加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危机只不过是把矛盾推向新的斗争阶段，或者促使其以更加复杂、激烈的方式爆发。阶级统治的可持续，从来不是因为消弭了矛盾，而恰恰是通过不断制造、调和、重新分配这些矛盾来实现的。**

群众党的组织存在

我们组织矢志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群众党。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些政党采用了松散的架构，党员之所以为党员，更多是认同式的，而非建制式的。这种政党，只在面向国家层面政治需求的上层组织起一个协调性的集中会议，而在基层没有什么组织活动存在。因此，这样的政党就不能给予群众可靠的组织平台，而将自己的职能更多地落在协调精英政客之上。这便不能称作群众党。

我们要建设一个群众党，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基层群众之中建立党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首先出自成为党员的基层群众自己，即那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党的一切工具，例如联络网、集中的创作工厂、广泛统一的会议等，都可以为基层组织所用。这就是说，赋予基层群众一切参与政治、影响社会的条件。这样的组织应当广泛地在需要政治斗争的场所建立。这种广泛性放在无产阶级政党身上就尤为广阔，因为无产阶级数量多、范围广，在资本主义深度发展、商品经济发达成熟的当代，到处都存在无产阶级。这样的基层党组织，未来势必要建立成百上千个，即使达到万余也不为过，这是与无产阶级广泛分布的情况相适应的，也是团结起最广泛的力量所需要的。党的权力机关、宣传部门，使组织可以如同大工业生产的方式，批量地、协调地产出智慧和材料，这也为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走向群众党提供了帮助。这些集中的机关汇聚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力量，并有效地让其为整个阶级所用。提供经过整合的经验、大量的宣传材料，可以让基层的组织不至于从零开始发展，避免走前人已走过的弯路。

革命党与社会组织是两回事。革命党的活动范围很广，它要了解、参与社会所有领域的事情，要洞察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原理，并使自己成为关心、了解、懂得如何处理这些政治事务的先进分子，因而也就能够预测和指导事务的发展。群众党的基层党组织也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是两回事。群众组织的工作安排决定于具体群众的当前需要，往往只处理成员一时所牵涉的事情，活动具有局部、临时特点。当成员的事情一时解决，组织就易回到日常乃至空转的状态。党组织扎根于基层之中，绝非是溶解于其中。基层党组织活动的路线、方针不由其基层党员自己的一时取向决定，

而由党的民主集中制下既往决议决定。不应是党组织听命于基层多变的心理情绪和临时需求，而是基层学习党的会议讨论出的智慧成果，同时摸清基层自己的情况，经过严密的头脑加工、推理总结，发展相适应的具体工作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集中智慧将得以教育给基层，使基层的眼光能站在长期、计划、周全的立场上。同时，实现党组织对群众 / 群众组织的领导，藉此教育群众，让群体有智慧、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行动。



有时革命党会遇见这样尴尬的情况，即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有时走在党的后头，有时也会走在党的前列。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简单映像，而是这个阶级少数的先进分子理性加工过的反映。这就是说，革命党汲取了这个阶级（实际也包括

社会的其他部分）实践经验后，经过研究加工发展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等诸类认识。一方面，革命党将智慧集中后，能够看见更长远的事情、做出更科学的决策。另一方面，革命党作为少数，对于感知现实实际的变化，不如整个多数来得敏感。当革命党识破假革命者的虚伪面目时，可能群众受骗到这种程度，以至革命党无法将群众动员起来阻止敌人的阴谋。当在那些革命党看不见的地方出现了变动的时候，例如敌人内部出现决策失误、党员不在的地方群众已经因流传的消息情绪发生变化，可能革命党因无知而落在了群众斗争的后面。

建设群众党时，首先是建设革命党。然而革命党主体的特殊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党群的不契合。那么群众党是一个伪命题吗？并不。群众党，就是政党成为了群众的政治组织工具。群众党将群众动员起来，绝不能是靠什么行政戒令，依靠威胁排除群众于利益之外，而是依靠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具有感染力的演讲，去说服群众。“把党用起来！”党的理论成果、党的宣传工厂产品、党的组织形式，通通成为自觉的群众、自觉的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工具。党的基层组织，难道不应就是基层群众组织自己吗？整个党，难道不应就是整个无产阶级组织自己吗？党与群都是发展的，在永久的不可避免的不契合中，两者却将不断接近契合，同样可以爆发巨大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开始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群众党发展的历史。党员存在于中共领导地区的各种社会机构，支部到处存在，进入权力机关的万千党员提供了广泛的力量和智慧，党的集中意志也可影响到方方面面。建国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让组织规模发展速度扩大了数倍，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如雨后春笋出现。时过境迁，到今日，中共依然延用过去的组织方式，并拥有超过一亿的党员。然而，这种组织方式在中共身上越来越成为形式的东西。尽管中共党员依然需登记在册，且须存在于某一党的组织之中，但党组织内形成上下级的分野，基层愈来愈成为听讲话、拿方案、被评判的机器，而不再能作为基层群众思考了。并且，越是往下到了基层，党的组织越是失去党性，亦即越来越不在作为一个政党的部分思考社会的、世界的、群众的事情了，而单纯沦为工作场所的行政机关。

到此，我们大致可以理解群众党的组织存在是怎样的了。

群众党首先是革命党，以民主集中制锤炼自身，则应当有政党的中央机关。政党建立初期，往往就是有着共同的自觉的意志的人聚集起来决计协同工作，因此早期成员常是知识较多、思考较多的积极分子，并且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处于这样的少数，以至于在一个工作场所内，很难找到第三个这样的人。在广大范围内，这样的人聚集起来，可以建立起中央机关，却建立不起来基层组织。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往往先有中央机关，后有基层组织，或者说基层组织的发展离中央机关很远。不过，中央机关将为基层组织传递信息、提供后援、提供战略视野。

党支部应当由党员构成，那么建立在基层的党组织则会由基层的党员构成。工作场所是最为恰当的划分，因为工作场所是政治斗争集中发生的地方，同一工作场所的党员更能理解彼此、有效协同。工作场所不仅是指工薪劳动的场所，而且包括社会组织活动的场所。我们不仅要在工厂、公司、校园建立支部，而且要在工会、工作室建立支部。党员就是工作场所的工作者，负担起党在这一场所战略任务。

为了积聚起社会力量，真正成为一个群众党，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党支部，那么，我们相当需要增加我们党员的数量。不仅要数量多，而且要能担起干部职能。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党员队伍，他们会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场所存在，把党需要的信息收集，把党的声音传播到各地，把党的路线在全国执行。

基层党组织无论多小，都是一个革命党的部分，应当以一个政党的眼光看待自己。决计不能限制基层党组织只管基层的事务，而把社会层面的事务讨论变为上层、中央的特权。任何党员都要关注天下大事，关心党各方面的发展。只要是有益的、可靠的意见，每一个党员都可以不管支部从属、不管中央支部之分，对任何事务“指手画脚”。回到基层事务而言，每名党员同样应当以一个政党成员的眼光看待自己，而不是一个行政单位，要关注基层各个方面的发展，把基层的未来当作自己的责任。在这里，不容许官僚主义、惰性的存在。党员应有党性。如果党员不能以政党眼光要求自己，不参加党的生活、拒绝承担党的工作，那么离党性尽失就不远了。如此，党员就不可称为党员了。

中国民粹主义评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社会乱象的增加和特权阶层的日益显现，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腐败、收入不平等、司法不公和官僚主义等问题上（例如黑砖场丑闻、“天价耳环”、杭州“粪水”等等）。一些网民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批评官员的特权待遇和腐败行为。这些观点常常通过匿名帖子或评论的形式传播，反映了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信任和愤怒。根据 CCRD 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记录，近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共党内和民间社会不满、抵制和反抗的事件，这些事件表明民粹主义思潮在民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那么，共产主义者应该对这些现象保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它强调“人民”，并认为“人民”是与“精英”相对立的。民粹主义通常与反现存建制和反现存政治形态相关联。民粹主义者宣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共同利益，但他们往往忽视形成意志的真正过程和实际的共同利益。他们主张存在一种单一的属于“人民”的共同利益，认为人民能够辨别并期待这种利益，政党或政客可以通过政策贯彻这种利益。民粹主义者通常将人民视为一个同质的、道德上统一的群体，其所谓的意愿足以与政治现实的结果相抗衡。

民粹主义者通常通过道德化的方式区分人民和其对立面。他们认为人民在道德上是纯洁的，而其对立面则是不道德的。这种道德化的区分使得民粹主义者能够免于被现实政治经验驳倒，他们可以永远挑拨真正的人民群众或沉默的多数来挑战民选的代表与选举的正式结果，以及那些长期在任的官员们。民粹主义者预设人民天然自觉，但忽视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人民在没有制度化协调机制和激励约束的情况下，不能持续理性行动，容易被短期激励诱导，反复走向被操纵和被分裂。

民粹主义者非常崇拜国家，他们看待国家的方式比较简单直接，认为国家只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国家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是“行走在人间的神”。然而，现实中的国家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实际上，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但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代表某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利益，表面的普遍性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正支撑国家运转的基础是市民社会，也就是**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领域，而是在国家的框架内形成的一系列实践和关系的集合。葛兰西提出了“政治社会”这个概念，认为国家就像一个容器，包围着市民社会，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市民社会。在这个视角下，**一个复杂且结构良好的市民社会并不是对国家理性的否定，而是国家理性的最大实现，是国家的具体体现和“真理”。**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市民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制度性组织。市民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协调看起来是基于共识的，但实际上，私人空间的建立需要国家的政治权力先行干预，也就是说，**国家作为普遍性的时刻，为私人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是首要的，它是一种真实的抽象或实体化，它主导并组织起一个被现有政治社会“包裹”的市民社会，使得市民社会只能作为国家的“原材料”出现。在市民社会意识到自身“奥秘”之前，即其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之前，国家将仍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随着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消失，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再吸收将构成“自我调节社会”出现的基础。这不仅意味着决策和治理机制从被剥削阶级掌握的情况到被全社会掌握的情况的转移，这意味着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其中经济与政治、必然性王国与自由王国、外部决定与自我决定不再相互分离。更准确地说，它将表明一种市民社会，它在自身的分裂特殊性和现有政治社会的从属召唤中，承担起对自身矛盾的意识；但并非为了在凌驾于其上的国家中取消这些矛盾：一个传统类型的“宪法权利”。相反，它将寻求动员这些矛盾，作为原则体系中的中介，这些原则肯定国家自身的终结，即其自身的消失，也就是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再吸收。民粹主义者的短视令他们永远看不到这一点。

民粹主义者呼吁民主，呼吁人民支持他们，呼吁人民给他们投票，但这只是为了证明投票的结果是他们已经决定的人民的意志。民粹主义不是更多政治参与的途径。在民粹主义者眼中，好公民是这样一些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觉悟是高是低，今天都会对我的“计划”产生有利的影响。这种非常特殊的和偶然的局面需要加以巩固。坏公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政治觉悟今天背离了我的计划的这些细节。需要培养他们吗？不！要打压他们、削弱他们、消灭他们、排除他们。

民粹主义者可以执政，并且他们的做法可能与他们奉行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只要有“替人民考虑”的政治代表的发展，以国家权力的鞭子武装自己，从中央鞭策政党，

就一定会成功。然而，成功的条件刚刚具备，障碍和阻力就突然出现了。“阴谋”和“暗算”的时期就开始了。民粹主义只会重蹈宗教作为不连贯的非知识秩序的最恶劣的方面，换句话说，它只能要求人们被动的接受或服从，这是一种基于信仰而非知识的关系。

民粹主义者也会主张制定一些“人民”的法律，但是这种法律会以延续创始而正统的民众意志的名义，以便让民粹主义者能保存权力，在某个时间点上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冲突。民粹主义者应该受到批判，我们应该同他们辩论，认真对待他们的问题，但不接受他们架构问题的方式。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一体两面的，自由主义喜欢把一切简化为多元利益的表达，仿佛通过协商就能解决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所有政体都必须解决如何收集、处理、验证并响应信息的问题。民粹主义者信奉“群众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却忽视了没有信息筛选与合法授权机制时，政权很容易陷入情绪决策、群众专政、再到军权收拾残局的恶性循环。



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

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者往往反对代议制民主，倾向于推崇简单化的政治模式，强调道德的至上性，甚至在利益分配上表现出平均主义的倾向，而且他们也常常表现出了对一些领袖的崇拜。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食品

安全问题以及腐败现象等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些问题日益凸显，引发了民众的普遍忧虑，并产生了对现状改变的强烈期望。

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显著加快，其内容也呈现出极端化和碎片化的特点。此外，中国资产阶级缺乏独立的政治代表和意识形态，同时**中国的工业、金融、商业、地产等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导致其利益诉求主要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化的渠道**（贿赂、裙带关系）或依附于党**和国家设定的发展框架**来表达，无法形成统一、自主的阶级政治纲领。他们需要作为资产阶级官僚的中国共产党的庇护来获取资源、压制劳工、维持特权。资产阶级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工程（如自由主义、个人成功、消费主义等）在中国无法有效整合社会、提供令人信服的发展愿景、解决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其道德和知识领导力破产，无法说服民众（包括部分中间阶层）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实际上是极其脆弱的**。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工人阶级（通常还包括大量边缘化群体、失业者、贫困市民、小资产阶级等群体）对现状极度不满，反抗情绪高涨且普遍。这种情绪构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的平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罢工、示威、骚乱甚至局部起义，展示了其足以**瘫痪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秩序、威胁其根本利益**的力量。（Not News 项目在 2013 年至 2016 年间，就记录了**约 7 万起群众抗议事件**，这些事件涵盖了各种社会议题，从劳工权益、环境保护、言论自由都有涵盖）被统治阶级的斗争能够严重冲击经济、动摇政治稳定，这也显著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成本，损害其利润和投资环境，因而就需要更强力的国家干预来“维稳”和保障剥削条件。也就是说，不同于西欧国家、日本、美国、台湾等地区的资产阶级，**中国大陆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专制的、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才能勉强维持**。社会弥漫着对现有体制的幻灭感和不信任感。这也就导致，中国的资产阶级无法像在稳定议会制下那样，通过妥协和让步（如福利政策、劳工权利谈判）将工人阶级或其他从属阶级整合进其“霸权体系”。**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新型且影响力巨大的民粹主义形式，其特点在于网民通过互联网发表意见、表达情绪，进而争夺话语权，推动民粹主义政治诉求的实现。年轻网民群体尤其表现出更强的叛逆倾向和另类意识，使得网络言论更容易走向极端化和情绪化。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衰弱，以及互联网空间消息传递的廉价，使得一根网线便能将线上和线下的人们聚合为一个群体。这种数字空间不仅是政治参与的平台，更是政治动员的工具，一个小小的事件，稍不注意就可能在网络空间引发轩然大波，甚至从虚拟走向现实，演变为社会动荡。

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精英阶层”（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们）常被描绘为腐败的、背叛民众意愿或未能代表“人民”的群体。在中国语境下，“人民”这一概念拥有多重含义，如“群众”、“大众”、“庶民”、“平民”和“百姓”，

这些词语通常指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并隐含着将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排除在外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通过“群众路线”（1920年代至1970年代）、“三个代表”（1990年代至2000年代）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0年代至今）等论述，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官僚专制的“人民”概念。这种“人民”概念的建构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救世主”的形象，有助于其治理的合法化，并限制了民粹主义者以“人民”之名进行诉求的话语力量。尽管如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民众也获得了直接在网上表达声音、诉求乃至不满的渠道，这也就催生了线上民粹主义的形成。网民，作为“网络公民”，构成了理解中国线上民粹主义的关键群体，他们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视为政策制定的“参数”。**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并非仅仅是外部概念的简单引入，它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矛盾以及数字环境的普遍影响深度融合。**互联网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基层民众表达诉求的催化剂，也成为国家管理舆论、引导社会情绪的重要平台。这种数字媒介的普及使得民粹情绪的传播更为迅速、广泛，并呈现出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特点，从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民粹主义的当代面貌。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低层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精英情绪，当精英阶层中的某些人遭遇不幸时，网络上常出现一片叫好之声。这种情绪的根源在于民众认为精英

阶层未能承担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他们获得了过多的利益却拒绝承担义务，反而对底层民众进行掠夺和轻视。这种行为导致了中国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使得被统治阶级在道德层面上对精英阶层持否定态度，并形成了深刻的反精英情结。此外，精英产生的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例如买官卖官成为官场晋升的常见途径，甚至有女干部被讥讽为“从床上培养”。同时，就业机会日益稀缺，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困境，使得大学失去了“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功能。社会上升通道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相对畅通，但此后变得异常狭窄，“阶级固化”也在逐步成为事实。**毛泽东时代的反精英、反知识分子情绪，也为这种社会心理奠定了历史基础。**

部分民众强烈认为政府应对其行为负责，并应赋予公众更多决策权，他们感到政府未能充分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些人有时容易相信各种阴谋论，不愿理解和包容与自己观念不一致的人，并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容易盲从。尽管中国每年发生数万起抗议活动，其中许多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具体不满，例如拖欠工资、土地征用或环境问题。然而，一些更具全国性影响的抗议，如民主墙运动、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及2022年针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则直接表达了对官僚主义和政府政策的质疑，甚至出现了要求领导人下台的呼声。

尽管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反精英和反体制情绪，包括对政府问责的呼吁，甚至直接要求领导人辞职的行动，但官方调查却常常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极高。在中国波拿巴主义政府的严密的数字和线下监控环境中，受访者可能出于自我审查的考虑，在调查中给出被认为“正确”的答案，而这显然不是其真实想法。**社会边缘群体，如女性、低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以及农村户籍居民，在回答敏感问题时更倾向于选择“不知道”或不作答。**这种情况同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实际上是摇摇欲坠的体现之一。官方数据与实际社会情绪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样是在中国资产阶级为了尽可能维持其反动统治而采取的专制高压环境下公众意见表达受限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虽然一方面表现为对精英阶层和现有体制的不满与反抗，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问题发出质疑，但在更深层次上，它又与中国官方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叙事高度契合。**

国家主义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和方向。在一些民粹主义者的眼中，国家（以及其代表的权力）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依靠。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批判，往往并非指向体制本身，而是指向那些被认为“损害国家利益”的“腐败精英”或“不负责任的资本家”。这种对国家的无条件拥护，使得民粹主义的矛头最终能够被引导至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例如支持某项宏观政策，或对外展现强硬立场。中国政府也通过“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为人民”等话语，将党的领导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绑定，从而合法化其权威，并引导底层民众的诉求。

其次，**民族主义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情感驱动和外部靶子**。历史上的“百年屈辱”叙事，以及对外部威胁的强调，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基石。当内部矛盾积累时，无论是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还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都可能被巧妙地引导和转移到外部冲突中。例如，通过煽动对特定外国的仇恨，或强调外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阻碍，民粹主义的情绪能够被有效释放和转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部压力。这种“一致对外”的叙事，**使得民众即使对内部治理存在不满，也可能在对外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合力**。网络上，这种情绪尤为明显，对外国的批判甚至谩骂，往往能获得大量支持。

中国民粹主义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底色下，又使得它与传统父权制叙事、反女权主义找到了结合点。尽管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日益增多，但由于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存在，导致男性在媒体话语权上掌握着事实上的绝对优势，**女性的刻板印象并未消除，反而愈发明显，女性的主体性常被忽视，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更多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特征**。

民粹主义的反女权主义常被包装成“维护民族传统”和“抵制西方糟粕”的论调。在一些民粹主义者看来，女性主义是被西方文化“污染”的产物，它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性别秩序，从而被视为对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的威胁。在这种叙事中，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被污名化为“田园女权”，指责她们只追求权利、崇拜物质，甚至被描绘成“破坏家庭和谐”的罪魁祸首。这种将女性主义“妖魔化”的做法，正是利用了民族主义中对“外部入侵”的警惕，将性别议题与国家安全、文化纯洁性捆绑起来，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对女性主义的攻击，也成为民粹主义者宣泄其社会焦虑和不满的一种方式。当他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不公或挫败时，一些人会将矛头指向那些被认为是“享有特权”或“过于强势”的女性群体，从而转移了对真正社会问题的关注。例如，在男性就业压力增大、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一些人会将矛头指向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认为她们“抢占了资源”，而非反思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种将个人困境归咎于特定群体的思维模式，恰恰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之一**。

因此，中国当代的民粹主义并非单一维度的反抗，它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下，借助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成功地将反女权主义纳入其叙事体系。通过构建一个内外交困、需要“团结一致对外”的情境，并利用性别对立作为内部“敌人”来凝聚共识，这种民粹主义展现出其复杂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共产主义者应该怎么做？

中国的民粹主义，根源在于中国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特殊性，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

性。中国民粹主义正是中国的这种统治的危机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扭曲反映。民粹主义往往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阶级怨恨导向非阶级性的、甚至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表达，而非指向明确的阶级解放目标。**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于模糊真实的阶级对立，将问题归咎于特定群体或抽象概念，从而阻碍了工人阶级形成统一的、具有革命潜力的阶级意识和反霸权联盟。**它未能提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方案，反而可能被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所利用，以转移视线、分化群众，从而在不触及根本剥削关系的前提下，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

当然，民众的愤怒，无论表现为何种民粹形式，其核心都指向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劳动异化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便是剥去这些表层现象的意识形态伪装，让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群体认识到，他们的苦难并非偶然，而是资本逻辑与国家机器相互勾结、维护剥削秩序的必然结果。这种认识上的提升，是将“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关键一步。它要求革命先锋队深入群众，将分散的、局部的抗议事件提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层面，教育群众理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核心症结，从而将愤怒从对个别腐败官员或特定政策的不满，转向对整个剥削制度的根本性否定。唯有如此，自发愤怒才能摆脱其盲目性与易被收编的危险，凝聚为推翻旧世界的统一意志。

同时，在中国，尽管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异常脆弱，难以通过自由主义或消费主义进行有效整合，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压迫阶级的愤怒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恰恰相反，这种愤怒极易被国家机器以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复兴等形式加以收编或导向，甚至演变为排外主义或保守民粹。**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需要一场长期的“阵地战”，即在社会各个领域展开**思想文化斗争**，构建**反文化霸权**的理论与实践。这包括：批判性地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承诺，揭示其内在矛盾；发展并传播一套能够解释被压迫者经验、提供未来愿景的社会主义“常识”；培养出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能够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复杂的理论与群众的切身感受结合起来。这种反霸权的构建，意味着将群众自发的、分散的愤怒整合为一种有组织、有方向、有理论指导的**集体政治意志**。它要求将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不同形式的抗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广泛的历史性集团，从而挑战并最终取代现有的统治联盟。只有这样，**自发的、碎片化的民粹主义愤怒才有可能被提升为具有明确目标的阶级意识和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最终突破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压制，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变革。**

针对没有翻墙渠道的读者们

推荐 VPN：魔戒

国内直连官网（任选其一）：

- <https://mojie.app>
- <http://mojie.host>
- <https://mojie.co>

打开官网注册账号（邮箱注册，常用邮箱即可），登录后台，购买套餐（支持微信、支付宝）

邮箱推荐使用 Proton，其家的 VPN 也有安全保障：<https://proton.me/mail>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